Z A I Z H O N G G U O Z U O T I A N Y E D I A O C H A

DOING FIELDWORK IN CHINA

万卷方法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

■主编 Maria Heimer(玛丽亚·海默) Stig Thøgersen(曹诗弟)
■译 于忠江 赵 晗



Z A I Z H O N G G U O Z U O T I A N Y E D I A O C H A

DOING FIELDWORK
IN CHINA

本书的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并且拥有着各不相同的学术背景，如，政治学、人类学、历史与文化、经济学等。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了自己在中国开展的田野调查工作，探讨了一般的理论问题，并且对于后来者给予了许多实际的建议。

尽管本书并不针对某个具体的研究问题，但是，却能对处理田野工作中常见的棘手问题给以有益的帮助。

万卷方法博客圈:
http://q.blog.sina.com.cn/fafang

ISBN 978-7-5624-6609-3



定价：27.00元

Z A I Z H O N G G U O Z U O T I A N Y E D I A O C H A

DOING FIELDWORK IN CHINA

万卷方法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

■主编 Maria Heimer(玛丽亚·海默) Stig Thøgersen(曹诗弟)
■译 于忠江 赵晗



重庆大学出版社

本书英文原版基本信息：
Doing Fieldwork in China
Maria Heimer(Editor),Stig Thøgersen(Editor)
Publisher: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March 30, 2006)
ISBN-13:978-0824830700
此次中文版出版时，对原书稿部分篇章作了删节，特此说明。
此次中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均获得了各位作者的授权，特此致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丹)海默(Heimer, M.),(丹)曹诗弟主编；于忠江，赵晗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4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Doing Fieldwork in China
ISBN 978-7-5624-6609-3

Ⅰ.①在… Ⅱ.①海…②曹…③于…④赵… Ⅲ.①社会学—调研研究—研究方法—中国 Ⅳ.①C9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0447 号
版贸核渝字(2012)第 041 号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

Maria Heimer(玛丽亚·海默)
Stig Thøgersen(曹诗弟) 主 编
于忠江 赵 晗 译
责任编辑：雷少波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秦巴达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83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五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9.75 字数：134 千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978-7-5624-6609-3 定价：27.00 元

目　录

1 导　言

Stig Thøgersen(曹诗弟)　Maria Heimer(玛丽亚·海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做田野调查是一个令人大开眼界,但有时候也让人深受挫折的经历。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但是,在中国研究的图书资料中却很少能看到针对如下问题的详细讨论:学者们具体是如何操作他们的田野调查的? 他们在田野调查中到底遇到过一些怎样的问题? 最好的情形下,在一本书的有关方法论的章节里,或者在一本书的附录部分,我们能看到田野调查的困难之处被提及。更多的情况下,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被放在注脚,被当做无关紧要的议题来处理。我们通常看到的情形就是这样(请允许我虚构一个例子):

> 这个研究使用了文献资料和访谈资料。作者前往中国数次(1994,1995,1997 和 2001),并且对官员、工人和中国学者进行了访谈。访谈为这个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素材。我很惊讶于被访谈者对当年情形直言不讳的记述。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小问题,不过我判定这些问题没有影响这个项目的主要研究结果。

学者们以类似手法处理田野调查中遇到的问题,其实并不限于中国研究。正如 Lareau 和 Shultz(1996:2)指出的:

> 在操作指南和具体操作之间总会有些差距,但是传统上这些实践上的成功和遗憾一般都是留给研究者自己的,并不公布出来。虽然研究者通常也简略地承认,研究项目的某些方面在研究过程中,其发展并不如自己所料,研究者,包括那些使用田野调查技术的研究者,常常略过并贬低这些困难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些田野调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是难以避免的,对它们的处理意义重大。

我们习惯于把田野调查里遇到的问题加以粉饰,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

担心如果把那些在田野调查中不得不采取的,可是又偏离于研究方法理想标准的做法公布于众,我们整个的研究的正确性将会被人质疑。可是如此一来,对田野调查中的问题就缺乏公开的讨论,这不仅仅损害了学术公开性的标准,也阻碍了为共同面对的问题寻找应对策略而展开的建设性讨论。如此做法,也使得那些第一次去到田野的研究生们误以为自己是唯一遇到麻烦的人。许多人在开始自己的 Ph. D 项目时,都有过类似 Elin Sather 在她的那一章里生动描述过的悲惨经历。如何组织田野调查的公开信息极少能得到,这只能使得初次进入田野的人境况更加糟糕。举例来说,本书的一位编辑(Heimer)在她第一次去中国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聘请了一位中国学生来帮助自己做笔记和偶尔帮忙做些翻译。她甚至因此觉得自己还不够胜任这项研究。结果到了中国,她发现实际上每一个在做田野调查的外国学者都和她一样聘请了一位助理。类似信息在公开场合的缺乏,掩盖了外国学者实际对当地助理有多么的依赖,也把田野调查如何被实施的真实图景弄得模糊不清。集体共有的问题,在我们通常的观点中以为是完全没有必要被提及的,结果就被转变成需要个体去应对的问题。

经验的相互交流将会有助于我们所有人——不管是研究生抑或是资深的研究人员——在实际操作与理想的研究方法论之间找到更好的折衷办法。公开讨论在田野调查中所遇到的困难(在本书中我们将田野调查广泛地定义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去收集信息),对于增强研究者的可信度以及项目质量,从长期来说都非常有利,同时也帮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田野调查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以及我们最终对中国的理解的。

本书的宗旨

本书的宗旨包括两条:一是为刚刚开始接触中国问题研究的学生和学者提供一个框架以供参考;二是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之间,就 1)我们所遇到的困难,2)可能采取的应对方法,3)田野调查方法会如何影响我们对中国的理解,这些问题展开一次公开的讨论。本书中的每个学者都通过个人经历来讲述他们如何完成田野调查,并加之他们对于自身经历如何与更普遍的问题相联系的思考。这些更普遍的问题都是围绕田野调查的方法论和调查研究的结果而产生的。

我们发现,现有关于研究方法论和田野调查的著作,在这些方面有很大

欠缺。从有关方法论的概括性教材入手寻求指导，对于研究者来说当然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是当面对现实的田野工作时，这些“行头”所能提供的帮助往往非常有限。与提供概括性的指导不同，本书的供稿者讨论了他们在田野考察中的实践经验，他们如何应对各种不同的困难，以及他们如何在方法论规则与现实之间达成令人满意的妥协（或者某些时候也达成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妥协）。比本书更聚焦于实践的田野调查手册在其叙述中反倒常常过于笼统。它们强调那些一般很容易就获得认同的行为规则，诸如：要与信息提供者中的主要人员建立联系；在当晚就要做好田野调查记录。而我们所要做的将是超越这些笼统的建议，因此读者们请不要把这本书当成一本概括性的方法论手册，或者指望能在本书找到对具体操作问题的解答，诸如应该如何申请去中国的研究签证一类的问题。本书供稿者们各自的讲述确实与田野调查方法具广泛关联，但是这些更宽泛的论点和概括都出自于他们的自身实践。

本书志在帮助那些计划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的研究生们，特别是那些缺乏有经验的导师为他们传授该行业窍门的研究生们。当然我们的目的也不仅限于此。另一我们希望有所帮助的读者群包括具有其他领域经验并计划将中国列入其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们。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期望能够吸引有经验的中国学者参与对田野调查方法论的思考和讨论。这些讨论与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十分相关。与许多关于田野调查的著作不同，本书的参与者并不仅仅都是人类学家，还包括了来自传媒、历史、地理、经济、汉学以及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们。读者将会在刘新（2004）近期编辑的一本由众多有影响力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人类学家供稿的著作中找到从人类学角度引发的许多引人入胜的思考。无论如何，我们的出发点却是有所不同，因为田野调查的实施以及田野调查方法才是我们的焦点。

我们相信本书的这些特性使得它可以在更加概括的有关田野调查方法的课程中被当做课本来使用。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中国的田野调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书中讨论的问题当做中国所独有的。相反，其中的很多问题在各个国家中都普遍存在。获取和使用数据与信息的机会总是有限，这在很多国家都是一个问题，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以其长期的经验和应对策略，应该能够对现在正持续进行的讨论有所贡献，这些讨论都是有关普遍性的田野调查方法的。我们的出发点是，虽然在中国从事田野调查要受许多政治上的限制，但是那些根本性的议题是有普遍意义的。研究者总要在系统方法的规定法则与田野的实际情况之间寻求妥协——不论是在瑞典开展一

个地方社区的研究还是在津巴布韦写一部有关宗教仪式的人种志——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所做的种种选择总是需要被关注并加以讨论的。同时，为了使关于田野调查方法的讨论有意义，讨论本身应该聚焦于一些具体的例子。中国是独特的，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地方也是独特的。每一个国家——或更准确而言，每一个环境——都呈现出自己特别的状况和困难，因而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和应对策略。举例来说，De Soto 和 Dudwick(2000:3)讨论了后社会主义社会所引起的田野调查两难困境的特殊性，Bestor，Steinhoff 和 Bestor(2003)提交了一系列的在日本从事田野调查的个人陈述。至于中国，Anne Thurston 和 Burton Pasternak (1983)总结了从 1980 年代早期以来的经验。那个时期，在中国内地从事田野调查的机会刚刚开始出现。从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觉得现在该是根据新的经验做一个更新的时候了。

同时，这本书也是针对最有成效的田野调查方法的讨论：对田野中预料之外的观察发现保持开放态度，并且允许对调查方案重新进行设计。这个方法隐身于很多文章之中，但是它在 Kevin O' Brien 的起首章节中被最有力地加以呈现。在那里，他论证说，一些最有趣的调查结果正是在我们于田野调查的过程当中，尝试重新构造重新概念化我们的整个问题的时候被发现的。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其独特的背景也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改变。我们将首先阐述西方田野工作者一直到 1990 年代早期在中国从事调查的历史。以此作为开始，以便于读者了解本书供稿者们的田野调查经验的历史背景。这些供稿者主要讨论的时期在 1990 年以后。这一历史分期将会导致对某些普遍性主题的讨论——我们认为供稿者们的论述中最重要的普遍性主题。

西方田野工作在中国一直到 1990 年代的情况

> 一个了解一幢建筑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好方法是，掀掉它的屋顶，但前提是不惊扰里面的住户。如果我们希望去理解中国，我们必须把它的屋顶去掉，以便了解它里面正在发展进行的事物。这件事情，没有哪个外国人能够做到。但是，他可以模仿中国人用湿手指去沾窗户纸，当手指抽离的时候，窗上就留下了一个小孔，经由这个小孔至少能看到一些屋内的情况。(Arthur H. Smith 1899：16-17)

当 Arthur H. Smith 在他的《中国乡村生活》中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他已经作为传教士在中国待了比四分之一个世纪还长的时间了。他的书的副

标题“一个社会学研究”显示了这一窥看中国的眼睛是如何受到正处于发端时期的社会科学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Smith 的作品,包括比《中国乡村生活》更加受人欢迎的《中国性格》(1894)在内,属于最早的当然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可以说把田野调查当做自觉的研究方法的,西方的中国研究论著之一。它们清楚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老一套的关于种族的模式化见解在社会科学的论述中还是标准元素;但是同时,它们也反映了 Smith 在中国生活与工作数十年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社会的详尽的知识。

观察中国并且“不惊扰里面的住户”,社会科学家的这样一个理想化状态符合富有威望的自然科学所建立的科学标准。但是,这个理想状态实际上与 Arthur H. Smith 和许多其他的西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相差很远。Smith 很显然首先是传教士,然后才是社会科学家,并且他的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一条可以把中国转变成基督教国家的路径。Smith 写到:“中国存在很多疑问和难题,但是那个所谓的大问题,那个唯一的可以包容一切的问题是:如何使得基督教教义贯穿全部这些问题,从而能够让基督教信仰独自地或迟或早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Smith 1899:352)在 1910 年代和 1920 年代,西方传教士继续就这个大问题进行思考,有些人转而求助于迅速发展的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研究工具,以便能在社会和精神层面引起根本性的改变。在它的早期发展中,社会科学在中国作为一个学术门类几乎完全被美国传教士所主宰 (Wong 1979: 11-19)。John S. Burgess,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首位系主任,和 Sidney D. Gamble, 他在北京开办了他自己的社会研究机构,这两位都和基督教青年会(YMCA)有关联。他们也是定量社会调查最有影响力的先驱之一。在一个大范围的北京市民生活状况的调查中,他们收集了大量观察数据,其目的有三个:为基督教社会工作构造一个基础,让中国学生了解认识他们自己的社会中所存在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发展出“能够影响北京人的生活,甚至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的一个程序化安排”(Gamble 1921:26)。

Gamble 稍后在河北定县做了一个全面的乡村研究 (Gamble 1954)。研究中所使用的材料是在 1926 年到 1933 年之间收集的。那个时候,定县是乡村改造运动的重要中心之一。这一运动尝试在划定的区域里透过社会实验改造中国乡村。一位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晏阳初夸奖 Gamble 的报告时说:“在针对中国农民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科学解决方案上,他的报告比任何其他单一因素作出的贡献都要大。”(Gamble 1954: ix) John Lossing Buck(1968 [1937])所作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土地使用的调查研究,也应算作理解中国乡村经济的主要贡献者之一。这一研究是基于 17 000 个农业社区,

40 000个农村家庭的庞大数据之上的。美国传教士们对社会研究与社会改革之间的紧密联系有着清晰的认识,并且一些参与讨论的中国人批评他们的工作更像是有着宗教或政治目的的宣传活动而不像是社会科学研究。但是,中国学者与社会改革者很快就以极大的热情采纳了社会调查的方法,据估计在 1927 与 1935 年间每年进行了大约 1 000 次的社会调查(Wong 1979: 16-17)。

并不是所有的外国社会科学家把推动中国改信基督教或者改革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任务。举例来说,俄国人类学家 Sergei M. Shirokogoroff,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成了费孝通(中国日后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老师。他是一个通古斯文化的专家。显然,他的主要的田野调查都是在中国做的,严谨地专注于人类测量学,一丝不苟地测量他所遇到的中国人的身体和颅骨,以确认东亚民族的身体特性(Arkush 1981: 39; Guldin 1994: 44-46)。但是,对大多数的研究者来说,社会调查和社会改革是紧密相关的,在中国建立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这一过程本身就与中国的社会工作的发展旗鼓相当。

尽管外国人主导了中国早年的社会调查研究,社区研究(1949 年前非常流行的另外一种田野调查方法)主要由在国外受训或在国内接受了西方老师训练的中国人来操作。也有一些例外,比如美国人 Daniel H. Kulp II (1925)的广东乡村研究就是在乡村社会学领域里面的先锋之作(Wong 1979: 28)。但是,甚至当我们查看用英语发表的研究之时,中国 1949 年前最有影响力的乡村社区人类学和/或社会学研究都是由中国学者完成的,比如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许烺光的《祖荫下》(1948),和杨懋春的《一个中国的村庄》(1948)。在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所写的前言中,Bronislaw Malinowski 特别强调说,这个研究工作"不是一个局外人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为了猎奇而写成的;它所包含的是一个国民对他自己的人民所做的观察"(Fei 1939: xix)。

毛泽东时代的田野调查

当中国共产党于 1949 年取得统治权力,这意味着中国内地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工作几乎立刻的停止。C. K. Yang 自 1948 年以来一直在广州附近的乡村里从事一项乡村研究,他的一些学生跟随着他。他被允许继续他的研究到 1951 年为止。当他离开那里前往香港的时候,他被迫留下所有的文字资料,那以后他不得不依靠记忆重建所有的数据。他的书对土地改

革有着第一手的直接描述。但是,尽管对总的情况有非常直观的描述,所有1951年之后关于该村庄命运的信息不得不从“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新闻媒体”收集(Yang 1959:vii)。中国大学里的社会学系于1952年被关闭(Wong 1979:43),接下来的30年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外国人能在中国做一点类似田野调查的研究工作。Isabel 和 David Crook(1959,1966)以及 William Hinton(1967,1983),他们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赢得共产党领导集体的信任,因此分别于1959/1960年和1971年被允许在“他们的”村庄里做一些后继的研究工作。瑞典记者和作家 Jan Myrdal(1965,1984)在对农民访谈的基础上写出了富有影响力的论著。他的访谈集中于1962年和1969年的陕西延安农村。但是,除了这些被信任的“中国的朋友”,对外国社会科学家来说,大门已经紧紧关闭了。在1970年代早期,当中西之间有限的文化和学术交流重新开始的时候,一些学者被批准参加为期三个星期的中国之旅,一路上都是在向导带领下参观一些由官方仔细挑选出来的机构(Kessen 1975),权当是对真实社会状况的万分之一的替代。

外国社会科学家完全无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做任何有意义的研究,他们转而关注香港的难民和移民,以此作为研究上的替代,他们中的社会科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尤甚。在1950年代,这个英国殖民地里还有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移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者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但是,到了1960年代早期,在香港的难民中已经有足够多的资料提供者,使得 A. Doak Barnett(1964)和 Ezra Vogel(1969)能够写出有分量的,部分地基于访谈材料的研究,讲述新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移民开始大量涌入香港,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到了1984年,香港人口的十分之一是由1978年以来从大陆来港的移民构成(Walder 1986:260)。这就打开了新的路径,可以设计大规模的访谈项目,其中的信息提供者都具有近期的和个人的中国内地生活经验,这些经验来自于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在香港为中国研究设立的大学服务中心成为很多长期或短期停留的研究者的学术基地。

在好几年里,基于移民访谈的研究工作给了我们比任何其他方法更深广的洞察力,以了解毛泽东的中国其基本社会单元的运作,不论这个基本单元是村庄(Parish & Whyte 1978;Chan, Madsen & Unger 1984,Madsen 1984)、城市社区(Whyte & Parish 1984)、工业企业(Walder 1986)、学校(Unger 1982,Shirk 1982)、红卫兵(Rosen 1982),或者政治激进主义团体(Chan 1985)。

令人惊讶的是,在许多基于移民访谈的研究工作中,相比我们后来一般看到的在中国所做田野调查中的相关讨论而言,方法论上的讨论要详细得多。在香港从事研究的学者显然已经发现对自己研究方法的辩护是非常必要的,他们的辩护常常要用来抵抗诸如"存有偏见"和"缺乏代表性"一类的指责。他们承认他们的数据是有些毛病,但是他们也宣称,只要能够对正确的人提出正确的问题,这些毛病就可以被克服。"以为大多数的难民都是共产主义的激烈反对者,这种假设显然是错误的",Parish 和 Whyte(1978:345)写到。他们接着描述了一系列他们在访谈和数据分析中所采用的步骤,用这些程序化的步骤,他们能够探测和纠正这个错误以及其他可能在访谈和数据分析中出现的问题。在 1980 年代,基于移民访谈的论著大多数都已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向外国研究者开放。此时,可以说,如果要为这个国家描画一副真实可靠的图景的话,去中国内地将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正如 Jonathan Unger 在 1987 年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给外国研究者设定了很多限制。在 Unger 看来,在香港从事研究,在那个时代依旧有几个优势:

> 为了开展一项研究工作,研究者没有必要非得取得中国境内一间机构的官方赞助;没有政府机构预选研究地点的限制;没有前期或者后期对研究题目和研究问题的审查。更多的还有,在香港所做的访谈可以以一种对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比较正常的方式来进行:那就是,以保护受访者的隐私和匿名权的方式。

以香港为基地的有关中国社会的研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后来的研究者在中国内地所做的研究工作也很难全面颠覆它们关于改革前的中国社会的研究结果。但是,当中国内地的形势更加放松,更多的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选择去那里亲自观察,香港就失去了它作为田野调查之替代地点的重要性。

人类学家处于不同的情形之中,因为针对来自很多不同地点的移民的访谈不能替代对小型社区的近距离观察,多数人类学家宁愿选择后者。一些人类学家确实以香港作为他们的田野调查之地,但是他们的研究所关注的是香港新界的村庄而不是移民。另外一些则在台湾从事研究或者研究海外华人,特别是研究东南亚的华人。资深的英国人类学家 Maurice Freedman 在一个饶有趣味的评论中说,他愿意选择多看看新情势所带来的好处。他觉得 1949 年前所积累的大量以地方社区研究为特征的研究工作,并不能让

我们对大的议题有更新的理解，然而，"在中国内地之外的有关中国社会的研究却带来了新经验新见识"（Freedman 1979:38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中国自己的研究者在1950年代做了大范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以鉴别中国的少数民族，并希望能搞清楚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社会史（Guldin 1994: 105-144），但是西方人类学家，像所有其他的社会科学家一样，被禁止进入中国内地。

新的开放与新的限制

在1979年和1981年初之间的两三年里，邓小平的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政策给外国研究者过去三十年所未有的田野调查的机会。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管理者想要促进中国与西方的联系，不仅仅在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并且，也许有点令人吃惊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没有被排除在"科学"范围之外，属于需要对外交流的学科之一。在1979年初，首个由七位美国学者所组成的小组进入中国开展长期学习和研究。这一项目的主持者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Thurston 1983:5）。大约在同一时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大学也与中国的相关机构开展了交流项目。谈到中西学术交流的这一较早阶段，Anne Thurston 描述存在于中美学者当中的激动情绪时说，"这已经近于过度兴奋了。"他们不仅仅被允许进入中国，他们也被允许在乡村里呆上很长一段时间。此时此刻，民国时期的社区研究，其复兴好像触手可及了。

但是，这种兴奋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一个自1979年就开始在广东农村做田野调查的美国研究生和中国行政当局起了冲突（他同时也和自己所在的大学起了冲突），这一冲突促使中国于1981年初决定延缓所有由外国人操作的长期的田野调查（Thurston 1983; Pieke 1987）。但是，情况从未糟糕到全面禁止的地步。短期的拜访一直都是被允许的，并且总是可以设计一些替代方案，以补偿缺乏长期现场观察所带来的损失。最突出的例子之一是在邹平县开展的山东田野调查项目（1988—1993），在几年的时间里，一组美国学者在这同一个县里做了几个不同的项目（Walder 1998）。

在整个1980年代，外国学者们不断地探索新规则的边界，这些新规则管辖着他们在中国的田野调查工作。到底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其中的不确定性对学者和管理者两边来说都很明显。我个人的一次经历有助于说明那时的情形。1984年，我（本书的编辑之一 Thøgersen）以北京师范大学为基地，正在准备一篇关于中学教育改革的论文，作为这个项目的一部

分,这所大学组织了一次去山东烟台的田野调查之旅。计划中的一部分包括一个问卷式调查,以便弄清楚不同类型的中学里学生们的社会背景。调查问卷的题目里包括有学生父母亲的职业、教育、收入状况和是否拥有党员身份等项目。整个调查问卷已经通过了中国教育部的审查,并且烟台的行政部门也对它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但是,当我离开中国的时候,中国海关部门却不允许我携带这些调查问卷出境。原因是,他们认为问卷里关于党员身份的信息过于敏感。我不得不把这些问卷留在身后,并且我也不抱希望将来可能再拿回它们。在我离开中国后,一位中国朋友帮我解决了这个麻烦:在海关官员的监督下,他亲手逐项涂掉了700份问卷中的"非法"问题的答案(Thøgersen 1990:132-53)。在1980年代,如下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地方官员会告诉你,他们不能从内部发行的刊物或书籍中为你复印文章,但是他们愿意把这些材料在你的房间里留几天,并且他们还可以给你一个私人复印店的地址。

正如这些例子所显示的,许多规则可以留待地方当局或特定部门做出自己的解释,也因此这些规则变得可以通融协商。但是协商常常是麻烦的,并且往往占用双方——外国研究者和中国管理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参见 Pieke 1996:4-16; Wolf 1985:28-55)。你能够随意地选择田野调查的地点吗?由你自己来选择受访者,并且在访谈中不必有官员到场,这是可能的吗?哪些文件和出版物是可以接受的呢?这样的一些问题可以导致双方之间冗长的讨论,并且常常让这位外国研究者的中国学术伙伴陷于两难困境:一方面,他要力图使得这个外国人理解中国的规则;另一方面,他要劝说那位管理干部对学术工作的国际标准做出一定的让步。作出富有成效的田野调查,其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使得任何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建立在访谈和现场观察这一类研究方法上的企图都变得如此危险,以至于 Elisabeth Croll 建议说,我们应该把田野调查工作看做"一个非常结实的大月饼上的酥皮,文献研究工作就是这个结结实实的月饼本身,如果因为某种原因田野调查工作不能得出任何成果,或者根本就不能以期望的方式实现的话,文献研究工作本身就应该能够独立成文"(Croll 1987: 18)。

官方对数据收集的各个方面的控制,以及研究者自主权的普遍缺乏,是两个最主要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许多研究者依赖一种被 Thomas Gold 称为"游击队式的访谈"的替代方案,他定义其为:"无监护的,自然发生的,但又是特别留意小心构造的现场观察和访谈,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进行,只要机会出现的话。"(Gold 1989:180) Gold 去了集贸市场,乘坐了出租

车，还进了一间理发店理了头发，他利用这些机会去和私人店主们以及私人企业家们交谈，尝试获得那些生动的民族志的细节，还有那些未被审查过的个人观点，这都是官方媒体和被监控的访谈所不能提供的。很明显，1980 年代的外国人仅仅是呆在中国相当一段时间并且和他们遇到的任何中国人交谈，他们就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知识。当有人第十次地问你，你在哪个单位工作，你会意识到工作单位是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重要元素，即使你的研究课题恰好和这个完全没有关系，你也不会错失这个信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十年封闭隔离之后的突然开放，加上中国行政部门的控制措施的不可预测，促成了这种以随机和偶然性为特征，而非以仔细规划为特征的研究风格的发展。因此，许多研究项目就被突然的发现或意料之外的障碍推进到了新的方向上去。

邓小平 1992 年"南巡"之后，国际交往的气氛进一步活跃。在中国的外国商人和其他永久居住者的人数急剧增长。外国研究者和学生、学术交换项目以及合作项目的数量也是如此。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

1990 年代及其后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三个主题

从 1990 年代初期开始，田野调查在中国就已经开始涉及多方面和变得多样化了。本书的每一篇稿件都详细讨论了田野调查的某一个特定方面，这里我们应该只强调三个重要的主题，它们在各个章节中一再地出现：党和国家压倒一切的无处不在；有限的前往田野开展调查的机会与访问权；与中国学术伙伴和助理的合作。这些议题在那些要求应对策略（coping strategies）的问题中显得异常严重。

党和国家的无处不在

也许最大的挑战就是党和国家的压倒一切的存在，或者，借用 Mette Halskov Hanscn 那一章的题目，最大的挑战来自如下事实：田野调查是"踩着中国共产党的脚印前进"。这个问题里存在着两个主要的方面：直接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和来自占支配地位却又相对而言无形的党的话语的影响。

尽管这一时期的中国拥有更加开放的气氛，但有些议题如果让研究者拿来研究的话，依旧在政治上太敏感，某些结论也会因太敏感而不能被发表，这就会导致数据收集方面的问题，但是也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问题，比如

给信息提供者招来不幸的后果。西藏的政治气候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但是 Yeh 所描述的问题的潜在的逻辑却多多少少存在于所有的田野调查之中，尽管它可能仅仅只是迫使信息提供者一直保持匿名状态，或把田野调查的确切地点当做秘密保护起来。对所有牵涉其中的人来说，一件令人左右为难的事情是，哪类信息外国人有接触和了解的权力，这个界限一直就没有被清晰地确定下来。中国学术界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 Yeh 的文章中，当地官员胡先生也搞不清楚什么样的议题是有政治敏感性的，什么东西有可能让他陷入麻烦，胡先生身处的困境，对我们很有启发性。类似问题的答案经常是以事后追溯的方式确定的，全赖报告发表时的政治气候和报告本身的政治影响来决定。站在当局的角度来看，整个事情的关键好处在于：当人们无法确认边界的时候，人们就会谨慎行事以免无意间越界。不过，发表在学术环境中的研究报告很少能引起中国当局的兴趣。比较而言，中国行政当局对国际媒体上的负面报道更感兴趣，特别当这类报告是以国际信息为基础，并且被用做支持对中国进行国际制裁的材料的时候。调查报告的政治敏感性因此成为一个“时机选择”的问题，政治敏感性也和报告的读者群及报告中信息的使用相关联。

因此很难预先确认哪些研究课题会在数据收集阶段遭遇政治上的困难。正如 Marina Svensson 的那一章所显示的，“人权”和“死刑”，可能出乎多数人意料，是一个比“文化遗产保护”一类的话题更容易开展的研究题目。当然在政治气候方面各个地方有相当大的不同，比如 Björn Kjellgrend 的深圳经验和 Emily Yeh 在西藏被严格限制的研究环境，就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不管有什么样的阻碍，总会有很多绕过它的办法，下面的几章将会触及这个话题。我们不再仅仅依赖于来自一个地方的所见所闻。有大量其他的信息来源，从学术期刊里的评论文章到网上聊天室里发型师的观点和评论，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把我们的研究融入当地背景，并进而影响我们对研究课题的理解。我们也可以经由官方渠道获得访谈机会，同时进行我们自己的独立的访谈和现场观察，如 Dorothy Solinger 在她的那一章里描述的那样。现在在田野调查中遵循互补策略（complementary strategies），我们不再会感到自己好像在做“游击队式的访谈”了，因为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中国人，不论是否有官方背景，往往都愿意与外国研究者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现在的中国人比 1980 年代要开放得多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中国社会变得容易一些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研究中所扮演的另外一个角色：它建构话语，并且规定我

们和我们的信息提供者能够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们的一个主要顾虑可能应该是:不管我们的课题在政治上多么“单纯无恶意”,我们常常要依赖官方机构、出版物,和媒体来最终决定我们课题的政治性。这就令我们有陷入官方解读的危险,正如那些在一般性的政治话语中官方所阐述的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解读,也正如 Stig Thøgersen 在他的那一章里所谈到的语言策略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当社会问题,比如失业、贫困、贫富不均(确凿无疑),成为 1990 年代外国和中国学者双方共同的主要研究领域,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已经变成紧迫的社会问题,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局自己决定需要对这些问题加以关注,并且也允许更多的公众关注这些问题。

访问权

前往调查现场的机会以及接触信息提供者的权力,这些都必须就个案逐个进行协商。但是,这些限制背后的理由已经部分地改变了。过去,学者处于严格的监督下,但是也为他们的研究做了必要的安排——尽管这种安排涉及所有方法论上的两难困境。而现在,很少有机构热心于接待外国学者。像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精简了许多国家机构,并且它们的预算也被裁减了。许多机构都面临着过多的合作请求及提供信息的请求。当接待外国学者的短期访问的时候,负责接待的机构通常要负担对方的食宿交通,接待方还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外国学者的学术项目对负责接待的机构或地方来说,不一定直接有用。接待外宾要比接待国内学者的麻烦大得多。接待国内学者可能更有价值,因为他们参与国家的辩论,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因此,官方对研究项目的审批通过有时候帮助并不大。即使大多数外国学者可能依旧借助与某家中国单位的联系来开展工作(比如一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间政府机构或一个社会组织),这个联系在有的时候也就只是帮助外国学者得到一个学术邀请,以便于他或她申请研究签证。有些大学和学术机构,它们在学术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不够高,因此缺乏足够的分量和关系去为外国和中国学者安排田野调查。特别是关于中国都市社会的研究项目,去走官方渠道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在获得调查机会和访问权方面,以顾问的身份开展工作可能打开新的通往田野的大门,如同 Baogang He 在他的那一章里所显示的。

就我们接触某些类型的信息提供者的机会而言,中国社会的多样化和两极分化有着它们自己的后果。Li Zhang 描述了进入中产阶级居住的小区是多么困难,这些小区安装了大门,砌了围墙,被监视摄像头保护着(Zhang

2004：67）。富有的企业家们常常无法在他们忙碌的工作安排中挤出时间来接受长时间的访谈，并且中国的城市居民总体而言明显比过去拥有更少的时间来和外国人交谈。我们对今天的党政一体的中国拥有更少的接触机会，这个结论也是可以被论证的。从某种角度而言，1960 年代的"中国的朋友"比今天的我们更深地融入整个中国政治秩序。虽然他们的行至被不时地向上报告，外国学者被送去参观模范地区和模范机构，这些地区和机构毫无疑问是有代表性的，更何况，针对政府想要达到的目标而言，这些安排多多少少都是极富教育性和知识性的。既然模范常常被设计出来以教育其他落后地区，它往往就是其他地区的相反镜像，有着其他地区无法实现的一些"模范"功能，中国社会里最紧迫的问题也就以这种方式成为明显可见的了。而今天我们拥有更少的开展田野调查的机会，并且我们的调查兴趣也被转移到其他方向，因此可以说我们对当今中国的理解实际上比 1960 年代要浅得多。

在毛泽东时代，学者找出办法以应对有限的田野调查机会，令人吃惊的是，今天的策略和过去近似。不同之处也许是，我们不那么经常地讨论并反省所采取的策略了。今天学者们更缺少反省，其原因可能在于，在中国开展田野调查遇到的问题已经变得与其他很多国家类似，因此，就中国的田野调查而言，单独为这整个事情进行辩护的需要不再存在。有限的前往田野的机会和数据收集方面的困难已经促成了多种资料收集手段的发展。当短期田野调查代替了 1980 年代持续密集的田野调查经验，根据 Croll（2004：89）的分析，短期田野调查开始被看做详尽的资料收集和比较研究方法的一个补充，并被它们所规范。今天，西方田野调查工作者依旧重视以文献资源作为田野调查的补充，并以其他领域的研究结果作为比较，来验证他们从田野调查中收集的数据（Kim 2004：150-151）。一个我们在 1980 年代之后经常见到的应对策略是，在许多地点同时开展田野调查工作。与传统民族志研究把工作集中于一个或两个地点不同，来自不同学科的许多田野调查工作者常常在中国的很多不同的地点同时开展他们的工作。Maria Heimer 在她的那一章里建议说，尽管这一发展趋势是对组织一个田野调查困难多多和收集数据艰难重重的一种反应，多重田野调查地点的使用却常常不在这个名目下加以讨论，所以一个极具价值的应对策略依旧是隐藏不见的。

合　作

多数我们所需要的各个类型的采访权和调查权，我们依赖我们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建立的社会关系来获取,正式的或不正式的社会关系都包括在内。如果我们说一个项目的质量与研究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社会关系的质量有相关性,这就有点夸大其词了。但是好的社会关系常常是做研究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中国研究的一个持续特征是对中国学术伙伴和研究助理的依赖,这一点反映在本书的多篇供稿中。有的时候,一部分数据的收集是由当地助理或研究伙伴完成的,但是这个情况并没有在最终报告中提及,甚至也没有在鸣谢的部分出现。这样一种忽略当然有学术道德和研究方法双重的问题,也因此而隐藏了外国学者实际上对当地助理有多么的依赖。

尽管如此,在真正的合作研究中,外国和大陆学者一起设计调查方案、分析数据、公布研究结果,这种情况正越来越多(Walder 2002,Chan & Unger 2003:329)。目前看起来,在和他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事们建立这种伙伴关系方面,经济学家们常常属于最成功的学者群体之一。Björn Gustafsson 和 Li Shi 的那一章就是这种合作关系的结果。双方联合发表的论文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这类研究工作的正式要求里就包括,必须有一家国内拥有调查权的研究机构和一个外国研究伙伴一起来支持这个项目。中国行政当局给质性研究设下的限制比定量研究要多,他们可能觉得前者更具威胁性,并且他们并不认为后者是真正的研究(参见 Bu Wei 的章节里对这一点的论述)。基于质性研究方式的合作研究看起来不那么普遍,至少在合作分析数据和合作发表研究结果方面看起来是如此。Mette Thunø 在她的那一章里描述了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在以民族志田野调查工作为基础的两个合作项目里,她也讲了合作的好处。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市场机制在学术合作领域也能起作用。如果你是一个来自著名大学的教授,拥有充裕的资金,在你名下还有一大堆的出版物,聘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事们参与大规模的合作项目将不会是个困难,但是许多 PhD 学生甚至资深研究者可就没有类似的机会了。许多中国研究机构本身都缺乏预算拨款,如果没有外部资金支持,仅仅是食宿费用就令它难以支持自己的研究人员去从事田野调查工作。

前景展望

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改革并没有沿着一条单行路前进,改革措施常常在本性上是矛盾的。在一些领域,国家已经退出,给私有因素留下很大的空间,然后在其他领域里它却收紧了对市场力量和政治机构的控制。同

样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并没有一个对田野调查持续地渐渐地放松控制的情况出现。尽管与普通公民和一些非政府组织打交道已经变得容易一些了,与官方机构打交道,从某些方面来说,却变得更难了。所以,虽然限制各不一样,从一个实地考察工作者到另一个实地考察工作者,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时到另一时,我们预期,今天围绕田野调查的所有限制并不会是一个过渡阶段,而会一直是现实的一部分,在未来很多年里我们都要设法去应对。

这些限制的一个重要的负面影响是,即使我们能够绕过阻碍,田野调查工作却开始令人烦恼,并且耗费大量不必要的时间。一些中国的学生可能觉得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项目,其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把田野调查排除在他们的项目设计之外,或者仅仅做一个短期的实地考察。其他人可能在一个项目里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但是却因为太麻烦而决定不再在下一个项目中实施田野调查,宁愿选择用其他方法获得数据。所以,未来存在的一个危险是,会有越来越少的学者愿意花费时间去做详尽的田野调查工作。

不管怎样,限制和应对限制的策略,它们也能够把我们引导到新的未曾预见的方向,因此会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事情是如何运作的。本书的许多供稿者描述了这一点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他们因此而获得的知识和见解。对任何未曾预见的发现,我们已经主张在田野中保持开放的态度,并允许对整个项目进行重新设计。Frank Pieke(2000)走得更远,他建议我们应该把我们意外发现珍奇事物的能力融入到项目设计中去。此处用词 serendipity 既是指无意中找到令人愉快的意外发现的能力。根据 Pieke 所说,"意外发现"实际上比上述 serendipity 的定义中所暗示的要稀少得多,但是它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他写到,人类学的发展,要求有一套方法(或至少有一个策略)去邀请"发现意外珍奇之能力"的加入,他因此钟情于这样的项目设计:项目设计本身能够创造足够的机会,以便于意外的发生(2000:145-146)。在没有把田野中的问题理想化的情况下,限制及其应对策略也必须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并被利用以达至那个"为意外的发生创造足够机会"的效果。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以及为什么它可能向我们意料之外的方向转变——从田野里建立更牢固的实地观察的基础,那将是绝对必要的。我们需要更多地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工作,我们希望以下的各个章节能够鼓励本书读者沿着这个方面发展。

本书的结构①

第一组的各章集中处理在整个研究设计中田野调查所扮演的角色。Kevin O'Brien 讨论田野调查在重新设计研究项目以及理论构建中的关键角色。Elin Sæther 作为一个田野工作的初来乍到者，反思在田野调查工作中固有的不确定性，并且显示了田野当中遭遇的挫折以及田野工作自身中的挫折如何能成为学习进程的一部分。Maria Heimer 的那一章集中在田野工作地点的选择，并检查文献中对田野工作地点不同的处理方案，以及这些方案与各个类型的研究结果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部分以"官方中国和对它的超越"为题。Mette Halskov Hansen 讨论"沿着中国共产党的脚印前行"中所涉及的限制，并为我们如何绕过这些限制给出了建议。Emily Yeh 描述了在西藏从事田野调查工作所遭遇的政治限制，但是也告诉我们，同样的那些限制如何启发出未曾料想的深刻见解。Stig Thøgersen 提醒我们，对官方和非官方表述语言之间的差异应该有所意识，这点非常重要。调查策略中的语言使用，有些是对社会政治方面非常敏感的，就这个问题他给出了一些需要仔细应对的建议要素。

第三个部分处理的是我们如何收集数据，以及这些数据收集的程序对我们的解读工作意味着什么。Björn Gustafsson 和 Li Shi 所讨论的是，在有关家庭收入的大范围定量数据的收集中，研究者所采取的各种策略的优势和劣势。Dorothy Solinger 在对高层官员、地方官员、工厂经理、农民工和下岗工人进行访谈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她告诉我们访谈的艺术。Baogang He 显示了顾问工作如何为田野数据收集提供了一条极具优势的变通之路。Stig Thøgersen 关注不同类型的文字资源。他关注的还有，收集与阅读文件如何能形成田野调查工作进程中的一个富有活力的部分。

第四个部分讨论的是内部人士和外部人士问题，并且说明在这两者之间没有一条简单的界限来区别划分他们。Bu Wei 讨论的是质性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的状况和地位。她接着分析的是，在四川被非法买卖的妇女中，她这个中国社会科学家作为外部人士的经历。Björn Kjellgren 考量的是研究者个人背景（学科背景、民族背景、年龄、性别，等等）对田野调查进程和数据收集的影响。Mette Thunø 讨论研究合作的潜力和两难之处。最后，Marina

① 中文版出版时，由于版权获取等方面的原因，原书中有几篇文章未能刊发。但此处的说明并未改动，有意向的读者可以据此查阅英文原书。——出版者注

Svensson 描述被卷入地方上的冲突并由此引发的互相矛盾的问题，以及研究者如何在涉入当地社会和维持距离感之间保持平衡。

Anja Møller Rasmussen，Inga-Lill Blomkvist 和 Mads Kjeldsen 已经编撰了一个有关在中国做田野调查的各类记述的书目，书目自 1990 年开始发表，附有注解；我们希望它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这个书目作为附录放在本书的最后。

作者的简短感谢

我们对 Kevin O'Brien，Mette Halskov Hansen，Jon Unger，和两位匿名书评人的评论一并表示感谢。

注 释

1. 许多人都未曾提及何时、何地、哪一位(这里指职业或职位，而不是指人名)和多少人被他们所访谈，这本应该是个基本的标准。

2. 此类中的一本杰出之作是 Lareau 和 Shultz 于 1996 年发表的著作，它真实讲述了田野调查是怎样被放置在整个研究进程中的。

3. 这样的一个非常实际的建议是不容易被找到的，但是，值得查阅 Thurston 于 1994 年发表的著作，尽管有些情况已经在过去十年里不可避免地改变了。

4. Ager(1980)在《专业的陌生人》(The Professional Stranger)的第一版中写到，在文化人类学中有一个传统：一个人不可能被教会如何去做田野调查。作为这个看法的后果，田野调查训练的传统一直就比较缺乏。当然，这个状况从那时起已经改变，Agar 自己的书(一本扩展了的第二版于 1996 年出版)就是一个杰出的相反例证。尽管如此，实际上在一般性的研究方法论和田野调查经历之间依旧存在差距，各个学科里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5. 根据一个讣告，Arthur H. Smith 在中国居住时间不少于 54 年(*Claremont Courier*，一九三二年九月二日)，www. beloit. edu/-libhome/Archives/acoll/alum/ahsmith. html

6. 关于社会科学和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外国学者对这一过程的参与，这方面的讨论可以在如下著述里找到：Arkush 1981；Gransow 1992；Guldin 1994；Wong 1979。

7. 如果想要了解对中国研究而言大学服务中心的重要性，可以参见 *The China Journal*，vol. 53，Jan 2005，这是一期特刊，专门用来庆祝该中心成立四十周年。

8. 例如参见，Shirk 1982:199-208；Walder 1986:255-269；Whyte 和 Parish 1984:377-389.

9. 参见 Tang 2002，针对在中国城市做调查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和实际的研究指南。

10. 中外学者合作进行质性研究，这样的项目确实有几个成功例子。但是中国学者参与其中的项目中，没有几个是明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研究基地的。

［参考文献］

Agar, Michael H. ,(1980/1996) *The Professional Stranger. An Informal Introduction to Ethnography*,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Arkush, R. David (1981) *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arnett, A. Doak (1964) *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 1949—1955, New York: Praeger.

Bestor, Theodore C. , Patricia G. Steinhoff and Victoria Lyon Bestor, eds (2003) *Doing Fieldwork in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Brady, Anne-Marie (2003) *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China: Managing Foreign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Buck, John Lossing (1968) [1937]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A study of* 16,786 *farms in* 168 *localities, and* 38,256 *farm families in* 22 *provinces in China*, 1929—1933,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oration.

Chan, Anita (1985)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London: Macmillan.

Chan, Anita,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1984)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n, Anita and Jonathan Unger (2003) '*The China Journal* and the Changing State of China Studies', *Issues & Studies* vol. 38, no. 4, pp. 327-331.

Croll, Elisabeth (1987) 'Short-term Field Investigation in China: A Personal View', *China Information* vol. 2, no. 1, pp. 17-26.

——(2004) [no title], in Xin Liu, ed. , *New Reflections on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Greater) China*,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p. 85-96.

Crook, Isabel and David Crook (1959):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The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 London: Routledge&Kegan Paul.

De Soto, Hermine G. and Nora Dudwick, eds (2000) *Fieldwork Dilemmas. Anthropologists in Postsocialist States*,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Fei Hsiao-t'ung (Xiaotong) (1939) *Peasant Life in China*,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Freedman, Maurice (1979)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amble, Sidney D. (1921) *Peking: A Social Survey*,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54) *Ting Hsien :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Gold, Thomas B. (1989) 'Guerrilla Interviewing Among the *Getibu*', in Perry Link, Richard Madse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Unoffic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pp. 175-192.

Gransow, Bettina (1992)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Soziologie*, Frankfurt Campus.

Guldin, Gregory E. (1994) *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From Malinowski to Moscow to Mao*, Armonk, N. Y.: M. E. Sharpe.

Hinton, William (1967)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Shenfan. The Continuing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Hsu, Francis L. K. (1971) [1948]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Kinship,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Stan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Kessen, William, ed. (1975) *Childhood in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Kim, Kwang-ok (2004) [no title] in Xin Liu, ed., *New Reflections on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Greater) China*,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p. 141-152.

Kulp, Daniel Harrison, II (1925)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Volume I: *Phenix Village, Kwangtung, China*, New York: 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Lareau, Annette and Jeffrey Shultz, eds. (1996) *Journeys Through Ethnography. Realistic Accounts of Fieldwork*, Boulder: Westview Press.

Liu, Xin, ed., (2004) *New Reflections on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Greater) China*,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adsen, Richard (1984)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yrdal, Jan (1965) *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Return to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Parish, William L. and Martin King Whyte (1978)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ieke, Frank (1987) 'Social Science Fieldwork in the PRC: Implications of the Mosher Affair', *China Information* vol. 1, no. 3, pp. 32-37.

——(1996) *The Ordinary and the Extraordinary.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Reform and the* 1989

People's Movement in Beijing,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2000) 'Serendipity: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China' in Paul Dresch, Wendy James and David Parkin eds, *Anthropologists in a Wider World. Essays on Field Research*,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Rosen, Stanley (1982)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Shirk, Susan (1982) *Competitive Comrades. 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mith, Arthur H. (1900) [1894]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th edition, 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907) [1899] *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 New York: Young People's Missionary Movement.

Tang, Wenfang (2002) 'Research Guide: An Introduction to Survey Research in Urban China',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8, no 4/vol. 39, no. 1, pp. 269-288.

Thurston, Anne F. (1983)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Fieldwork in China: An Overview', in Thurston and Pasternak 1983, pp. 3-36.

Thurston, Anne F. and Burton Pasternak, eds. (1983)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Fieldwork in China. Views from the Fiel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Thurston, Anne with Karen Turner-Gottschang and Linda A. Reed (1994) *China Bound -Revised*,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Thøgersen, Stig (1990) *Secondary Education in China after Mao: Reform and Social Conflict*,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Unger, Jonathan (1982)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The Hong Kong Connection: The Advantages of China Research From the Room Next Door', *China Information* vol. 2, no. 1, pp. 27-35.

——ed. (1991)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Vogel, Ezra F. (1969)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lder Andrew G.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1977—2002.' I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edited by David L. Szant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Digital Collection, Edited Volume #3, 2002.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uciaspubs/editedvolumes/3/8.

——ed. (1998) *Zouping in Transition. The Process of Reform in Rural North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hyte, Martin King, and William L. Parish (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olf, Margery (1985) *Revolution Postponed. Women in Revolutionary China*, London: Methuen.

Wong, Siu-lun (1979) *Sociology and 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Yang, C. K. (1959)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 The Technology Press, MIT.

Yang, Martin C. (1948) *A Chinese Village. Taitou, Shantung Province*, London: Kegan Paul.

Zhang, Li (2004) [no title] in Xin Liu, ed., *New Reflections on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Greater) China*,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p. 62-67.

2 发现，研究（再）设计与理论构建

◆ Kevin J. O' Brien（欧博文）

从197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做访谈研究成为可能。此后，访谈就成为很多在中国开展的实地工作的核心。交谈也就成了在中国现场搜集资料的典型方式，从西方的学者到中国的学者，大家都广泛使用：西方的政治学家与基层官员交谈时在使用；中国的民族志学者在自己家乡做口述历史研究时，也在使用。与此同时，许多汉学家也比以前更加深入地嵌入到社会科学中；尽管这些学者仍旧继续在专业研究渠道出版研究成果，但是他们也开始为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期刊写作，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期望，他们的研究将会以某种方式，为理论的发展与开发做出贡献。

把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告诉我们的学术同行，是一件相当值得做的事情。但是通常会遇到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把从访谈中探得的、缺乏逻辑约束的故事改编，以使其满足理论化的需要。当然，访谈的力量是其特殊性与生动性。不过，代表性与典型性就会成为一个问题，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地方；因为见面接触一般都是通过各种极其特殊的渠道安排的（我做过的几个最好的访谈，来自于一个以前的学生，我们完全是意外遇到的；我们一直保持通讯联系，但却在王府井——北京最繁忙的商业街——意外碰面）。考虑到这种机会主义式的搜集信息的方式，以及那些"非标准化的资料"（Dean et al.，1969：20），（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在中国的访谈，为理论构建做出贡献？

本章里，我将概述一种研究设计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对访谈过程中出现的、无法预知的想法（甚至是新的调查主题），要保持开放的头脑。我会以自己在1990年代早期，有关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研究为例（也包括新近的有关乡村选举、政策执行与民众反抗的研究工作），来说明这样的过程：一个年轻的实地研究工作者，是如何摸索着展开实地研究，并希

望与中国学者及学术界人士展开对话的。我所支持的研究策略，跟“扎根理论”(Glaser and Strauss 1967)有一些关系，也是“探索性”分析的一种形式(Gerring 2001: 231-232)。而且，这是一种适度而不含野心的事业，其承认(甚至在事实上是，去揭示出)我们能够做出的最好概括，通常都是有界限的。这就鼓励我们，在走向现场之前与之后，都要仔细选购现有的各种理论与概念，而不要去大量买进我们能找到的所有东西(Jones 1974: 219)；特别是，当下面的情况发生的时候——访谈已经清楚表明，事先的想法，已经导致我们错过了真正的问题，或者已经导致我们相信一个并不存在的困境是存在的。在这种研究策略里，我们把研究设计看成是一个在行进中不断完善的过程，并且强调的是发现，而不是证实(Gerring 2001; Glaser and Strauss 1967)。它赋予被访问者的主观体验以相当大的重要性(Schwartz 1996: 107)，并且认为，裁剪证据以迫使其去适应“并不适应的先验因果类型”(Gerring 2001: 231; 也见 Glaser and Strauss 1967: 253)简直就是能够想象的最大罪过。

一旦这种方法起了作用，其结果就是：会产生有关中国的知识，还有同样重要的东西——对某一理论性问题(theoretical question or problem)的洞见(Gerring 2001: 22-23; Kaplan 1964: 77-78)。如果我们做的是令人信服的研究，那么这样的研究，甚至可以成功提醒我们的学术同行：对待中国经验要更加认真一些；当然还可以促使他们承认，他们所高度重视的理论，可能并不如其所预期的那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研究(再)设计

关于研究设计，我听过的最好的建议就是：研究设计应该集中于开展一场类似于商业规划书式的辩护(a prospectus defense)。在俄亥俄州立大学，R. William Liddle 经常告诉博士生，提交毕业论文项目书，就像申请捕鱼许可证；我们是你们申请领域的代理人，我们即将批准你们在某一确定的地方捕鱼；当然，我们相当自信地认为，那里是有鱼的。在提交研究申请书时，你应该说服我们：这个项目既有趣又可行。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你会打到哪一条鱼；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只能猜测哪一条鱼是最大的。既然你已处在这一领域中，你就不得不为打到一条大鱼做出谋划。做一些实际的接触与联系，可能比其他方式更好。有的人交到你手上的，就是令人着迷的项目书；当

然,它是以实地工作为基础的项目书。起初,你可能认为,研究项目中的某个小部分,并不重要;可是后来,突然,它可能看上去更像是大鱼一尾;而且这尾大鱼,在经验层面和理论层面上,都会使你收获颇丰。上述这个专业建议强调的是:在开发蕴含丰富、扎实可靠的数据资料时,要考虑理论方面的影响——研究要有灵活性;而这恰恰正是我认定的、在研究中必须坚持的一个关键点。换句话说,研究人员一旦抓到一条大鱼,他就必须意识到这是一条大家伙(不管它是不是自己早前预期的那条大鱼),也就不能把它扔回水里;原因在于,他们起初着手抓的可能是其他的鱼,而当他们抓到的时候,却可能发现那不过是一条缺乏吸引力的、不那么美味的小鱼。

这一观点似乎微不足道,甚至平淡无奇,但是却跟有关中国的研究关系极大;同时,对研究设计而言,这一观点也有很多重要的含义。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仍旧是一个相对特别的政体,另一方面,也因为,许多社会科学理论都是通过研究十分不同的地区而发展来的。首先,开展现场工作的研究人员,对各种新的观点、理论,应该努力保持开放的态度;这些观点、理论对起初的研究来说,可能并不切题,但是却可以成为后继的新研究的焦点。就像好的记者那样,抵达现场时,对社会过程如何展开的问题,我们应当怀有某种兴趣与直觉;但是接下来,就应当准备好(或者说是急切地期待),让研究对象来引导我们、告知我们什么才是他们最关心的。

我用我的经历作为例子,来做一下说明。1994 年,我在山东的一个农村开展研究工作,那时我认为,研究项目是有关乡村选举的。我和李连江(音译,Lianjiang Li,下同)准备了很多问题,是关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情况的问题。地方干部竭尽全力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说实话,对草根民主这个主题,他们完全缺乏热情,表现得无精打采。接着,没有任何先兆,当有人谈到"十星家庭"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突然活跃起来。这些"星"跟正在拟定的村庄章程有关,而家庭会因为完成各项任务而获得"星",比如交税、守法、保持庭院干净、不让猪跑到别人的地里、孝敬老人等。有意思的是,"星"既分配给干部也分配给村民,而且大家的表现都是公共知识:哪一家得了多少"星",都直接标示在房屋正门上。不过,最吸引人的,还是访谈对象告诉我们的:年轻姑娘不愿嫁到少于八星的家庭去;干部家庭如果低于八星或九星,他们就有可能失去位子,至少也是在村子里失去地位或身份。

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们的目标是,调查基层民主的实施状况;但是,在这个村庄,真实的故事却与政治上的复杂状况和社会控制有关,而这些则是以那些"星"为中心的。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能够发现什么、能够学到什么?

能用来确定我们可以发现什么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我们的访谈对象说下去；而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一直听下去。偶尔，我们也会把他们拉回到我们初始的研究领域，但主要会是让他们谈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或许就是可以称为“村庄政治生活”或者“草根干群关系”的问题吧。我们不使用强制性的选择题；事实上，我们也放弃了很多我们本来想问但却没有主题限定的问题。对这个崭新的、完全没有预期到的话题，我们也没有利用正式的编码系统，来解读他们的言论的意义。我们甚至也没有想过，去询问一下其他村庄有关“星”的事情。这是这个地方的故事，这是这里的访谈对象热心且具体关注的事情，而我们则很高兴了解了他们所说的故事。之后我们也愿意去弄明白，他们的言论是如何跟我们的研究项目产生关联的；*当然，更好的情形是*，我们更愿去认真地琢磨一下这些访谈，进一步考虑，是否需要修改我们现在的研究项目（以及一系列我们正在谨慎使用的概念与理论），以便于能够把来自这个村庄的洞察和创见整合进来。

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的研究焦点，也没有搜寻新的概念或理论来秩序化我们的发现（在更宽泛的背景下进行的，有关“十星家庭”的比较与分类，参见 Thogersen 2000：138-40）。但是同样是在那个夏天，我们在山东其他地方以及湖北的实地工作，却真的把我们引向了从未预料到的方向。一些干部提到，在跟*刁民*或*钉子户*打交道时总会遇到很多问题。在我们的采访对象中，也有一部分人，他们也根据村民是不是*讲理*，把村民分成了两类。访谈开始之前，我们没有想到去开发出乡村抗议者的类型学体系，但是很快，我们觉得这个项目（Li and O'Brien 1996；O'Brien 1996）比原来的调查目标要更有意思（我们搜集的证据也更支持这样的研究）；而那时，我们原来的调查目标是：为增加村庄稳定性而设计出来的选举改革，实际上是不是降低了这种稳定性。

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的学者，把这种中途修正称为“交互式调整”（Gerring 2001：231）或者“连续性定义”（Kaplan 1964：77）。这就意味着，在开展研究（在我们的案例中，主要是通过访谈的方式）的过程中，研究人员探索的主题以及用来理解这一主题的概念或理论，是不断演化的。在这种解释性的研究工作中，“行”先于“知”（Jones 1974）。理论和证据先是紧密纠缠在一起，同时，在研究结束之时，理论、概念与证据是整齐排列在一起，并相互支持的（Gerring 2001：231；也见 Dean et al. 1969：22-23）。“在一开始，这种研究就既是归纳的又是演绎的，就好像一个人，他既想出一个谜题，又同时解答这个谜题；又好像一个木匠，他一会儿改变门的形状，接着，过一会儿

他又改变一下门框的形状,以便使二者更好地匹配。"(Emerson et al. 1995:144)一部分研究人员仅仅是拟合数据,以达到证实或证伪工作假设的目的;这样的做法可能令人震惊,而且令人厌恶。但是对我们来说这却可能是一件大好事,原因在于,伴随实地工作的展开,我们不断调整我们的调查范围;而且一旦搜集到所有的资料,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仅仅是,选定利用哪一个概念或理论来进行研究了。

揭示特殊性与具体性

在研究中"沉浸"(soaking and poking,该词来自于 Fenno 1978:250;Gerring 2001)已久,就会使我们改变研究中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这实际上是鼓励研究人员要集中于访谈中的具有特定性的东西——准确地说,是访谈中的最强音。我所经历的情况是,当跟中国官员或普通市民谈话时,最重要的插话应该是"请举一个例子"。在人民大会堂里,我做过关于人大代表体制的访谈;在那里,学者与官员会不断引述宪法的内容,结果我宝贵的时间就被浪费掉了。我和李连江不得不找一些村民来谈话;十分显然,他们很难理解西方社会科学家的问题,甚至,他们也不十分清楚学术研究到底是什么。在这些情况下,保证问题的具体真实性以及贴近生活,就显得十分关键了。访谈对象会讲述一个长长的、亲身参与的、充满各种情节的故事,此时,我就已经了解到很多事情了;因为这些故事都是新鲜而且不同的,足以促使我为此细想与深思。在听这些故事时,我可能无法立即理解其中的波折的含义,但是这并不重要。实地研究人员需要使用不同的例子来思考,以便于精炼研究主题,并检验头脑中的先验观念。特别是对渴望构建概念与理论的研究项目而言,研究人员应该像对待一面多棱镜那样对待一个详细而曲折的故事:他应该反复把玩(有时可能离开现场已经数年了),以期得到更多的收获。我们现在难以理解的东西,在日后,比如在写作的过程中,可能会突然以研究漏洞的形式出现。一般来说,抽象的内容是无法填补这个漏洞的。如果研究人员不恰当地依赖于抽象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很可能会直接滑过重要的,但却不符合直觉或者与既有文献不一致的观点;进而,去做一些偶尔我们都会做的事情——去演绎推理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提供一个在某地真实发生过、蕴含丰富且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我所颂扬的、具体且近于亲身经历的资料,有些简直就是轶事(称其为

"案例研究"甚至就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利用得合理得当,读者就将认识到孕于其中的、真理性的核心内容。换句话说,这会给人塑造出真实的印象,也会跟其他地区或中国其他部分的研究经验一致起来。这甚至还会帮助其他学者,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自己的研究主题。比如,其他人员应该去调查一下别人的研究断言么?应该揭露某个轶事并不具有真正的代表性么?或者,去说明这个轶事已经被误会曲解了么?所有这些做法,都使得事情变得更好了。总之,能够说明概括性结果成立的范围条件,是研究共同体取得进步的重要方式之一。

让我再举几个例子。我的妻子是森林生态学家,于是当她陪我去展开实地工作时,我就有机会搜集护林员的故事:地方干部想解雇他们,而他们则扬言要威胁地方干部;还有人大代表的故事,他们支持森林防火,也希望改善边远山区的教育或枪支控制。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写过关于林业的内容,但是跟护林员的交流,使我得知他们关心的而且困扰他们的事情。这样,通常会有的收获就是,可以获得一些差别细微的资料供我思考;也会促使我探讨,自己来的时候所持有的理论倾向性(是否合适)。即使不是全部时间里,至少也是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访谈对象总想使我们高兴。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跟他们交流时,如果我们使用精心挑选的概念,比如代表制,那么他们通常只会沉默地看着我们。但是关于代表制,我们仍旧能够发现很多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也能够发现这个概念的变化旅程与意义(how well the concept travels)。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有多种,比如,我们可以询问访谈对象,让他解释谁把选票投给了某一家,谁又把选票投给了另一家;也可以问问,对于提高人大代表的质量(这也可能意味着,我们低估了工人和农民代表的作用),他们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像2002年我在云南做的那样,通过听的方式——就在选举开始之前,一个妇女候选人讲到,她唯一的女性竞争对手已经退选了,而上级也给村委会里分配了一个女性指标,因此选民应该按照上级的要求来做。在我看来,细致彻底、开放且无限制的访谈(以及厚脸皮的人所做的兜售故事的行为),是定位研究主题的最好的方式(见 Fenno 1978: 250-251; Dean 1969: 22);也是避免对现象进行"倾向性明显的表征与塑造"的最好方式;也是拒绝"冲动地急于澄清某种特定理论见解"的最好方式,因为那样会牺牲掉经验事实的有效性(引用的话语,见 Sharpiro 2002: 597)。

当然,如果仅依赖小范围内数量有限的访谈对象,那么也会产生很多跟偏见性和真实性相关的问题。我和李连江十分依赖于访谈对象,对于像我

们这样的实地工作人员来说,大家都需要做持续不断的努力,以便能够从各种谈论中筛选与区分出那些不真实的、缺乏代表性的、服务于个人的特定目标的、被意识形态所驱动的内容。但是在这一点上,至少是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而言,几乎每次我都倾向于认为,知识的深度是胜于知识的广度的。如果我们的一个初始目标是决定一个既定的理论或概念,是否需要被抛弃、修正或利用,以便于组织我们在现场所发现的东西;这时,上述的那一点,就会变得更加重要。

读者可能会怀疑,访谈能够搜集到这么多信息么?他们可能是对的,访谈的确有其局限。访谈永远都是不完全的。我和李连江总是希望,我们在开始时就能够问某些问题——然而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三个月后才想出来的。同样,迄今为止,我的任何评论,都不应该被理解成贬低其他证据类型的重要性。几乎没有多少主题,可以仅仅依赖或主要依赖访谈来展开研究。我发表的文献中,几乎每一篇,书面的资料来源至少都占到所有引用资料来源的一半以上。在填补论证中缺失的连接环节时,在识别合适的概念框架时,访谈都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尽管如此,仍旧无法避免其是片面性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其他人开发出来的材料可能成为无价之宝"的原因了。有好几次,卓越的二手资料来源,帮助我和李连江查询到了我们打算使用的理论与概念;同时,还引导我们修改了对我们的研究内容的理解。就这一目的而言,我遇到的部分最好的书面材料包括:(1)中国研究人员的现场研究[包括一本内部书籍(Zhao and Wu 1990),对我进行的关于地方人大的研究而言,这本书非常重要];(2)官僚体制内部的通信与文件,这些通信记录和文件,使官员跟他们工作中所面对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对研究乡村选举活动的实施而言,这些东西具有核心枢纽的作用);(3)未出版的和正在编辑的文章与信件,我和李连江从一个与乡村题材有关的杂志的编辑人员那里,得到了这些材料,而这个杂志的特约记者非常多而且遍布整个中国;以及(4)来自一系列乡村调研中开放性问题的各种反应,我和李连江在1997年到2004年间做了这些调研。所有这些书面材料,给了我们更多的自信,使我们相信:我们主要通过访谈这种方式得到的解释,并不是过于特殊的,也不是明显错误的。

这也就是说,我仍旧相信:在理论构建方面,访谈能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起作用的方式就是,清晰阐明(这种方式比其他方法都更好)访谈对象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环境。对官员而言,这种说法就特别正确。像许多人一样,中国的干部通常会细致地说明他们的艰难生活,以及他们在基层面对

的、无法满足的各种要求。比如说，修路而不增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不能使用威胁的方式、实施乡村选举还得确保可靠的人胜选。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好像普通的抱怨，当然很多也就是抱怨；不过，这也会促使研究者，以一种十分直接的方式去看待这些问题——底层的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简而言之，通过揭示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在厚重的体制覆盖之下的人们感到焦虑，访谈就可以保证外部人员确定出研究问题的真正的重要之处（并且给多种解释排列出优先序）。这就是我和李连江在结束“干部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cadre responsibility system）”写作时所做的事情（O'Brien and Li 1999；也见 Edin 2003）；那时，这个主题本来不是我们的研究议题——起初，我们的实地研究是关于乡村选举的。一次次，我们听到的却是，100%的比例、硬目标与软目标、软目标的硬方面，以及其他迷惑性的术语，而我们根本不熟悉这些术语。有很多次，李连江询问，为什么很多官员几乎没有热情来执行受欢迎的政策，比如乡村选举；而同时却有极大的热情去实施不受欢迎的政策，比如计划生育、征收税费？此时，官员们想跟我们讨论的就恰恰是上面的那些术语。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解释性研究总是循环式的，从哪里开始并不重要。我们可能“从一个基于直觉的想法、一个问题、一个清晰地构建出来的理论，或者一个兴趣领域开始”（Gerring 2001：22）。这仅仅是一个地方，我们从这里出发——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Kaplan 1964：86）。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在到达中国之前以及以后，都要注意应用各类社会科学的理论；不过，也要用心思考访谈对象遇到的问题，以及他们解释这些问题的方式。来到现场时，研究人员可以像我一样，带着学科驱动的问题，比如代表制、制度化、政治参与性等；但是，却要准备好提出有关劝诫性民主问题（O'Brien 1994a）、社会嵌入问题（O'Brien 1994b），以及合法地反抗问题（Li and O'Brien 1996；O'Brien 1996；O'Brien and Li 2006）等的各种答案。

有关地方人大的访谈

1989 年年末，我完成了一本关于全国人大的书（O'Brien 1990），这本书主要是基于档案文件研究写成的；不过，在研究快结束时，也进行了一段短暂的实地研究（那时，列席（attend）1989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可能）。采访这些人大代表与公职人员，使这本书变得更加生动有趣；那时，我遇到

一个以前的学生，他帮助我离开公众的旁听席和分阶段的新闻发布会，使我得以靠近小型的小组讨论会，并展开访谈。当然，这本书的资料主要是历史性的，也是在图书馆里进行研究的产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使用了社会科学的不同理论与概念，这些都是从西方的议会研究(例如，代表制、反应性、监管、自由化、理性化)和苏联跟东欧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研究(例如，政权支持度、包含性)中借用过来的。

在1980年代末，当这本书快完成的时候，我开始设计一个关于地方人大的研究项目。我利用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概念就是——代表制(representation)，以此为基础，我写了几份研究资金申请书；当然，在那本书中我也使用了这个词语。接着，在1990年我做了三个月的现场研究，在1991年又做了六个月；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进展非常缓慢，不仅是因为当时中美关系处在谷底，还因为访谈开始时，人们总是仪式性地公开谴责美国政府与国会。除此而外，更加重要的是，访谈对象会一直提出各种问题，希望做出我的研究框架无法容纳或考虑不到的其他解释。在我自己最初构建的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上(in the Procrustean bed，意思是掐头去尾而强求适应、一致或符合)，我不但切掉了几个脚趾和一缕头发，而且还切掉了其他的部分，而仅仅留下了中间的一条腹部；显然，访谈对象留下的信息就十分有限了。因此，研究项目显然得修改了。

我主要是通过开放性的、半结构化的访谈，来重新定位我的研究的(见Wildavsky 1989: 57-102)。在四个城市(北京、哈尔滨、天津、武汉)中，我跟39个人展开了谈话；他们或在人大工作，或是相关的学者。访谈使用中文进行，没有录音机(但是通常有一个助手记笔记)，不过会立即输入笔记本电脑中。我总是想进行单独的会面，但是有时也不得不接受三五人组成的、过于热闹的座谈会讨论(the three-ring circus of ‘discussions’)。我带着一些问题有备而来，但是就像前面建议的那样，我总是给予访谈对象相当大的自由，以便讨论他们所想的东西(关于这种“有指导的长篇谈话”，见Wildavsky 1989: 77-78)；伴随我的提问的展开，也伴随着访谈所打开的崭新的思考线索，我的问题也就慢慢演化、发展、变化了。有几次，访谈对象也给我提供了书面的答复；我还发现事先做好访谈计划(这是我反对的事情)，通常会使相关代表委员、学者以及工作人员在他们的论述中做出相当精心微妙的回答。事前就提供出问题的唯一明确的缺点就是，访谈对象有时会准备一二十分钟全面的陈述，而这些陈述可能会离题过远了——因此，我不得不考虑：是

否要打断他们？还有，如果这样做了，是否会使访谈泡汤了？①

如果是在关系紧张的时刻调查敏感话题，那么，为了排除此时的恐惧感、说明我是很友好的，我则会在访谈开始时，就发放一些文件和介绍信；而这些文件和介绍信则来自于我的资助者和中国同事们。我也会在每一次访谈的开始时，就说明我自己并不是一个记者；同时，会保证整个访谈都以匿名的方式进行；也还会证实，我的目标仅仅是，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政治体制——原因在于，他们通常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有关"示教自我的途径或方法(teach-me approach)"，见 Wildavsky 1989：69]。几乎每一次访谈中，在我进行完这样的礼节性程序之后，我的访谈对象都会坚定地声明：绝不会有什么问题；同时，我也不应该担心什么；而且他们也乐于帮助我，也乐于尽自己的本分来改善中美关系。继而，在开一些玩笑和给予一些礼物之后，他们通常都会放松下来，这样大多数访谈都能进行得很好。

正如在进行其他研究时我所做的那样，在这项研究中，我没有尝试将访谈对象的回答进行编码，也没有使用任何正式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答案。相反，对这个问题(地方人大问题)——这是一个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经验分析的问题，我却真正尝试了，去尽可能榨出访谈对象跟我分享的所有信息的所有含义。如果访谈对象自以为是知识分子或当地名流，那么让访谈自我展开、成形而不去干预，就会有特别的好处。在我的经历中，经济精英、社会精英、政治精英都不喜欢被牵着鼻子走，如果这样做了，他们会觉得受到了限制和冒犯。因此，在这项实地研究中，有好几次，我都丢开了最开始设计的提问线索，而让对话转移到访谈对象想要去的地方。这样做的好处十分突出与明显。

在实践中，我们使用一种富有弹性的方法，来解决访谈问题的选择、访谈问题的顺序，还有后继的询问之类的问题；而这种富有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的方法，使我遭受挑战的可能性大增——人们挑战我的研究中各种简洁的分析类型、各种未经调查的假定(assumptions)。无可避免，会发生一些事情；不过，这些事情也可能是非常有益的——比如，访谈对象不是回答一个问题，而是反应说，我的问题提的很差：问题被错误地概念化了，或者我提出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困境(dilemma)，或者我真的错过了一个的确存在的困

① 有时，预先评价访谈问题，纯粹是为了做出某种筛选；如果是这样，在开始时，我有时会忽略最敏感的问题，然后再在访谈过程中，合乎因果地重新引入这些问题。很多访谈对象都很礼貌，以至于在此刻，无法再拒绝回答这些问题。

境(dilemma)。这类出发点是错误的,但最终结果却非常有用的问题,可能有很多;比如询问当地人大代表:"你是代表国家的利益,还是选民的利益?"人们通常会沿着类似这样的线索,说:"都代表,而这也正是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这类问题还包括,询问其他参与人大工作的个人:"如果没有更多的自治权,如果不更远离党的领导,那么立法机构如何能继续发展?"而发人深省的回答是:"发展的唯一方法是:避免矛盾冲突,同时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样,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资源、更好的工作人员,以及扩张的法律管辖权。"

起初,这些反应,会让我紧张不安;尽管如此,它们也激励我去思考:为什么我想出的问题,是如此不幸,以至于无法捕获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复杂性?它们也引导我去修正我的主要研究项目,还引导我开始探索两个崭新的主题。我最初的研究也就迅速改变为,去调查代议制在中国的功能等价物(a Chinese analogue of representation)("劝诫性民主过程(remonstrating)")(O'Brien 1994a)。同时,我决定,继续追寻下去,最终到达的一个研究领域,可以称为"立法发展之早期阶段的比较再评价(a comparative reassessment of the early stages of legislative development)";而另一个领域,就是研究不同层级的人大代表之间的关系(ties)问题。后面的这个研究领域,关注于:为什么低级别人大的领导与工作人员,更喜欢服从于"领导关系(leadership relations,lingdao guanxi)",而不是"指导关系(guidance relations,zhidao guanxi)"或"联系关系(contact relations,lianxi guanxi)"(O'Brien and Luehrmann 1998)。

解决研究设计问题的这种反复迭代的方法,贯穿于访谈的始终;这样,在现场停留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就可以对着访谈对象,来直接检验我的论证——通常,我会说:"在人大工作的一些其他人告诉我……。你是怎么看的?"我会为把理论、概念和证据整合在一起而做坚持不懈的努力(Gerring 2001: 231),而这也会影响我最终以何种方式呈现我的发现(the findings)。在这项实地研究的基础上,我需要为我写的三篇文章,确定出"关联(hooks)";这就牵涉到,要围绕着各个谜题(puzzles),把用作说明的各种轶事和来自访谈笔记的各种解读(interpretations)组织起来。这些谜题,是由在出发点上就错误了的问题所激发而产生的,包括:一个代表了选民利益的立法委员,又如何能够同时,还是国家的一个代理人?如果议会总是避免跟强势的行政权发生冲突,并且还屈服于强势的行政权的话,那么它又如何开展工作?层级较高的人大的领导们并不是国家构建者(empire-builders),可是

为什么层级较低的人大的领导们，却愿意放弃他们的自治权？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都是真正的谜题；可是，在另外的意义上，访谈也已经表明了应该如何去解决它们。接下来，写作过程所涉及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了：首先，建立起那个清晰的谜题（the apparent conundrum）；其次，去说明中国的人大代表和工作人员们是如何解释那个谜题的，以致可以让那个谜题消失掉而不复存在。而我最主要的结论就是：我们开始时持有的理论和概念（这些理论和概念，促成了最初的、有些错误的问题，也几乎阻碍了更加恰当的问题的产生）需要被精炼，以便使它们适应它们本不适用的地方；这通常是因为，那些理论和概念是来自于对西方政治现实的理解（所以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

这就是从基础开始而向上的理论化（ground-level up theorizing），它明显跟案例研究、小样本比较（small-N comparison）、假设检验以及确证性分析（confirmatory analysis）不同。我没有理论，也没有一个决定性案例。我没有相对多的例子，也不会受它们的制约而去进行系统的、面面俱到的（side-by-side）比较。甚至，我也没有一组需要由访谈和图书馆工作去证实的假设。我完全没有这样的倾向性，即：希望能够发现，由某一理论告诉我应该去寻找的东西；我也完全没有这样的倾向性，即：祈祷数据能够适应一个本不合适的概念框架。我发现的是，劝诫性的（remonstrating）代议制，而不是教区性的代议制（parochial representation）；我发现的是，嵌入性（embeddedness），而不是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我发现的是，"找领导去（looking for leadership）"，而不是渴望自治（a yearning for autonomy）——而对我来说，这些就足够了。

概括与理论上的折衷主义

保持我们的理论化过程紧密围绕资料的根基（the ground）展开，是避免呆板的、预测性的研究的好办法；之所以要避免这一类研究，是因为它们貌似坚实，但却有点难中要害（miss the mark）。如果说乡村选举所涉及的国家建设已十分接近于民主（democracy）的话（O'Brien and Li 2000），那么，我们也得说：这种做法，对于囿于学科之见且愿意听到政治参与度、选举关联（electoral connections）、民众支持度、公民社会这些词汇的同事而言，也使中国变得更不"清晰易懂（legible）"了。常见的分析性词汇术语，有很多吸引

人之处;尽管如此,但是它们却既能澄清某事,也能误导某事。① 这一点,对今天的汉学家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正处在转型之中;同时,这一点,对我们并不了解的东西而言,也是贴切恰当的(参见 Steinfeld 2002)。一旦中国变迁的节奏缓和下来,同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系统也变得更像其他国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应用那些更熟悉的理论和概念了。但是至少是对我所研究的主题而言,那一时刻还并没有到来;同时,不经批判评价,就接受那些"主导我们的研究领域和话语的、陈旧走味的概念类型"(Schwartz 1996: 112),还会带来一种威胁——这种威胁就是,总想去改编跟立法机构成员劝诫性代议制过程相关的、鲜明有趣的例子,以便令其适应单调乏味且又让人误解的、来自教区性代议制的解释。

这就意味着,或许,我们不应该过分热心于整理出"那些未经深思的大量新标签";而这也正是 Baum and Shevchenko(1999: 333)在他们的论文"这个国家的状态(the state of the state)"中,以文雅的方式,抵制并拒绝做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我会投票(暂时)支持理论上的、概念上的杂乱无章与混乱无序。当多条探究的线索都在繁殖增长、竞争对抗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让百花争艳。让我们尝试以更加分析性的方法,来解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而不要像以前那样——在一簇按照常规而定制的概念之下,聚集一堆我们的研究发现;同时,还要为把各种中国经验,带入到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中,做更多的事。让我们冒一些险,以一种可以被检验的形式,尝试去展现我们所遇到的东西;同时,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这种检验,那么,就让其他人来完成好了。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急于去找到,某些覆盖广泛且过于笼统的规律或概括性结果;当然,如果探寻到这些东西,已经能够带来更多的意义,而且已经超越了"寻找一个充满漏洞的概括性理论(looking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holes)"的话,那么,我们就尽管去做好了(Shapiro 2002: 601)。

如果我们能够注意这一建议,那么有些事情就不大可能发生了——比方说,像中国学者所做的,很快就会对唯一的、描述地方政府或国家—社会关系的模型,达成一致意见;而且这样的结果,还能够立即被学术同行公开

① 我是以这样的身份指出这一点的,即:我仔细研究过中国农村的"公民身份"问题(O'Brien 2001);还刚跟李连江一起完成了一本书(O'Brien and Li 2006)——而这本书则说明了,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是怎样为社会流动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这本书还说明了,社会流动的相关概念,是如何被用来研究中国的民众反抗问题的。

承认和接受。此外,很多范式也不需要成为具有异国色彩的中国(exoticizing China)的标准公式。而汉学家也可以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中国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就是:踮脚就能够得着的果实,挂满了枝头,也等着有人来收获;当然,只要我们对实地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新想法和新主题,保持开放的头脑即可。中国充满了本不应该是那样的事情(比如,理论上的反常性),而这些东西,却是访谈对象乐于端给我们的。我们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承认并重新包装学术同行的洞见;而这些人一直围绕着宏大的理论(grand theories)展开工作,不过实际上,那些理论只应用在了范围有限的背景环境之下。我们的最简单的、最明显的发现(比如,中国的很多竞争,既不是"超界的(transgressive)",也不是"界内的(contained)",而是"跨界的(boundary-spanning)"见 O'Brien 2003;O'Brien and Li 2006)。对一直受到各种理论和概念化方式(theories and conceptualizations)影响的学者来说,也可能是新闻,因为这些理论和概念化方式,很少直接跟中国的经验衔接起来。换句话说,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刻: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如果能去挑战那些隐藏于现存理论背后的假定(assumptions),那么他们就会摘到十分味美、相当易得的成果。

研究(再)设计包括:确定任何可能有用的理论(有一些是在事先,更多则是在后来),以便于能使我们在现场发现的东西,变得清晰易懂;接下来,要立即着手去利用实地工作研究,来思考理论与概念自身的缺陷与不当之处,这就涉及理论方面的折衷主义,还要阅读更多的比较性文献,而且,哪一方面都不能少。在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我就曾不断涉猎制度化理论(theory of institutionalization)、角色累积理论、大众反抗理论、有关选举的理论、有关执行性的理论(implementation)、委托代理理论、社会流动理论,以及法与社会的理论——任何能够帮助我理解来自访谈对象的见解之涵义的理论、任何能够把我的发现跟其他人的研究联系起来的理论、任何能够帮助我进行(略显有些节制地)归纳概括的理论。对我来说,把名不副实、立论宏大的理论跟最具地方性的细节联系起来,就是一个挑战;不过,这个挑战,也使得在中国的实地研究工作,如此地激动人心且回报丰厚。

作者致谢

我十分感谢来自 Maria Heimer、Daniel Kelliher、Stig Thogersen,以及(经常来自)李连江的有益评论。本文描述的实地工作,是由美国哲学学会(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亚洲基金会(the Asia Foundation)、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with China)、富布赖特-海斯委员会(the Fulbright-Hays Commissio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院(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太平洋文化基金会(the Pacific Cultural Foundation)、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与写作项目(the Research and Writing Program of the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以及香港研究资助局(the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of Hong Kong)资助的。1994 年以来,我的很多实地研究工作一直是跟以前的学生李连江一起进行的。关于访谈研究,他教给我的,远远多于我曾教给他的。

[参考文献]

Baum, Richard and Alexei Shevchenko (1999) 'The "state of the state."'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333-360.

Dean, John P., Robert L. Eichhorn, and Lois R. Dean (1969) 'Limitations and advantages of unstructured methods'. In George J. McCall and J. L. Simmons (eds), *Issues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Text and Reader*.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p. 19-24.

Edin, Maria (2003) 'State capacity and local agent control in China: CCP cadre management from a township perspective'. *China Quarterly*, no. 173 (March), pp. 35-52.

Emerson, Robert M, Rachel I. Fretz, and Linda L. Shaw (1995)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enno, Richard F. Jr. (1978) *Home Style: House Members in their District*. Boston: Little Brown.

Gerring, John (2001)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 Criterial Framewor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laser, Barney G. and Anselm L. Strauss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Jones, Charles O. (1974) 'Doing before knowing: Concept development in political research'.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8, no. 1 (February), pp. 215-228.

Kaplan, Abraham (1964) *Conduct of Inquiry: Methodology for Behavioral Science*. San Francisco: Chandler.

Li, Lianjiang and Kevin J. O'Brien (1996)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vol. 22, no. 1 (January), pp. 28-61.

O'Brien, Kevin J. (1990) *Reform Without Liberalization: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a) 'Agents or remonstrators: role accumulation by Chinese people's congress deputi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8 (June), pp. 359-380.

——(1994b) 'Chines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legislative embeddedness: Understanding early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7, no. 1 (April), pp. 80-109.

——(1996) '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1 (October), pp. 31-55.

——(2001) 'Villagers, elections, and citizenship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vol. 27, no. 4 (October), pp. 407-435.

——(2003) 'Neither transgressive nor contained: Boundary-spanning contention in China'. *Mobilization*, vol. 8, no. 1 (February), pp. 51-64.

O'Brien, Kevin J. and Lianjiang Li (1999) '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1, no. 2 (January), pp. 167-187.

——(2000) 'Accommodating "democracy" in a one-party state: Introduc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162 (June), pp. 465-489.

——(2006). *Rightful Resistance: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Brien, Kevin J. and Laura Luehrmann (1998) 'Institutionalizing Chinese legislatures: Trade-offs between autonomy and capacity'.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vol. 23, no. 1 (February), pp. 91-108.

Schwartz, Benjamin I. (1996)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ott, James C.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Shapiro, Ian (2002) 'Problems, methods, and theorie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or what's wrong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olitical Theory*, vol. 30, no. 4 (August), pp. 588-611.

Steinfeld, Edward S. (2002) 'Moving beyond transition in China: Financial refor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clining growth'.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4, no. 4 (July), pp. 379-398.

Thøgersen, Stig (2000) 'Cultural life and cultural control in rural China: Where is the Party?' *China Journal*, no. 44 (July), pp. 129-141.

Wildavsky, Aaron (1989) *Craftways: On the Organization of Scholarly Work*.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Zhao Baoxu and Wu Zhilun (1990) *Minzhu Zhengzhi yu Difang Renda*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Xi'an: Shaanxi Chubanshe.

3 超越正式的与官方的中文表达：语言的编码与战略

◆ Stig Thøgersen（曹诗弟）

在中国做实地研究可能并不用说中文，不过在工作过程中还是必须得有一种语言战略的，因为我们通过访谈、调研、日常交流获知的，有关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几乎所有的内容都得通过中文作为中间媒介才能够得以完成。尽管中文的语言复杂性引人注目，而且这种复杂性也会萦绕在我们的工作现场，然而，在中国的文献中，有关语言问题的方法论方面的审慎思考还十分稀少，而且我们通常参考的访谈资料甚至没有提到——访谈是直接使用中文进行的，还是通过一个翻译人员使用普通话或者某种当地方言进行的。

在本章中，我将说明，使用一种语言战略会十分有用，这会使得我们既能够关注于我们的访谈对象说什么，又能够使我们关注于他们是怎样说的。这种双重的进路（approach）通常都会成果丰富，那是因为跟我们交谈的中国人不仅会使用大量不同的方言（dialects），而且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及特定的讲话情景，使用不同的语言编码体系（language codes）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意愿。尽管我们完全不能把握这种复杂性所带来的所有方面的细微差别，不过我们却能够通过关注人们如何表达他们的意愿而得到各种有趣的线索，进而了解中国人对他们的社会现实的洞察。

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讲话者跟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的关系是如何反应在“官方的（official）”与“非官方的（unofficial）”语言编码体系中的。Mette Halskov Hansen 的那一章表明，我们是如何尝试采用特定的方法，“踩在共产党的脚印里”展开实地工作的；不过，这个问题也还有一个语言维度的方面。作为外国人，我们受到的几乎全是标准中文教科书的训练；我们读的是官方文件、新闻文章、学术作品，这些阅读进一步把我们禁锢在了官方的语言编码（the official code）体系中。如果我们想知道官僚体制之

外的中国人是如何想事情的、是如何说话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找到方法解脱这些语言约束，同时还得进入到一个相对不熟悉的、有点散漫的话语体系(discursive terrain)中。

作为起点，我将在文章的开始提及一些我在中国遇到的实际的语言问题，同时我要讨论这些问题是如何反映了语言编码体系这个问题的。本文的第二部分将举例说明这些不同的语言编码体系是如何起作用的；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是去了解云南某地的一些词汇，因为这些词汇能够标明官员和“普通人(ordinary people)”的分别。在政治性的话语表达方面，那些不同语言编码体系中使用的词汇都显得十分深思熟虑；这就意味着，对非本土的讲中文的人而言，中文表达的这种多样性使得其十分难于掌握，不过对于如何理解中国而言，这种多样性也使其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源泉。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将对语言战略中的某些要素做出建议；而在这种语言战略中，语言使用的社会—政治方面会对其十分敏感。

你说中文吗?

在1974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到那时，我已经在大学学习中文十几年了。我们的中文老师是中国人，在对话课堂上，她使用优美的、有教养的官话(Mandarin)，已经教会我们如何有礼貌地(以旧时的方式)相互问候，以及点出异国风味的菜肴；除此之外，我们的课程分成了相等的两部分，一半时间是学习当时毛泽东风格的《人民日报》社论，另一半时间是使用文言文(classical Chinese)学习晦涩难懂的哲学教材。我接触到的这种复杂的教材使我意识到，“中文”这个词覆盖了很多混杂的语言现象；即使如此，有一次我还是感到十分震惊与失望，因为我还是几乎不能弄明白一个司机从喉咙里咆哮出来的话的意思——他是北京语言学院派来到火车站接我的司机。

当然，“中文”就其自身而言是政治性构建(political construct)的结果。在不同的背景环境下，它可能狭隘地仅仅指国家标准语言——普通话；也可能广泛地指七种(有些人也会说成是十种)主要的方言组(dialect groups)，这些方言组则相互都难于理解，而且如果不考虑书面文字以及中国国家政治与文化的统一性，而仅就其自身来说，那么它们都有资格成为一种语言(Ramsey 1987)。除此之外，还有无尽的次级方言(sub-dialects)与地方性的语言变种(local varieties)，以及许多少数民族使用的非中文语言(non-

Chinese language)。显然,一旦离开受过教育的信息提供者的保护,只从教科书学习中文的外国人一下子就遇到了各种语言问题(通常,在此之前也会是这样,不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甚至是对本土讲中文的研究人员来说,在自己的方言区域之外做实地工作时,都得要么使用标准中文来交流(而此时他们的信息提供者则可能讲不好标准中文),要么就得依赖一个当地的翻译人员。

在火车站,那个司机跟我说话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实际所说的中文,那是许多日常语言中的一种——跟我们在教科书与《人民日报》中读到的中文不同。在使用了"老百姓""普通人"这两个词汇之后,我会把所有这些语言变种称为"百姓语言(Baixingese)"。与之对应,我使用"干部语言(Ganbunese)"这个词所指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干部(cadres)的正式的或官方的语言。我发现这两种语言编码体系是不同的,同时对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而言,这种不同会带来很多的信息,而这恰好正是我关心的主要领域。

我们能在各种文件、公共的信息公告、报纸上找到干部语言,它以书面的形式从中央领导集体通过不同的行政级别向下传播。它的范围包括来自于书面文本的讲话与口头报告,也包括官员与其他市民说的语言。它可以叫做官话(Guanhua),包括它的很多原型在内,它是帝国时期中国官员的老式混合语(the old lingua franca),不过它现今的形式却跟党—国家的构建(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密切相关;通过说干部语言这种方式,一个人标明了他的身份是跟国家相关的,或者至少表示这个人很有知识,而且掌握相关的国家规章制度。①

另一方面是百姓语言,也包括很多变种,包括边远山村农民说的当地的方言,也包括知识分子点缀着古典话语的各式评论;因此,它只能依据其特定的表达形式(its particular manifestations)来进行分析和理解。在某些情形下,它具有相当大的声望与威信;同时,它也能够用来表达真正属于中国文化的东西,不过这些表达与内容可能并不会自动地被干部语言所承认。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讲话者会故意使用它来把他们跟干部语言代表的思维状态体系(mental universe)区别开;这种做法暗含的意思就是,把他们自己跟党—国家区别开。

此处我所使用的干部语言/百姓语言二分法应该被理解成是一种启发

---

① 有关193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表达方式散漫的社团(discursive community)"的讨论,见 Apter and Saich 1994。

式的分类，这是为了使大家关注中文语言使用中的社会—政治方面；同时，我不会对此说成是发现了某一高级的语言分类状况（an elevated linguistic status）。不过，这也不应该跟方言问题（the question of dialect）混淆起来。对一个而北京干部来说，他是很难理解使用上海方言说出来的干部语言的，不过，其中的专门术语和思维状态体系是非常相似的。相反，同一个地区所说的干部语言和百姓语言之间，并不必然存在音系方面的差别（phonological difference）。这种差别也跟传统概念中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方言（class-based social dialects，"sociolects"）不同，因为它反映的是一种等级制，而这种等级制又主要是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很多中国人都掌握这两种语言本领，而且能够依据情况在它们之间进行转换。不过，那些没有掌握干部语言的人，在公共场合下显然具有很大的劣势。①

在某一种地方性方言（a local dialect）中，我们就能够证明百姓语言的存在；说话的人以一种自然的速度（通常这意味着速度很快）讲话，讲中文的外国人通常只能以非常粗浅的方式、在上下文的情景中理解当地人的话。因此，它对实地研究人员的语言能力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正像下面这个例子说明的那样：

在2000年，我在云南省宣威市做访谈，研究的是关于当地政府的作用以及干部—农民关系的问题。小王是当地一个级别较低的官员，因为他的中文说得很标准、很好，所以他被指定作为我在当地的向导。在我对村民的访谈过程中，我听到了很多对当地干部的批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们的谈论十分公开，并没有感到小王的存在会造成什么威胁。有一天，在一次常规访谈的间歇，我和一位欧洲同事去了附近乡镇的一个市场。而小王则离开去为自己买东西了。没有了向导，也脱离了正式访谈的环境；而且在这个乡镇，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干什么的，这样我们跟村民的交流就逐渐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形式，跟过去我使用的、通过正式方式组织的访谈有些不同。

在我们跟市场上的生意人谈话时，几乎就是在刚一开头，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的处境。一个男的说道，贫富差距（the difference between rich and poor）正在扩大，而且在过去的几年里，他看不到什么改善。他说，他们这里仍旧很落后（backward）。一个老妇人甚至说出了更多的抱怨。她说，老百姓

① 我把干部语言和百姓语言称为语言编码体系，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我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相对没有严格定义的意义上使用这样的词汇的，特别是跟那些遵循着Basil Berstein的传统展开研究工作的人相比，更是如此。

(laobaixing)很可怜。山区中的村民非常穷，而且烟叶的价格也很低。"当官的(office-holders)"都腐败；最近，在水灾之后，这个地区本得到了一些援助，但是都被官员吃掉了(had been eaten up)。村民找不到任何人申诉，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听，因此她希望我们能够把他们的处境告诉给外面的人。

谈话中的这一部分跟正式的访谈没有多大区别，理解起来也并不困难。很显然，这个男的跟我们说话时，使用的是干部语言。"贫富差距"这样的词汇是官方报告经常使用的；而"落后"这个词明显是干部话语体系的一部分，是对农村地区的描述。而那个老妇人表达她的抱怨时，使用的语言则接近于我所说的百姓语言。他提到了"当官的"，这个词是对官员的贬义称呼；她使用了老百姓(laobaixing, ordinary people)这个词，而不是干部与群众(cadres and masses)；同时，在对干部—农民关系的描述上，她使用了非常流行的百姓语言中的隐喻，因为她把官员刻画成"吃掉(eating up)"村民援助的掠夺者。

不久之前，我们身边来了一群充满不满情绪的农民；不一会儿，我们甚至就无法听懂他们谈话中的哪怕是一个词了。当然，一个问题就是当地的方言问题。技术上说，云南说的语言是官话(Mandarin)的一个变种，它是基于普通话的；但是它还是离国家标准太远，以至于除非说话的人做出认真的努力，否则我是很难理解它的。接下来他们讲的却是土话(tuhua)，这种土话中的地方性词汇跟当地标准的云南话(Yunnanese)不同；而昆明受过教育的人们说的才是当地标准的云南话①。还有一个就是语速问题；当人们调整语言去说当地标准的云南话时，他们一般会说得更慢一些②。但是，接下来却发生了其他的事情。在展开正式访谈的过程中，我至少还能理解人们谈话的内容，即使他们是用方言来说的(in dialect)；当小王把主要短语翻译成普通话之后，我一直保持了这种错觉，就是以为我正在做的访谈使用的是他们的"当地语言(native language)"。不过，听到没有经过处理的百姓语言之后，我意识到小王不但把当地方言(the local dialect)翻译成了标准的中文，

① 在中文里，方言(fangyan)通常会替代"dialect(方言)"这个词。它是一个相当中性的术语，代表了说话的人来自于一个特定的地区。土话(tuhua)，"来自泥土的语言(language of the soil)"，具有更多的隐含意义，隐含低身份等级与缺少文化水平。

② Mishoe 仔细研究了在"家庭风格(home style)"语言码与更加正式的"地方标准(local standard)"语言码之间的转换问题，而她的访谈对象则来自北加州；同时，她发现："把语言码转换成当地标准语言码的一个强有力的指标就是说话的人说得比平常更慢。"

而且他还把百姓语言翻译成了干部语言；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外国的访问者，如果是在一群干部的陪同下外出去考察（investigate）当地的情况，这就标明了我们的访谈是官方的、正式的，而此种情况下，干部语言就是正确的语言码体系了。

而在市场中发生的情况却相当的不同。当人们发现我们说中文之后，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告诉我们的内容。毕竟，他们知道自己讲的是“中文（Chinese）”，而不是某种不出名的“少数民族（minority）”语言。过了一会儿，我才知道，很多讲话的人是在向越聚越多的人群讲话，而不是对着我们讲话；而这种听众的改变，也没能够促使他们有意做点改变，以便适应我们有限的语言能力。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仍旧在抱怨——现在，他们使用的语言我简直一点也理解不了了。

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他们的抱怨，从这之中，我们到底漏掉了什么？我想，不会是那些关于干部—农民关系的可靠事实，尽管，我没办法知道事情的真相。因为在我们的正式访谈中，村民已经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关于征地问题、税收负担过重的问题、计划生育问题、贫困问题以及干部腐败问题；所以很难想象在那个市场中的人们，能为这个已经足够全面的问题清单再增添出什么东西。但是全面理解他们告诉我们的内容，仍将会是一个有力的信息来源。一旦人们不再受那些正式的表达方式的约束，人们会如何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他们会使用哪些社会类型和隐喻（social categories and metaphors）来刻画他们的问题？他们会利用哪些文化资源来抚平他们的委屈和怨恨？说了些什么，跟这些东西是如何说出来的，二者是无法分开的；同时，对形式和内容的整体性分析，可能会对干部—农民关系做出不同的洞察。

在我的经历中，如果人们以日常自然的速度，讲中文里的非标准的变种语言，那么没有几个外国人，会流利到能理解其中的微妙观点和潜台词的程度；而这种情况也不会令人感到多么吃惊。因此，对老外（foreigner）而言，在语言问题上需要有特定的战略；这一点也是显然的。不过，干部语言和百姓语言之间的区别也意味着，本国说中文的人，甚至是讲当地方言的本地人，也可能会卷入各种非常棘手的交流模式中。最近，我读了一本学术书籍，来自一所中国的大学的研究人员，展开了关于年轻农民的“意识形态状况和精神状态”的研究项目；书中包括一个他们所做的访谈的副本。在询问了有关访谈对象的家庭背景、教育状况、收入状况等几个事实性信息之后，他们进入到了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方面——年轻农民当下的精神状态。其中的一些

问题与回答如下:

问:你觉得生活非常无聊么(very boring)?

答:极其无聊(extremely boring),生活中没有目标。

问:你没有人生追求吗? (Don't you strive for anything in life?)你不愿意在将来有所作为么?

答:开什么玩笑。我能干什么? 有所作为是你们这些人干的事。

问:你没有考虑过,为你的祖国和人民负起责任(have some responsibilities)?

答:是的,小时候那样想过,可我现在是个农民。我能干什么?

问:你知道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吗?

答:我当然知道;那是关于共产党应该怎样为人民服务的。

我不能确定,这个访谈对象是否真的对生活失去了兴趣,但是他一定是对询问者的问题失去了兴趣;这些问题明显是干部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比如有关生活意义和社会责任的部分;这一定使他想起了以前学校中的各个老师。他的回答混合了恼怒和嘲笑,而且他利用每一个机会,把访谈者使用干部语言作出的表达,转换成和访谈者敌对的内容。他最后的那个回答甚至可以看成是一种谴责;同时也还间接谴责了这些研究人员:作为说干部语言的中坚分子的代表,他们也并没有实践马克思主义。这个访谈之后,是一个问题分析;研究人员指出年轻的农村人是消沉的、迷茫的、没有理想的;但是,不难看出,如果作者想了解他们的访谈对象实际上在想什么的话,他们显然应该选择其他的语言战略。

中国的社会科学家逐渐意识到语言编码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一些人已经开始在他们的调研中,引用,甚至是一丝不苟地列示出流行的谚语和措辞,比如顺口溜(satirical sayings)和押韵的短诗。[①] 曹锦清是《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作者,而这本畅销书是关于农村问题的;他认为应该系统地搜集这种类型的材料,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理解所有社会阶层的社会情绪(the social mood),特别是底层的社会情绪"。根据曹(Cao 2000: 578)的说法,这种社会情绪"是社会事实,最重要的社会情绪类型"。翻译成本文的专门术语,这就意味着对曹锦清而言,农民生活的某些侧面,是不能够使用由

① Link and Zhou(2002)研究了几个顺口溜。一个访谈对象告诉他们,政府"用保密的汇报相互通气,打算让当官的知道人们的真实想法"(p.89)。

干部语言构成的“报告”来理解或表达的;但是这些侧面却能够使用百姓语言的固定词组,以浓缩的方式反映出来。

与调查研究有关的语言编码问题,已经被社会学家李强所探讨;他刻画了他宣称存在着的两种“话语体系(discursive systems)”,一个是公共话语体系,另一个是私人话语体系。他认为这两种体系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残留物,因为在那个时候,一个术语使用错误就会带来巨大的政治灾难。李强认为,在使用正确的政治术语来表达自己意愿方面,人们现在面临的压力更少了;但是如果当地的领导在场,或者如果人们被问及一个政治类型的问题,他的经历表明,人们仍旧会退回原状,去使用公共话语体系,而且会使用标准的政治术语来提供出“正确的”回答(Li 2000: 41)。我认为,语言编码体系问题比李强标明的更具一般性,同时尽管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仍能够发现一些极端的措辞,但是我真的很怀疑,这个问题是否能够直接跟那个时代连接起来。不过,李强意识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同的“话语体系”是一个直接的、实际的问题;这是非常切题的。

所以说,牢牢掌握中文对于在中国做实地研究而言,一定是个优势;不过,认为在本土把中文说得很流利,就足以保证实现交流的成功,这是错误的;或者说,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故而认为中文语言能力不充分,就妨碍了你做出有意义的访谈研究,这也是错误的。在实际的交流中,“说中文”不是一种清晰明了的技术能力;它也无法使用单一维度的标准来度量,因为这其中包括了从“知道几个短语”到“本土说中文的人”之间的各类情形。中文里,有很多的变体语言存在;甚至也可以说,有更多的方式和方法去建立起富有成果的——或者说,毫无结果的——交流关系。

干部语言和百姓语言中的社会分层

尽管中文语言的变种很丰富,而且这也构成了一个很真实的问题,不过它也给不同的思考方式提供了门路;我将利用来自宣威市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在宣威那里,我是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研究干部—农民关系问题的,比如我的研究就包括了教育问题、政治宣传运动,也包括税收问题、社会控制问题,还有其他的方面(Thogersen 2000, 2003)。推进这个主题的一种方式就是审视社会分层问题:人们是如何概念化这个国家及其代理人的?他们是如何把自己的社会领域划分成“我们”与“他们”这两个

组别的? 从中暴露出的模式,可以帮助我理解社会—政治图景中的地方性观念和看法。

在干部语言(Ganbunese)中,国家代理人通常是指干部们(cadres, ganbu)。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干部(ganbu)这个术语应该仅用来识别政府官员(state officials),而他们则是从国家那里领取薪水(Liu 1987: 36);但是在实践中,干部(ganbu)这个词应用得更加宽泛,可以用来指代那些被赋予了正式的政治权威的人。跟"干部(cadre)"这个术语共存的,还有其他的术语;它们都跟列宁的先锋党思想有关联;不过它们也会有一点点不同的含义。另外,很多措辞都包含了传统术语"官(official, guan)",而干部语言中会使用这些措辞,比如官员(guanyuan)这个词;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这个词都在媒体中广泛使用,用来称呼官员们(officials)。这个术语的含义就是,非政治化的、技术官僚式的国家雇员;而这些人则在规则的治理下、以公正的方式行使他们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它则体现了对理性官僚制的合法性类型的探求;而这样也就取代了共产党干部的无私性与理想化的观念。另一个具有类似含义的术语是公务员(gongwuyuan)、政府雇员,而它主要用在报纸和文件中,同时现今也正在向口语中渗透。

在百姓语言里,人们也是用"干部"这个词,但是我们发现其他词汇则很少具有恭敬的意思。因为官(guan)这个汉字指向历史上落后的政体和政治制度,而这些政治制度又充满了不可靠的公共行政方面的纪录——比如,晚清和1949年之前的民族主义政府——所以,很明显人们会选择一些措辞,以便于表达"你们这些干部,跟过去腐败的官员一样,就是一群吸血鬼"的意思。那个老妇人在市场中使用的术语,"当官的",通常就会以这种方式在百姓语言中使用。它几乎总是体现负面的含义,因此干部自己绝少使用它。

在干部语言里,涉及政治权力时,穷人被称为"群众(the masses)"。不过,对这个术语而言,也还有几个其他的选择。在农村地区,"农民(peasant)"这个词通常在两种语言编码体系中都会使用;它是作为"干部"直接的反义词出现的。农民这个词是十分新近的舶来品,来自于日本;具有强烈的"被动、无助、未开化"的含义(Cohen 1994: 154-55)。比如,一些乡镇领导谈到他们治下的农村人口时,会以明显高人一等的语调说"我的农民(my peasants)"。新近出现的一个替代词汇是"村民(villager)"。它表达的信息是,一个人拥有一定的法律与政治权力;同时这个词在使用时,通常跟乡村选举、诉讼等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它跟公民(citizen, gongmin)这个术语有关,但是却具有明显的更低的身份,因为它是与农村地区联系在一起的。

在百姓语言里，“干部”这个词最流行和常用的对应词是“老百姓”（按照字面来理解，它是指100个老的姓氏）这个传统术语；在上文中，我把它翻译成了“普通人（ordinary people）”。老百姓绝不局限于村民，但是村民却通常使用它来表明，他们自己是排除在政治—行政精英之外的。就其自身而言，这个术语体现了对姓氏集团之属性的利用；同时那些跟宗族有关的隐含意义则表达出一种民族根源性和起源上的中国性（a sense of rootedness and original Chineseness）。

在现实生活的话语体系里，干部语言和百姓语言表现为适合于不同特定场合的语体风格；不过为了不同的目的，它们也能够结合起来。这方面的一个实例就是，曾在宣威市张贴出来的一张非官方海报。1999年，宣威市的一个乡政府在某村征了一块地，而村民对他们得到的补偿很不满意。他们展开了强烈的抗议，但是没有一点用。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是，七个村民被带到法院，并被判赔偿170 000元；因为他们的抗议活动造成了这些损失。村民们可以采取的最后对策就是，在2000年1月，在政府所在地的墙上张贴了一张海报。

海报标题使用的称呼术语是“父老乡亲（fellow villagers，fulao xiangqin）”。这个短语的含义是，具有亲属关系和来自于共同的地方；因此可以起到建立共同社区的作用，这也就明显没有包括乡镇的上层领导在内，原因在于他们总是构成局外人的角色。这个术语后来还用在正文中，直接呼吁并恳请大家给予经济上的支持；这个词也出现在了结束句中。

在正文中，村民们通常使用群众（qunzhong）这个术语来称呼自己，同时使用“乡政府（township government）”这个词来称呼自己的对手。我认为，这里使用的群众这个词，强调了官方当局应该对村民持有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因为根据“群众路线（mass line，qunzhongluxian）”原理，党应该服从、听取、服务于群众的利益。村民们声称，政府没有履行这个义务和责任，所以在正文里，出现“群众”这个干部语言中的术语是有用的。村民（cunmin）这个词，仅在涉及法律权力的句子中使用；比如在七个村民（villagers）遭到逮捕、在法庭上被审判的句子里，才使用。海报的签名是“×××村全体村民（all cunmin of ××× village）”，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因为事件的核心是跟法律相关的：村民们认为官方当局违反了耕地保护法。①

---

① Kevin O' Brien（2001）讨论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一个农民（farmer）利用自己作为“公民（citizen，gongmin）”的身份和权力，跟当地腐败的干部进行了斗争。

正文的最后一句话特别显眼:"只要有违法的官,也就会有不怕死的百姓(As long as there are officials(guan) who violate the law there will also be ordinary people(baixing) who are not afraid of dying.)。"尽管在海报正文的剩余部分里,利用了干部语言中群众/政府的二分法,说明了干部们的工作不力、无法达到党—国家标准这一情况;但是这个结束句却使用了传统百姓语言中的术语,这就表明了,政府向村民征地,只不过是为那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增添了另一个实例而已,而那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就是官员虐待平民的问题。

后来,这个故事出现了有趣的转折;那是因为在2003年7月,以前的乡党委书记被判入狱15年,理由是他从企业家那里接受了贿赂;而那个企业家,就是中标来开发从抗议村民手中征得的土地的人。新华社在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把党委书记称为带引号的"乡官(township official, xiangguan)"。这个引号表明了,这是当地人民怎么看待他的;而这个1949年之前的术语,"乡官",则表明他沾有了旧政权的种种恶习,而不是具有现代性的、符合法律理性思维模式的、真正的共产党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官方媒体就使用了一个不包括在标准的干部语言词汇之内的术语;这就表示,他们是跟一个腐败官员有距离的(人民网2003.7.31)。

在上面讨论的例子中,不管是对于干部语言还是对于百姓语言而言,基本的社会分层都是非常相似的;尽管人们会选择不同的术语,来刻画这两个组别:一组是代表政府采取行动的人,另一组是所有人口中剩余的其他人。不过,在其他的访谈中我还意识到,在很多情形里,贫困的村民倾向于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划分他们的社会环境。对他们而言,当地社会的等级制,主要是由"拿工资的(salary-takers)"和农民(peasants)构成的。这就意味着,学校教师、工厂工人、当地烟站的工作人员,流动成了社会分层模型中的顶部阶层。这样做的理由也是明显的:干部身份以及蕴涵于其中的政治权威性,在某种环境下,并不具有首要的重要性;而这种环境主要是指,当地并没有什么经济资源可以拿来享用的情况;甚至在这种环境下,村党支部书记都很难实现收支平衡。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成为一个拿工资的人,就变得很重要;原因在于,这会意味着有足够的现金来养活家里人,而他每月也都会从外面拿回来这些现金,根本不用考虑收成变差的情况,也不用考虑农作物在市场上卖不上好价钱的情况。在我对干部的访谈中,"拿工资的"和"农民"这一对词汇从来没有出现过;这对词汇主要是由贫困的村民在使用,不过,这却标明:对他们而言,政治资本并没有经济资本重要;而这也就提出了

新的问题，那就是：宣威的村民们是如何理解近来的社会—政治变革的？

利用这些例子，我想说明，人们在说话时会精心选择文字和措辞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在某种给定的情况下，为了建立起社会身份以及声明某种政治合法性，语言的使用方式的确能够反映出“社会情绪（social moods）”；同时语言使用的方式也可能标明某种概念的变迁，比如在社会分层的类别被修正了的时候，就是如此。① 人们以高度的技巧和谨慎来选择文字；同时，他们转换语言编码体系的方式，以及熟练控制着来自干部语言和百姓语言术语的方式，也都透漏了，在他们的社会里他们是怎样想的，以及是如何行动的各种线索。这也就创造出了一种要设计出各种语言战略的需求，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捕捉这些线索。

语言战略的各种要素

语言战略的设计，必须要适应实地工作环境的特殊状况；也必须考虑其他的很多因素，比如，研究人员自己的语言能力、他的或她的翻译人员的语言资历、学术合作者的语言资历，还有当地方言跟普通话之间的距离等因素。在语言战略中，我将提出两个要素，因为它们对前文提到的一些语言问题十分敏感。

使用不同种类的访谈，以便获得不同类型的语言材料

正如前文讨论的，中文语言（the Chinese language）能在实地工作中起到双重的作用。一个作用是，它是一种实际的交流工具；这就要求有一种注重实效的方法，以便让访谈双方，能够使他们的语言使用方式和思维世界，去适应访谈时那唯一且独特的交际场合。另一个作用是，说话的方式会告诉我们，人们对当地社会生活环境的看法。为了利用好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如果访谈对象处在更加“正常的（normal）”社会跟语言环境里的话，他们是如何讲话的；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也需要，在其自然的生活环境下审视语言自身，或者这样说好了——要尽可能少的，因为外国人的出现而受到打扰，并在此环境下审视语言自身。

---

① 关于语言是如何使用的例子；特别是，在深圳的女性工人之间，不同方言（dialects）的使用如何反映了权力关系的例子，见 Ngai 1999。

1990年代,为了了解几代村民在20世纪经历了怎样的教育和培训,我在山东省邹平县搜集生活史资料;那时,我清楚地感受到了这种困境(Thogersen 2002)。起初,我计划让人们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回忆起了六十多年前发生的事件;而为了我能够理解,他们不得不进行改述和解释,此时我则担心,如果他们一直这样做的话,这会给他们增加更多的困难和负担。不料结果却是,一旦他们——特别是年长的老人——专注于讲述他们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时,我就很难听懂什么东西了;而当我晚上回来,跟我的中国助手一起听录音带的时候,我发现,在他们的故事里有很多模糊不清和相互矛盾的观点;而这些东西,我本来在访谈的过程中,就应该弄清楚的,但实际上却没有搞清楚。所以,如果我仅仅把语言看成是一种实际的工具的话——为了能使我听懂,必要的时候,我就当场打断他们——那么我会错过很多原汁原味的内容;但是,如果我只是简单地让他们来讲,那么我只能理解他们告诉我的部分内容。这就促使我转而依靠一种更加具有弹性的战略,而在这样的战略里,针对不同的访谈类型,会有各种不同的交流方法。

对于大多数访谈对象,我展开的访谈可以称为对话型访谈(dialogue-type interviews);此时,我把语言主要看成是交流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渴望做到的是:建立起关于访谈的共同且清晰的说明和定义;那就是,它是一个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我尝试去了解更多的有关中国农村教育的内容;同时显然的是,关于中国农村教育这个主题,访谈对象是有很多可以说的东西的。一开始,我就介绍我是谁,我进行的研究是跟什么有关的,进行这次特殊访谈的理由是什么(有关访谈的更多细节,见 Solinger 写的那一章)。当然,这种展示并不能克服访谈中存在的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但是,如果大家都认为交流的目标是为了使访谈者更好地理解某一主题的话,那么这种展示,就有可能使大家加入到一次有意义的对话中来。利用这一方式,访谈成为一个逐渐澄清事实的过程,其中伴随着打岔、重述、协商合作,也就不是访谈对象自己的一场长篇独白,同样也不会是一系列的问题与回答了。

这种对话型访谈传达出来的是一些故事,但是访谈对象会忽略那些故事的讲述方式;原因在于,访谈对象有时是被迫改变他的或她的表达方式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使交流变得更方便。为了更严谨地研究语言的使用,我还开展了一定数量(我称为)语言抽样型访谈(language sampling interviews);此种访谈的主要目的是,为纯粹语言分析搜集资料。在夜晚,我们接下来会

播放录音带听，同时分析并讨论，语言的使用、隐喻、固定词组等很多问题。在宣威市，后来我有机会进行了几次录音，而且还把其中的几个做成了打印版本。这些打印本是用标准中文写成的；所以，当我把它们跟录音中的口头词汇比较时，我就获得了有关术语用法和修辞风格的更准确的看法。使用这种方法分析访谈资料，是一件费时的工作；因此，我不得不把它们局限在少数的实例上，但却是十分有用的训练，因为这可以提高一个人对语言的敏感性。

在访谈中，充分利用好第三方

很多访谈都有外国研究人员参与其中，此时会有第三方在场；这个第三方当然是为了便于交流而存在的，而其使用的方式可能是，在中文和一种外语之间进行互译，也可能是把彻底的方言或局部变成了方言的语言翻译成普通话。这个人可以是研究人员的学术合作者或学术助手，或者是一个职业的翻译人员，或者是当地的学生、教师，或者是通晓普通话和当地方言的干部。无论如何，这都将为交流过程增添一种额外的联系；同时也还通常会起到过滤器的作用，因为他会让语言的使用变得标准化、正规化，也会精确地清除掉那些能够告诉我们很多有关当地观点的短语。访谈对象们经常会尝试调整自己，以便适应第三方中介人员“有教养的(educated)”而且政治上正确的语言；同时，当他们的话被翻译成英语或中文时，这些话语还会被进一步规范化。

在我的经历中，我曾经是一位处于中国的研究人员，也曾经是到访丹麦的中国社会科学家的翻译人员；基于这些经历，我认为，要想成功地使用这种类型的语言助手，最关键的就是，要向翻译人员尽可能详细地介绍研究项目。因为邹平的那位老者讲的是当地的方言，所以我有时会让我的中国研究助手，把它翻译成普通话，或者从普通话翻译成当地方言。他已经充分地了解了这个研究项目的总体目标；但是不久，我才真正意识到，让他也理解每一次访谈的目标，甚至是每一个问题的目标，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我常阅读中文资料，但却说得相对少一些；因此，他不得不把我来自书本而且可能是十分蹩脚的措辞，翻译成当地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能够理解的说法；而在此过程中，则包含了一系列跟语言相关的决策，而他要做好这些决策的话，只有去准确理解我想要知道的到底是什么。

对这个第三方服务人员的介绍中，应该包括每一次特定案例研究中遵循的语言战略的内容。在每一次访谈的过程之中，都应该给翻译人员确立积极主动、合情合理的角色和作用；同时他们也应该清楚知晓：如果他们要

求访谈者对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他们也不会被看成是不称职或不胜任的。但是，这些服务人员应该知道，不同的访谈目标要求有不同的交流风格相匹配。在对话型访谈中，他或她应该以自己的理解详尽说明、重新阐述访谈者的问题；也应该适时打断访谈对象，以便于及时澄清观点；当然，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与之相反，在我所说的语言抽样型访谈中，其核心与精华就是：翻译人员必须知道，只要访谈对象们愿意，他们就应该给予足够的空间来讲述，不应该受到不必要的打断。

如上所述，向研究中的翻译人员做概述和介绍是很重要的事情；同时，如果访谈中还有外国语言出现的话，那么其重要性就更大了。只要是翻译人员，他就应该知道，在下面两种不同的情形里，他们的作用是极其不同的：一种情形是，他们就是交流过程的组成部分，目标是为了建立起对访谈的公共的理解和默契；另一种情形是，他们被看成是一个机器，不过倒是能够神奇地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在后一种情形里，一些人希望顶级的职业翻译人员能起作用，但是，这种期望是建立在对语言的幼稚的理解之上的；因为不管怎样说，很多不讲中文的外国研究人员，都是通过学术同事或英语系的师生来展开工作的；而对这些人来说，翻译不是他们的职业，而只是差不多得到了较好开发的实际技能而已。为了把工作干好，这些人——甚至是真正的语言专家——也需要被告知，我们在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而语言抽样型访谈是如此之特别，使得其中极端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事情会以那样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一点很重要；同时，还要让翻译人员参与进来，以便寻找到各种隐喻、地方性措辞和其他有趣的语言现象。这一类语言现象，在当场，是难以被完美地翻译出来或解释清楚的；但是，在访谈之后，却能给予更加详细彻底的谈论。

结　论

如果我们想超越“官方的或正式的中国”，那么我们就必须尝试着，穿透官方的或正式的中文话语体系来观察中国；也还得尝试，透过官员和媒体语言中所反应的有关中国社会现实的句子来观察中国。我认为，访谈资料并不是只在分析语言的使用时才是有价值的；或者说，我并不认为：所有的实地研究人员，都得成为社会语言学爱好者或者是语言人类学爱好者，才能使访谈资料变得有价值。我个人从没有做到这样的事情，即：利用少量的、口

头交流的底稿，就能够进行详细的交流技巧分析。① 不过，我认为，如果暂且不考虑我们的研究工作到底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哪一个学科的话，那么，认真仔细地注意语言的使用，是能够为实地研究增添额外的维度的；也能够使访谈对象的“社会情绪”和主观现实更加清楚地显露出来。还有很多创造性的语言应用和丰富的语言资源需要我们来学习，对于远离语言学的社会科学家所展开的实地研究来说，也是这样的。

本书 Elin Sather 的那一章中，她注意到：在中国进行的实地研究中，各种语言技能通常被看成是“一个指标（a marker），能够把外部人（outsiders）和内部人（insiders）区别开”。我认为，至少是在讨论口头表达的流利程度时，如果我们能把语言技能看成是研究设计战略中必须加以考虑的要素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收获到更多的东西。当然，在中国做实地研究时，你能够说中文，这会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但是，语言实际上却是一个问题，甚至对讲话非常“熟练”的外国人而言，也是这样的；同时，对很多本土讲中文的人来说，语言也会是个问题。这主要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各种语言技能问题只是许多因素中的一个，而这些因素则共同决定了我们能够从现场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的人们那里学到什么。

作者致谢

我非常感谢讨论会的参加人员，他们提出了有用的评论；也感谢 Maria Heimer、Mette Halskov Hansen、Kevin O' Brien 以及 Jakob Steensig，他们在我写作的不同阶段，提出了很有帮助的建议。丹麦发展研究基金会慷慨地资助了我在云南的实地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Apter, David E. and Tony Saich (1994)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o Jinqing (2000) *Huanghebian de Zhongguo. Yige xuezhe dui xiangcun shehui de guancha yu sikao*

① 如果这类研究能够跟社会学分析（而不仅仅是语言学分析）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它也会是令人着迷的读物。有一个来自泰国的例子，可以在 Moerman 1988 的作品中找到。

[China along the Yellow River. A scholar's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rural society], Shanghai: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 2000.

Cohen, Myron L. (1994)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ventions in Modern China: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Peasant', in Tu Wei-ming (ed.):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151-170.

Li Qiang (2000) '"Xinli erchong quyu" yu Zhongguo de wenjuan diaocha' [The 'Two Psychological Area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 China], *Shehuixue yanjiu* no. 2, 2000, pp. 40-44.

Link, Perry and Kate Zhou (2002) '*Shunkouliu*: Popular Satirical Sayings and Popular Thought', in Perry Link, Richard P. Madse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Popular China. Unofficial Culture in a Globalizing Society*, Lanham etc.: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89-109.

LiuYuqiao, ed. (1987) *Dang-zheng ganbu da cidian.* [Dictionary for party and government cadres], Xi'an: Shaanxi renmin jiaoyu chubanshe.

Mishoe, Margaret (1998), 'Styleswitching in Southern English', in Carol Myers-Scotton (ed.), *Codes and Consequences. Choosing Linguistic Varie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2-177.

Moerman, Michael (1988) *Talking Culture. Ethnography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Ngai, Pun. (1999), 'Becoming *Dagongmei* (Working Girls):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Reform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 42, July, pp. 1-18.

O'Brien, Kevin (2001) 'Villagers, Elections, and Citizenship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vol. 27, no. 4, pp. 407-435.

Ramsey, Robert S. (1987) *The Languages of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enminwang 2003.7.31, http://unn.people.com.cn/GB/14802/21692/1993493.html, accessed Sep. 4, 2003.

Scott, James C.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øgersen, Stig (2000) 'Cultural Life and Cultural Control in Rural China: Where is the Party?', *The China Journal*, vol. 44, June 2000, pp. 129-141.

——(2002) *A County of Cultur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Seen From the Village Schools of Zouping, Shando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Parasites or Civilisers: The Legitima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ural Area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 no. 2 (Sep. 2003), pp. 200-223.

4 调 研

——获得家庭收入数据的三种方法

◆ Bjorn Gustafusson(别雍·古斯塔夫森) Li Shi(李实)

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变化。工业部门增长迅速,同时经济体也正朝向市场经济转型。劳动力市场的演变,也正伴随着城乡生活标准的巨大差异。而上述的这些变化,也正以不同的速度,发生在这个幅员广阔、人口稠密的国家的不同地区。尽管很多家庭正在改善他们的生活标准,但是余下的家庭却被抛在了后面。因此,中国的经济不平等正在增加。

对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来说,如何去刻画与分析这种变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今天的研究人员,在研究贫困、收入不平等(income inequality)、所得不平等(earnings inequality)、收入与所得决定(income and earnings-determination)、所得的性别差距(the gender earnings gap)、少数民族的经济状况等问题时,具备了比以前更好的研究条件。现今,研究中国的研究人员,不再像过去那样,开展统计分析时会受到制约;而过去,可以得到的只是官方的统计出版物。现在,他们可以使用现代的定量分析方法,对个人与家庭的微观数据(microdata)进行分析。

本文描述并讨论,在有关中国家庭收入问题的部分研究中,使用到的定量数据;目的是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些数据的优势与劣势。我们会利用到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其他人的研究结果。由于相关的研究文献数量巨大,因此,我们的研究所覆盖的范围,很可能是不完全的。

在论及从中国个人与家庭中如何获得数据的各种战略时,我们发现,在不同类型的战略之间做出区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类战略是:数据是由研究人员发起的搜集过程的产物;而这些研究人员则处在搜集过程的各个阶段的中心——明确表述研究问题的阶段、数据搜集的设计与规划阶段、监管现场工作的阶段、编码阶段、精炼数据以及分析数据的阶段。

有几个原因,致使这种战略十分吸引人。它允许研究人员向调查对象设计各种问题,而这就可以使这些问题,跟研究所涉及的概念框架相匹配。如果成功了,那么,这种战略的优势就是:研究人员可以完全控制研究的整个过程。因此,这一战略具有的潜力就是:能够提供出,跟研究者设计的问题相关的、高质量的数据。

然而,这种战略需要研究人员长期参与其中,还需要有长期的支持与赞助。这两个要求结合在一起,就意味着,研究人员发起的数据搜集,通常都会受到调查覆盖的地域和时间范围的限制,由此,我们可知,这种战略难以用在分析跨区域的变化,以及它们沿着时间的变化(variations across areas and their changes over time)上。此外,总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一个地区的研究结果,可以转而应用到其他的地区。

第二类战略是:研究人员依赖于中国统计部门常规调研搜集的数据。文化大革命以后,国家统计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NBS)恢复了城乡收入调查。这些调查为城乡收入分配和收入分布情况,提供了基本的信息;数据信息每年以中国统计年鉴的方式正式出版。

得到这些数据资料之后,研究人员就可以集中在对研究项目进行分析的部分。这种数据以协调一致的方式,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上搜集而来;它可以用来分析地区差距,及这种差距的发展变化;也可以用于研究其他问题,特别是那些无法使用从相对较少的地区搜集数据来仔细考察的问题。因此,这种获得数据的战略被广泛采用。然而,它有用的程度依赖于:国家统计局搜集到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数据是以何种方式搜集的;能否得到以便用在研究中,以及如何可以得到以应用于研究中。

在数据质量(要以宽泛的意义看待这个词)和数据代表性方面,研究人员可以对这两种相互替代的战略,进行一下权衡比较。不过,我们主张,就搜集家庭收入的数据而言,通过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收获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开展实地工作过程中,以及数据登记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一下国家统计局的经验。在数据搜集的阶段,研究人员的作用就是,形成调研工具,并应用到国家统计局抽样框的子样本中去。这种方式需要获得机会,并要有能力跟统计局的工作人员进行合作。此外,应用这种战略的研究项目,不适宜于单独一个研究人员做,而需要有一个研究团队,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使付出的努力获得成功。

这里,我们还要再提一下本文覆盖范围的局限问题。我们集中于家庭数据。这就意味着,我们很少包括研究地区差距时使用的数据;而这类研

究，通常使用的是人均 GDP 的数据（有关最近的研究贡献，见 Yao and Zhang, 2001, Bhalla et al. 2003，他们的分析是基于省级 GDP 的；而 Song et al.（2003）使用的则是城市水平的数据）。

研究者发起战略

为了说明研究者发起战略的多样性，我们列举了一些有关中国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结果，使用英文，发表在 1998—2003 年夏的学术期刊上。①

在表 8.1 中，我们列举了 25 篇学术论文。按照研究主题，它们被分成三组：中国农村部分（最大的一组）；中国城市部分（最小的组）；以及位于二者之间的移民与迁移组。在每一组内，文章按照调查的年份排序。在表格中，我们也说明了调查的范围和地点、观测值的数量、中国的合作单位，以及主要的研究目的。

在表格中，有的论文是基于一次调研的，不过，也有例外存在。首先，有的论文使用了多于一次的调研。有时，这是因为研究设计的要求，因为研究关注的是沿着时间的改变。在表格中，有两个这样的研究，这两篇文章都跟中国农村有关。第一篇文章是 Benjamin and Brandt（1999）写的，他们采用长期的视角，比较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跟改革后，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作者使用了由日本占领机构在 1935 年搜集的数据（在其他几篇文章中也有分析，例如 Benjamin and Brandt 1995, 1997），以及来自相同地理区域的近期的数据。另一个例子是 Li and Zhang（1998）的文章，他们比较了计划经济时期跟改革早期的教育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这个研究使用了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数据，这就意味着研究人员认定，跨区域的变化（variation across area）没有跨时间的变化（variation across time）重要。

有一些研究人员，对比较乡-城移民的收入跟城市居民的收入很感兴趣；而他们在研究设计中选择使用了两个调研（Knight et al. 1999）。在其他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在选择使用超过一次的调研时，都是在大体相近的时间点

① 这是有选择性的列举和分析。没有包括 1998 年之前发表的研究，这就意味着，我们省略了以前的研究，比如 Hussian et al.（1994），Rozelle（1994），Cheng（1996），Meng and Miller（1995）以及 Meng and Kid（1997）。我们也省略了很多专著，如 Sato（2003）。

表 1　使用研究者发起战略搜集中国家庭数据，且发表在 1997—2003 年间学术期刊上的部分文章

有关中国农村的部分

参考文献	调查范围	调查地点	调查年份	观测值的数量	可能的中国合作单位	调查的主要目的
a) Benjamin and Brandt (1995), (1997)	a) 21/22 个村庄	中国东北	a) 1935	a) 1049/1094 个家庭	伪满洲国国务院实业部	1930 年代，妇女在农业中的作用，以及要素市场的运转状况
b) Benjamin and Brandt (1999)	b) 30 个村庄	中国东北	b) 1995	b) 780 个家庭		b) 收入不平等状况的长期变迁
Li and Zhang (1998)	a) 一个生产队	a) 河北饶阳县五公镇五公村	a) 1978	a) 232 个家庭 983 个个人		改革前后，教育与工作补偿之间的关系
	b) 中国官方的农村收入调查	b) 四川省	b) 1988—1990	b) 2 734 个家庭 11 231 个个人	b) 国家统计局	
Zhang, Rozelle, and Huang (2001)		江苏北部	1988, 1992 和 1996		中国水稻研究所	衰退时期劳动力供给决定
Zhang, Huang and Rozelle (2002)						评估农村劳动力市场

续表

参考文献	调查范围	调查地点	调查年份	观测值的数量	可能的中国合作单位	调查的主要目的
Matthews and Nee (2000)	a)69 个农业县中的 138 个镇、138 个村	a)25 个省	a)1989 和 1990	a)7 950 个家庭	a)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妇女的非农工作机会及对家庭收入的贡献
	b)30 个村庄	b)福建农村的 2 个县	b)1985	b)624 个家庭		
Hare(1999a)	清远县	广东省	1989	249 个家庭	华南农业大学	妇女的经济地位
Knight and Li(1997)	7 个村庄	河北省邯郸县	1994	1 000 个家庭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邯郸统计局	村庄间的收入差距
Cook(1998)	16 个村庄	山东省邹平县	1990—1992/3	257/259 个农业家庭		谁从农业领域离开？为什么？
Morduch and Sicular (2000)						干部享受到了租金么？
Morduch and Sicular (2002)						理解收入不平等的模式

Bowlus and Sicular (2003)						劳动力市场的出现
Perkins(2003)	23 个村庄	Ganglong township, Tianjin	1995	民族志材料与档案		解释村庄间的不平等
Brown and Park(2002)	位于6个省份的6个县	陕西、甘肃、四川、贵州、河南、江西	1997	446 个家庭, 40 所小学, 37 所初中	中国贫困研究中心	教育与贫困之间的关系
Kai-sing Kung(2002)	2 个乡镇	贵州省湄潭县	1999	299 个家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地权选择问题
De Brauw et al. (2002)	60 个村庄	河北、辽宁、陕西、浙江、河北与四川	2000,以及追溯性问题	1 199 个家庭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劳动力市场的演化

续表

有关中国城市的部分

参考文献	调查范围	调查地点	调查年份	观测值的数量	可能的中国合作单位	调查的主要目的
Maurer-Fazio and Hughes (2002)	26 个城市	12 个不同的省份	1992	在 430 个企业中工作的 9 397 个家庭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劳动部	性别工资差距
Raymo and Yu(2000)	声称具有全国性的代表性		1992	7 208(退休人员)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老龄人口的收入来源与收入水平
Wong and Lee(2000) and(2001)	城区	上海	1996	略少于 1 000 个回答者		经济与社会改革后果的大众观点

有关移民的部分

参考文献	调查范围	调查地点	调查年份	观测值的数量	可能的中国合作单位	调查的主要目的
Hare(2002) Hare (1999b)	6 个村庄	河南省夏邑县	1995	309 个家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工作位置的选择及其对移民工资的影响
Meng and Zhang (2001)(2 次调研)	没有报告	上海	1995,1996	a)6 609 个移民 b)2 514 个城市居民,486 个农村居民	上海社科院人口研究所	在移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分层程度

Rozelle et al. (1999)	31 个村庄	河北与辽宁	1995	787 个家庭		移民汇款跟农业生产率之间的联系
Knight, Song and Jia (2001)	4 个城市中的 118 家企业	北京、深圳、武汉与苏州	1996 年相对于 1995 年	2 900 个移民	(原)劳动部	有关在城市企业中的农村移民的不同观点
Zhao(1999)		四川	1994 和 1995	1 820 个家庭		什么因素影响迁移的决定,是永久性迁移还是暂时性迁移
Zhao(2002)	乡镇和村庄	河北、陕西、安徽、湖南、四川、浙江	1999	824 个家庭	农业部	移民回流的因果

上，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调查清楚，对于样本的选择来说，各个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或是因为，在提及搜集到的信息的时候，不同的调研恰好是互补的。

有些情形下，一次调研被用在了好几篇文章中。在邹平县搜集的农村家庭数据集就是这样的。邹平位于黄河南岸，在山东省的中部。尽管它的人口总量只占中国总人口的 0.01% 不到，但是它的农村人口却有 620 000 人，跟塞浦路斯的人口规模差不多，或者说，是爱沙尼亚人口的一半。来自于一个更大的研究项目的农户家庭数据，促使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合作起来，并且产生了许多出版物（Walder 1998）。为什么很多研究都基于邹平那组少于 300 个家庭的数据？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个调研能够提供出十分详细的信息。不过，可能更重要的是，那些家庭被跟踪调查了好几年，这样，这组数据集就成了在中国很少可以得到的面板数据集（panel dataset）。

面板数据，可以实现截面数据无法完成的目标。不过，通过询问反溯性问题，研究人员也可以在他们的数据中获得时间的维度（De Brauw et al. 2002）。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这种方法，存在两个缺陷，因为这样得到的数据并不是真正的面板数据；而真正的面板数据并没有这样的缺陷。第一，答题者可能无法准确地回忆起所有的信息。尽管像小孩出生这样的事件通常不会记错，但是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很多事件就不是这样了，更不要说回忆起一段时间之前得到的劳动报酬或者收入构成这类问题了。第二，无法获得已经去世或者已经迁移出去的人的回忆性数据。还有另外一个战略，可以获得有时间维度的数据；Perkins（2003）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搜集数据的。她利用档案研究，来补充访谈研究过程。当然，档案研究要求各种文件资料被保存下来，而且研究人员还得能够得到它们。

研究者发起战略促成的调研，可以覆盖一个单一的地区，像一个乡镇（Perkins 2003）、一个县（Cook 1998，Hare 1999a，Morduch and Sicular 2000，2002，Bowlus and Sicular 2003），或者一个大城市（Wong and Lee 2000，2001，Meng and Zhang 2001）。不过，这种研究设计也由从不同省份中选择出来的家庭构成。例如，Brown and Park（2002）使用的就是从位于不同省份的六个县中得到的数据。如果是使用实地研究，把研究工作集中于一个地区会有很多好处，但是，选择更多的地点却可以用来探究现象跨区域变化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variations across sites）。这就意味着，在设计研究者发起战略时，需要考虑实地工作的效率（或成本）跟跨区域差异的重要性之间的权衡取舍。

说到研究人员的作用以及合作的中国单位，我们发现，在表格中列举的

研究中,变化范围极大。一个极端就是 Meng and Zhang(2001)以及 Raymo and Yu(2000)。这些研究中提及的调研,是由国家统计局之外的机构展开的。这些文章给我们的印象是,研究人员没有参与到数据搜集的过程中。这些研究也很显眼,原因在于它们使用的是最大的数据集。而从样本容量的角度来看,研究人员深度参与而得到的数据集,通常都相对小,或者十分小。Perkins(2003)代表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参与到实地工作中,她在天津的那个镇待了一年,以便于搜集数据。

在数据搜集过程中,中国的单位参与到什么程度?对这个问题,表 1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样性的图景。读了这些文章之后,一个人可以感觉到,中方在参与过程中,会参与到范围广阔的活动中来;比如就可以包括,管理整个调研的所有阶段并为此负责,也可以包括,为招募研究人员从事有限的工作而提供帮助,等等。

一个有意思,也有一点敏感的问题是,在研究项目的分析阶段,中方究竟参与到了什么程度。就对中方的作用而言,如果研究项目仅是由中方提供数据,那么对结果来说,这不会是最好的。当地专家的作用是无价之宝——比如,在起草问卷时,如果中方合作者希望能够参与到数据分析过程中,那么,他们就有积极性保证数据的高质量。

出版的学术论文,通常都提供作者的工作单位这一信息。在表 1 列举的文章中,很少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学或其他机构署名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作者缺乏中国的背景。实际上,好几篇文章的作者或合作者,都是出生、居留在中国的,并且在中国获得了大部分职业训练;不过,署名时写的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大学。

使用国家统计局(NBS)搜集到的数据的战略

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官方的统计系统生产数据,比如,以统计年鉴的方式出版的数据。在中国,国家统计局(NBS,以前叫做政府统计局,th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SSB)负责全国性的统计报告,同时在省级政府,都有相应的统计局。从理想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统计局应该生产公正中立、高质、易得的信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这是一个重要而且宽泛的问题,而我们只能够进行简单地说明。

先来看公正性问题。我们大家能够注意到,公正性的要求,是使统计局

跟中央政府部门清晰地独立开的主要动机。中央政府不应该管理统计信息。不过,这种独立性永远是不完美的,因为是政府给统计局分配任务的,也是政府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的。也还有一个难以察觉的问题,就是政府雇员的自我审查问题;他们知道一些结果比另一些结果更受欢迎。任何一个国家的官方统计资料都是在这些情况下产生的。我们无法比较不同国家间统计局公正性的程度,因此,也就无法说明中国的国家统计局,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统计局而言,究竟表现得如何。

接下来我们评价一下数据质量问题。数据质量是数据生产的所有步骤的产物,也就是说,抽样阶段、工具构建阶段、现场工作阶段、编码阶段、编辑数据的阶段都会影响数据的质量。我们曾经跟来自 NBS 的官员合作过,而我们的印象就是,他们立志在每一个阶段做得专业与内行。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展开扎实细致的数据评价,原因在于,NBS 并不出版描述数据搜集过程的细节性文件。比如,抽样程序的细节就没有记录下来,这也就意味着,没有研究人员会有机会得到微观数据,以便于评价它的质量。在这些方面,如果统计局愿意改变这些老套的做法的话,那将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

统计局搜集并传播不同方面的信息。当我们提到宏观经济统计时,比如说国内生产总值(GDP),那是有国际标准可以遵循的。中国现在已经采用了国民账户统计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信息在国际间是可比的。在跟国民账户统计方面的专家交流时,我们得知,中国在这类数据的质量方面,具有较高的声誉。这种观点说明,中国国民账户数据的质量,可能比其他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的质量要高。

本文的主题是家庭水平的数据。尽管在这个领域中也有一些国际建议存在,不过,跨国信息的可比性却比国民账户数据的要低。在处理家庭数据的领域,国际交流的程度相对较低;这就使得难以比较国家之间的家庭数据质量。基于我们有限的知识,我们的印象是,NBS 搜集的家庭数据跟苏联国家搜集的家庭数据,有相当大的可比性。因此,我们的观点是,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 NBS 搜集或出版的数据,但是却不应该不加批判就使用。

NBS 常规出版的家庭收入信息,是以统计年鉴的方式发布的。例如,在《中国统计年鉴 2002》中,大家就可以找到一些有关城乡家庭收支的表格(Chapter 10)。研究人员也经常使用 NBS 出版的家庭收入与贫困信息摘要。例如,Yao(2003)就以出版的数据为起点,评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变化情况;

但是，他并没有不加批判地就接受这些数据。有时，研究人员也会要求 NBS 去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准备表格，见 Ravillion and Chen(2003)。在其他的情形里，研究人员还能得以接触到 NBS 搜集的家庭微观数据。

当寻求跟 NBS 的接触时，研究人员需要考虑，他或她能够支配的研究预算的规模。无需多言，研究人员希望从 NBS 那里得到的服务越多，那么就越需要支付更高的价钱。有一些经验的规则是不言自明的，比如说，搜集新数据要比获得已搜集好的数据花费更高；覆盖的调查单位增多，价格也会增加。不过，同样重要的是，研究人员是以何种方式接触到 NBS，也会显著地影响到价格。为了节省成本，建议直接跟负责数据产品的调查队建立联系，而不要通过 NBS 的国际合作司来联系。

在中国，整个国家的家庭调查分为农村家庭调查和城市家庭调查，而不存在一个总的调查。首先要说的是，在使用农村调查微观数据的用户中，来自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创建了一个数据集；其中的数据即由 NBS 搜集来。这个数据集由完整的微观数据构成；它们是从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搜集来的，时间是 1985 年至 1990 年，每年大约覆盖 1 000 户家庭。根据抽样设计，绝大多数的家庭都包括在每年的样本中。这就构成一个面板数据集，也就使得可以利用该数据研究很多问题，而且迄今为止，也的确有很多分析基于这些数据，而且公开出版了。①

有关中国家庭及其行为活动的分析，大都基于官方的数据，只是包括的地理区域要更小。我们从有关中国农村的内容说起，有一些研究使用了两个省份的数据，而且是好几年之间的数据；比如 Tsui(1998)的研究，就使用了 1985—1990 年间广东与四川的数据，而 Yang(1999)分析的则是四川和江苏的 1986、1988、1992 和 1994 年的数据。尽管这两个研究把自己局限在了截面分析方法，但是 McCulloch and Caladrino(2003)则跟踪了 3 311 个家庭在 1991—1995 年的情况，目的是为了分析四川农村贫困问题的动态变化情况。另外在 Kung and Lee(2001)的研究设计中，他们分析了 400 个家庭相对于 1993 年的数据，而这 400 个家庭在两个县中，一个在四川省，一个在湖南省。

现在我们转而谈谈使用了城市家庭调研数据的研究。有一些研究选择了两个省份，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Aaberge and Li(1997)以及 Aaberge and Yu

① 下面是几个例子：Chen and Ravillion(1996)，Jalan and Ravillion(1998a，1998b，1999，2000)，以及 Ravillion and Chen(1999)。

(2001)的文章;他们使用的数据都是来自1996—1990年四川和辽宁的数据,前者集中于收入分析,后者则关注于储蓄问题。Coady and Wang(2000)也使用了1986—1990年辽宁省的数据来研究收入问题。从数据覆盖的省份数量来看,处在另一个极端的是Fang et al.(2002),他使用了来自28个省份的数据。这篇文章的作者,从每一个省份的一个城市中衍生出一个子样本,并从中抽取数据,这样他们就利用了,1992年以及1994—1998年中的每一年的3 600个家庭数据,来研究城市贫困问题。

在研究中使用来自统计局的微观数据,这种战略有几个吸引人的地方。统计局的工作人员通常都长期参与自己的工作,这就使得他们成了数据搜集过程各阶段的专家:抽样阶段、访谈阶段、编码阶段、数据输入阶段与数据整理阶段。因此在这些领域中,他们比个体的研究人员拥有更大的优势。另外一方面,统计局通常并不配备分析数据、跟踪研究文献的部门。在西方国家,在统计局和大学的研究人员之间,存在着一种劳动分工;统计局搜集数据,而数据分析则通常由大学的研究人员完成。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背景下,这种劳动分工应该是追求的目标吗?

如果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则会把我们引向其他更深入的问题。这就是数据的准确性和质量问题。为了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一点见解,人们需要熟悉抽样、问卷设计、数据搜集过程、数据输入、数据整理的各种细节。我们会在后文讨论这些问题。

先来看抽样设计问题,需要提及的是,中国有两个搜集家庭数据的系统:一个是为了搜集农村地区的数据;另一个是为了搜集城市地区的数据。这反映了,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所面临的不同现实。尽管这种方法十分好理解,但是它也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使用搜集到的数据,来直接进行城乡的比较。因此,对中国整体来说,评估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提到城市家庭调查以及农村家庭调查的抽样设计情况,一个(上面已经提及的)问题就是,缺乏清晰的文档记录。另一个问题就是,抽样程序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这就意味着,在一个时期得到的知识,对另一个时期而言,并不必然是有用的。《中国统计年鉴2002》在318页提供了一个说明,描绘了调查是如何进行的。有关农村收入调查的更多信息,可以在Chen and Ravallion(1996: 26-31)的文章中找到。Gibson et al.(2003)则讨论了城市家庭调查的设计情况,同时,Park and Wang(2001)则详细讨论了,这个信息如何被利用,以便来获得城市贫困状况的官方数字的。我们在这里描述的内

容，也是基于我们跟官员们的交流，以及跟他们合作所获得经验的。

在城市家庭调查中被抽中的家庭，来自于一个更大的样本框；而这个样本框，则仅由城市户籍的家庭构成。这个调查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没有城市户口但是却生活在城市地区的农村移民，并没有被包括在调查之中。由于很多乡-城移民的收入，比城市户口的家庭的收入要更低；因此，如果我们使用来自城市家庭调研的数据的话，那么中国城市的收入差距和贫困状况将会被低估。这种偏误的重要程度，取决于乡-城移民的规模有多大；也取决于，相对于城市户口的人而言，乡-城移民的收入状况。很多观察家似乎认为，二者的数量都相当巨大；但是，我们却得不到准确的估计值。

在最近的调查中，回答者是如何被抽中的？我们先来说说城市家庭调查，其应用的是两阶段分层系统随机抽样方案（a two-stage stratified systematic random sampling scheme）。在第一阶段，根据人口规模，各城市和县域被分成五类。接着，它们又被分组在六个行政区中。在每一个行政区里，各城市和县域按照城区中员工和工人的平均工资情况依序排列。在这种分层的基础上，再使用系统抽样方案，选择出各城市和县域。在第二阶段中，样本家庭就被选出来了。结果就是，NBS 在 226 个城市和县域中选择出的 25 000 个家庭。而在这些城市和县域中的地方统计部门，则选择出其他的家庭；这样，一起就构成了城市样本中的 40 000 个家庭。

被城市家庭调查选中的家庭，会在样本中保留三年；此后，它们会被轮换出去。一旦包括在调查之内，这些家庭就会被普查员拜访；而普查员则会询问很多问题，也会帮助他们记账。被选中的家庭必须以非常详尽的方式，记录所有的收支情况。为此，家庭成员会得到少量的补偿。为城市调研招募参与家庭，已经日益变得困难。富裕家庭由于保持记账活动的机会成本很高，所以他们更可能会避免这种调查。

为农村家庭调查提供信息的家庭，也是通过多阶段抽样的程序选择出来的。我们的理解是，这个程序倾向搜集省级水平的代表性信息，正如同城市家庭调研所做的那样。这种抽样方案意味着，要把一个省份内所有的县排序，然后再从中选择不同的县——而排序是按照平均收入进行的——此后，再按照同样的方法在每一个县中，选择不同的村子。通常再在每一村子中，选择 10 个家庭。现今，在这个调研中，包括了 7 100 个村子中的 67 000 个家庭。一个家庭会在调研样本中待五年，而后被轮换出去。农村家庭也被要求保持支出的详尽记录，还要提供收入的信息。大约 10 000 个助理普查员参与其中，帮助各家庭保持良好的纪录，同时也会检查相关的信息。

农村家庭调研和城市家庭调研都会搜集有关家庭消费支出的十分详细的信息。例如,食品支出、衣物支出、交通支出、通信支出、医疗支出、住房支出、教育支出等都可以在 NBS 出版的数据中找到。在这两种调研中,也都有许多问题涉及跟收入的组成部分相关的内容,比如,就包括了个人的工资收入状况、家庭的财产收入状况等。传统上,某些收入组成部分,比如实物性的住房补贴、实物收入,以及私人住房的归算租金等,并没有核算在调研之中。如果这些收入组成部分的分布更加均等的话,那么把它们排除在外,将会高估收入的不平等性。

我们的理解是,在准备用来出版的数表时,NBS 采用的收入这个概念,会伴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得更加宽泛;这应该看成是一种进步。不过,收入这个概念的改变,也带来了副作用,就是跨时期的比较问题。一些被记录下来的平均收入的增长,并不是真实的;因为可支配收入这个概念,不断朝着改进的方向变动。这种改变也会影响到对贫困情况演变的估计;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报告出来的贫困的减少,是由于收入概念的改变,而不是由于现实中真的发生了。

尽管在农村调研中,收入信息(information on earnings)是作为整体来报告的,但是在城市调研中,它却是从每个家庭成员身上获得的。农村调研搜集每个家庭成员的人口统计特征以及教育状况,但是却并不询问每个家庭成员的收入问题。因此,农村调研并不是,为了研究经济活动的性别差异而设计的。

最后,我们转到数据的可得性问题上;研究人员似乎会以个案的方式,不同地对待。实际上,在寻找数据的提供者时,研究人员有很多选择。此处,我们提一个,就是城乡中心调查队。中国的每一个省级行政单位都有自己的城乡调查队。这样,在省级水平,就有超过 60 个官方机构可以来协商合作。前面描述的情况表明,很多研究人员能够从一个省份得到数据,而另一些人则能够从两个省份得到数据。在正式出版的论文中,有两项研究使用了超过两个省份的数据。也有研究,使用了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构建的中国南方四个农业省份的数据库;而 Fang et al. (2002)则几乎覆盖了中国所有的省份——但是在每一个省份中却只有一个城市。

混合战略

获得工人家庭收入数据的第三种战略是,把上述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在开发调查工具方面，这种战略可以使研究人员变得积极主动，特别是允许他们在 NBS 使用的大样本之外，进行家庭抽样。NBS 开展实地工作，并且会录入数据。而来自 NBS 的产品却是需要额外进行整理的数据集。这种方法很有吸引了，这是因为，它允许研究人员获得更符合他们使用的理论概念的信息，而同时还能够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

现在有好几个出版物，就是使用了以这种方法搜集到的数据的。有意思的是，有几个出版物也还被翻译成了中文出版。① 这是因为中外的研究人员，在项目的所有的阶段都展开了有效的合作。

现在有四项调查采用的是这种混合战略。1988 年、1995 年、2002 年的调研覆盖了中国的城乡；而 1999 年的调研则集中在中国的城市，主要强调了跟劳动力市场有关的失业等问题。Appleon et al.（2002）、Xue and Wei（2003；即将出版）的研究是个例外，因为它们使用了 1999 年的调研；除此而外，上面列举的出版物使用的是 1988 年调研或 1995 年调研，或者二者一起使用。2002 年调研的实地工作刚刚完成，据此的出版物即将出现。此处讨论的将集中在 1988 年、1995 年、2002 年的调研。

展开 1988 年调研的一个动机是，为了获得比官方统计中使用的更经得起推敲的各种收入概念。另一个动机是，为了得到中国整体的微观数据。1988 年、1995 年、2002 年的调研中，使用的是子样本；这些子样本，则是从 NBS 使用的、范围更大的样本中抽取来的。在 1988 年的城市调研中，抽取了 10 个身份来代表中国的东、中、西部。这个样本由 9 009 个家庭和 31 827 个个人构成。在 1995 年的城市调研中，上述的这些省份仍旧包括在内，还要加上四川省。这个样本由 6 931 个家庭和 21 694 个个人构成；每一个省份的样本量都被削减了，这是由于研究预算的减少。在 2002 年的城市调研中，重庆市也被加了进来，这样，现在共有 12 个省份。这次调研包括了一个由 7 000 个有城市户口的家庭样本，还包括了一个由 2 000 个乡城移民家庭构成的样本。

---

① 相应的文章例子，包括：Khan et al.（1992）、Risk（1994）、Gustafsson and Li（1997），（1998a），（1998b），（2000），（2001a），（2001b），（2002），（2003），（2004）、Khan and Riskin（1998）、Liu（1998）、Khan et al.（1999）、Hamlen（2000）、Gustafsson and Wei（2000），（2003）、Gustafsson et al.（2001）、Knightt and Li（1996）、Knight，Li and Zhao（2001）、Knight and Song（2001），（2003）、Li（2001）、Li and Zax（2003）、Meng and Gregory（2002）、Appleon et al.（2002）以及 Xue and Wei（2003）。书籍包括 Griffin and Zhao（1993）、McKinley（1996）、Riskin，Zhao and Li（2001）、Khan and Riskin（2001），在一定程度上也应该包括 Knight and Song（1999）。

1988 年的农村调研覆盖了 28 个省份，由 10 258 个家庭和 51 352 个个人构成。由于预算的削减，只有 9 个省份保留在了 1995 年的调研中，这样就包括了 7 998 个家庭和 34 739 个个人。出现在 1995 年调研中的省份同样出现在了 2002 年的调研中，不过，还包括了广西（覆盖在了 1988 年的调研中但却没有包括在 1995 年的调研中）和新疆（前两次调研都没有覆盖到）。2002 年的调研中，样本容量是 9 200 个家庭。2002 年农村调研的一个新颖之处就是，乡村问卷中包括了有关乡村干部的问题。问卷中包括的问题有：地理环境情况、基础设施状况、人口与劳动力情况、经济条件、税收与公共财政、乡村管理（village management）与公共服务、乡村治理（village governance）、经济网络与社会网络情况，以及社会特性和历史特性等问题。

实践中的混合战略有几个吸引人的特征。比如，通过比较多年调查的结果，我们就能够描述并分析跨时期的变化。不过，这种比较也不能带给我们完全的图景，原因在于数据并不是从每一年中搜集得的；因此如果收入不平等有所增加，那么我们并不会知道，这种增加是在每年之间持续展开的，还是在其他情形下发生。还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可以使用以同样的方式抽取的样本，进行跨期比较，但是，这些比较却跟那些相同的家庭无关，因此也就无法提供家庭水平的跨期变化（over-time variation）的信息。

总结性评论

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关中国家庭收入和行为的经验研究，也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增加。本文中，我们对研究人员们在研究中使用的数据进行了审视和调研；以数据是按照什么方式搜集的这一标准为基础，进行了分组；并且讨论了不同战略的优势与不足之处。处于一端的是，研究者发起战略；此种情况下，研究人员会监管数据生产过程中的所有阶段。处于另一端的是，使用国家统计局搜集好的数据的战略。前者的优势是，研究人员可以构建问题，并控制数据生产过程的所有阶段；后者的优势则是，可以通过使用区域覆盖广泛的数据来获得研究成果。

进一步，我们认为，在数据搜集过程中，把上述两种战略结合起来也会带来吸引人的特性。在这种战略中，研究人员可以获得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数据；这就允许研究人员，可以研究一些不容易回答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在搜集数据时没有国家统计局合作的战略中，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

还认为，参与到问卷设计的过程中，能够提供出更相关的信息；特别是，跟只依赖于NBS搜集数据的情况相比，更是如此。

混合战略要求跟在NBS工作的人员有更多的互动，跟此处涉及的其他战略相比，更是如此。各种好处会超出在研究报告之外。如果能够展开对话交流的话，那么它也可以影响官方的统计调查设计，依次也就会影响到信息的出版情况。这种影响力可能是极具价值的，因为政策制定会基于那些更准确的信息。如果要我们提出一个官方家庭收入统计方面急需改进的领域的话，那么，这就会是，对生活在城市地区的乡村移民的覆盖率问题了。尽管近来似乎已经有所改进，但是乡村移民通常在家庭统计中是很难见到的，尽管他们占城市人口总量的比例是很大的。

我们认同混合战略有很多优势，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发起的研究实践应该停止了。相反，在某些方面，这种战略的比较优势还是很大的；比如，在公共机构难于去询问涉及某些现象的问题时，以及在涉及态度看法方面的问题时。

[参考文献]

Aaberge, Rolf and Xuezeng Li (1997) 'The Trend in Urban Income Inequality in Two Chinese Provinces, 1986-90',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v. 43, iss. 3, pp. 335-355.

Aaberge, Rolf and Yu Zhu (2001) The Pattern of Household Savings during a Hyper-inflation: The Case of Urban China in the Late 1980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v. 47, iss. 2, pp. 181-202.

Appleton, Simon, John Knight, Lina Song and Qingjie Xia (2002) 'Labor retrenchment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13 Issue 2/3, pp. 252-276.

Benjamin, Dwane and Loren Brandt (1995) 'Markets, Discrimination, and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Women in China: Historical Evid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 44, iss. 1, pp. 63-104.

——(1997) 'Land, Factor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Historical Evidenc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 34, 460-494.

——(1999)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Parallels with the Pas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 89, iss. 2, pp. 292-295.

Bhalla, Ajit, Shujie Yao and Zongyi Zhang (2003) 'Reg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na',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 11, iss. 1, pp. 25-39.

Bowlus, Audra, and Terry Sicular (2003) 'Moving toward Markets? Labor Allocation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 71, iss. 2, pp. 561-583.

Bramall, Chris (2001) 'The Quality of China's Household Income Surveys', *China Quarterly*, iss. 167,

pp. 689-705.

Brown, Philip and Albert Park (2002) 'Education and Poverty in Rural China',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v. 21, iss. 6, pp. 523-541.

Chen, Shaohua and Martin Ravallion (1996) 'Data in Transition: Assessing Rural Living Standards in Souther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v. 7, iss. 1, pp. 23-56.

Cheng, Y (1996)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Income Inequality of Chinese Rural Households', *China Economic Review*, 7, pp. 155-167.

Coady, David P and Limin Wang (2000) 'Incentives, Allocation and Labor-Market Reforms during Transition: The Case of Urban China, 1986-1990', *Applied Economics*, vol. 32, iss. 4, pp. 511-526.

Cook, Sarah (1998) 'Who Gets What Jobs in China's Countryside? A Multinomial Logit Analysis',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 26, iss. 2, pp. 171-190.

De Brauw, Alan, Huang, Jikun, Rozelle, Scott and Zhang, Linxiu and Zhang Yigang (2002)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s During the Reform',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0, pp. 329-353.

Fang, Cheng, Zhang, Xiaobo and Fan, Shenggen (2002) 'Emergance of Urba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 pp. 430-443.

Gibson, John, Jikun Huang, and Scott Rozelle (2003) 'Improving Estimates of Inequality and Poverty from Urban China's Household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urvey',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v. 49, iss. 1, pp. 53-68.

Griffin, Keith; Zhao, Renwei, eds. (1993)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Gustafsson, Bjorn and Li Shi (1997) 'Types of 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1980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43, pp. 211-226.

——(1998a) 'Structure of Chinese Poverty 1988', *Development Economics*. v. 36, December, pp. 387-406.

——(1998b) 'Inequalit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1980s: Locational Aspects and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Asian Economic Journal*, v. 12, pp. 35-63.

——(2000)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China and the Gender Earnings Gap',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 13, pp. 305-329.

——(2001a) 'The effects of transit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China',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9 (3), pp. 593-617.

——(2001b) 'The Anatomy of Rising Earnings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 29, pp. 118-135.

——(2002) 'Income Inequality within and across Counties in Rural China 1988 and 1995',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 69, pp. 179-204.

——(2003) 'The Ethnic Minority-Majority Income Gap in Rural China During Transition', to be published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Gustafsson, Björn and Li Shi (2004) 'Expenditures on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and Poverty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5, 292-301.

Gustafsson, Björn, Li Shi, L. Nivorozhkina and K. Katz (2001) 'Rubles and Yuan: Wage Functions for Urban China and Russia at the End of the 80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0 (1), pp. 1-17.

Gustafsson, Bjorn and Wei Zhong (2000) 'How and Why Has Poverty in China Changed? A Study Based on Microdata for 1988 and 1995', *China Quarterly*, 164, pp. 983-1006.

——(2002) 'Determinants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 *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 10 (5), pp. 41-49.

Hamlen, William (2000) 'The Economics of Animal Farm',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66 Issue 4, pp. 942-956.

Hare, Denise (1999a) 'Push' versus "Pull" Factors in Migration Outflows and Returns: Determinants of Migration Status and Spell Duration among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 35, iss. 3, pp. 45-72.

——(1999b) 'Women's Economic Status in Rural China: Household Contributions to Male-Female Disparities in the Wage-Labor Market', *World Development*, v. 27, iss. 6, pp. 1011-1029.

——(2002) 'The Determinants of Job Location and Its Effect on Migrants' Wage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 50, iss. 3, pp. 557-579.

Hussain, Athar Peter Lanjouw and Nicholas Stern (1994) 'Income Inequalitie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Data', *World Development*, v. 22, iss. 12, pp. 1947-57.

Jalan, Jyotsna and Martin Ravallion (1998a) 'Transient Poverty in Post-reform Rural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 26, iss. 2, pp. 338-357.

——(1998b) 'Are There Dynamic Gains from a Poor-Area Development Progra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 67, iss. 1, pp. 65-85.

——(1999) 'Are the Poor Less Well Insured? Evidence on Vulnerability to Income Risk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 58, iss. 1, pp. 61-81.

——(2000) 'Is Transient Poverty Different? Evidence for Rural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 36, iss. 6, pp. 82-99.

Khan, Azizur Rahman, Keith Griffin, Carl Riskin and Zhao Renwei (1992) 'Household Income and Its Distribution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iss. 132, pp. 1029-1061.

Khan, Azizur Rahman and Carl Riskin (1998) '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Composition,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of Household Income, 1988 to 1995', *China Quarterly*, iss. 154, pp. 221-253.

Khan, Azizur Rahman, Keith Griffin and Carl Riskin (1999) 'Income Distribution in Urba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Economic Reform and Global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 89, iss. 2, pp. 296-300.

Kidd, Michael and Xin Meng (2001) 'The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 Sector: Labor Market Reform and the Impact on Male-Female Wage Structure', *Asian Economic Journal*, vol 15, no. 4, pp. 405-423.

Knight, John and Li Shi (1993) 'The Determinant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China', in Keith Griffin and Zhao Renwei (eds)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China*, London: Macmillan Press, pp. 285-330.

——(1996)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Rural-Urban Divide in China',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58, no. 1, pp. 81-115.

——(1997) 'Cumulative Causation and Inequality among Villages in China',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5, no. 2, pp. 149-172.

Knight, John, Li Shi and Zhao Renwei (2001) 'A Spatial Analysis of Wages and Incomes in Urban China: Divergent Means, Convergent Inequality', in Carl Riskin, Zhao Renwei and Li Shi (eds) *China's Retreat from Equali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pp. 133-166.

Knight, John and Lina Song (1999) *The rural-urban divide: Economic disparities and interactions in China*,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Increasing Urban Wage Inequality in China',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1 (4), pp. 597-619.

Knight, John, Lina Song and Huaibin Jia (1999) 'Chinese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Enterprises: Three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 35, iss. 3, pp. 73-104.

Kung, James (2002) 'Off-Farm Labor Markets and the Emergence of Land Rental Markets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 30, iss. 2, pp: 395-414.

Kung, James and Yiu-fai Lee (2001) 'So What If There Is Income Inequality? The Distributive Consequence of Nonfarm 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 50, iss. 1, pp. 19-46.

Li Haizheng and Jeffrey S Zax (2003) 'Labor Supply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 pp. 795-817.

Li Shi (2001) 'Labor Migr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Rural China', in Carl Riskin, Zhao Renwei and Li Shi (eds) *China' Retreat from Equali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Li, Tianyou, Junsen Zhang (1998) 'Returns to Education under Collective and Household Farming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 56, iss. 2, pp. 307-335.

Liu, Zhiqiang (1998) 'Earning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Urba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6, (4), pp. 697-725.

——(2003) 'The Economic Impact and Determinants of Investment in Human and Political Capital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1, (4), pp. 823-849.

Matthews, Rebecca and Victor Nee (2000) 'Gender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ural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9, pp. 606-632.

Maurer-Fazio, Margaret and James Hughes (2002) 'The Effects of Market Liberalization on the Relative Earnings of Chinese Wome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30, iss. 4, pp. 709-731.

McCulloch, Neil and Michele Calandrino (2003) 'Vulnerability and Chronic Poverty in Rural Sichuan', *World Development*, v. 31, iss. 3, pp. 611-628.

McKinley, Terry (1996)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M. E. Sharpe.

Meng, Xin and Paul Miller (1995)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Its Impact on Gender Wage Discrimination in China's Rural Industrial Secto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47(1), pp. 136-155.

Meng, Xin and Kidd, M. (1997) 'Wage Determination in China's State Sector in the 1980'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5(3), pp. 403-421.

Meng, Xin and Junsen Zhang (2001)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9, pp. 485-504.

Meng, Xin and R. G. Gregory (2002) 'The Impact of Interrupted Education on Subseque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 Cost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0 (4), pp. 935-959.

Morduch, Jonathan and Terry Sicular (2000) 'Politics, Growth,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Does It Pay to Join the Par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 77, iss. 3, pp. 331-356.

——(2002) 'Rethinking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with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Economic Journal*, v. 112, iss. 476, pp. 93-106.

Park, Albert and Sangui Wang (2001) 'China's Poverty Statist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 v. 12, iss. 4, pp. 384-398.

Perkins, Tamara (2003) 'Entrepreneurial Fiends and Honest Farmers': Explaining Intravillage Inequality in a Rural Chinese Township',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1 (3) pp. 719-751.

Ravallion, Martin and Shaohua Chen (1999) 'When Economic Reform Is Faster Than Statistical Reform: 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 61, iss. 1, pp. 33-56.

Ravallion, Martin and Shaohua Chen (2003) 'Measuring Pro-poor Growth', *Economics Letters*, v. 78, iss. 1, pp. 93-99.

Raymo, James and Yu Xie (2000) 'Income of the Urban Elderly in Postreform China: Polit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the Stat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9, pp. 1-24.

Riskin, Carl (1994) 'Chinese Rural Poverty: Marginalized or Disperse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 84, iss. 2, pp. 281-284.

Riskin, Carl, Zhao Renwei and Li Shi (2001) eds. *China's Retreat from Equali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Riskin, Carl and Li Shi (2001) 'Chinese Rural Poverty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oor Regions', in *China's*

Retreat from Equali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edited by Carl Riskin, Zhao Renwei and Li Shi), New York: M. E. Sharpe.

Rozelle, Scott (1994) '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 s Rural Economy: The Linkages between Village Leaders and Farm Households' , *China Quarterly*, iss. 137, pp. 99-124.

Rozelle, Scott, Edward Taylor, and Alan de Brauw (1999) '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China'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 89, iss. 2, pp. 287-291.

Sato, Hiroshi (2003) *Growth of Market Relations in Post-reform China: A Micro-Analysis of Peasants, Migrants and Peasant Entrepreneu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Song, Shunfeng, George S. F. Chu and Rongqing Chao (2000) ' Intercity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 *China Economic Review*, v. 11, iss. 3, pp. 246-261.

Tsui, Kai-yuen (1998) ' Trends and Inequalities of Rural Welfare in China: Evidence from Rural Households in Guangdong and Sichuan'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 26, iss. 4.

Walden Andrew ed. (1998) *Zouping in Transition: the Process of Reform in Rural North China*.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ong, Chack-kie and Peter Nan-shong Lee (2000) ' Popular Belief in State Intervention for Social Protection in China' , *Journal of Social Politics*, 29, 1, pp. 109-116.

——(2001) ' Economic Reform and Social Welfare: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Portrayed through a Social Survey in Shanghai'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28), pp. 517-532.

Xue, Jinjun and Wei Zhong (2003) ' Unemployment, Poverty and Income Disparity in Urban China' , *Asian Economic Journal*, v 17 iss 4, pp. 383-405.

Yang, Dennis Tao (1999) ' Urban-Biased Policies and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 89, iss. 2, pp. 306-310.

Yao, Shujie (2000)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over 20 Years of Reforms'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8, iss. 3, pp. 447-474.

Yao, Shujie and Zongyi Zhang (2001) ' Regional Growth in China under Economic Reforms'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 38, iss. 2, pp. 167-186.

Zhang, Linxiu, Scott Rozelle and Jikun Huang (2001) ' Off-Farm Jobs and On-Farm Work in Periods of Boom and Bust in Rural China'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 29, iss. 3, pp. 505-526.

Zhang, Linxiu, Jikun Huang and Scott Rozelle (2001) ' Employment, Emerging Labor Markets, 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v. 13, iss. 2-3, pp. 313-328.

Zhao, Yaohui (1999) '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 47, iss. 4, pp. 767-782.

——(2002) '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 30, iss. 2, pp. 376-394.

5 对中国人展开访谈：从高级官员到下岗职工

Dorothy J. Solinger（苏黛瑞）

我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田野里”走路说话的样子。大概四年前，具体来说就是1978年12月，我完全依靠美国图书馆馆藏的中国旧报纸，完成了一篇论文。随后我有两年一直忙于一本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商业的书。我当时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代表团的成员，我们前往七个不同的城市，其中有北京（在那里，我走进一家商店，并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访谈），长沙（在那里的室外，我蹑手蹑脚地站在一小堆正被非法出售的蔬菜旁，偷听国家商业干部之间的谈话）和天津（在那里我看到了官方禁止交易活动的海报，特别是禁止非法交易各类配给券。当时配给券在城市中还相当普遍）。

我知道商店、零售店和政府采购中所使用的术语行话。在香港，我曾经对内地来港移民进行过采访，这些移民从前在中国内地是商业系统的职工。我也大量阅读过来自中国的期刊和报纸，从这些前期准备工作中，我学会了商业行话。但是，我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去理解国有商场和他们的官僚上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很清楚，中国当时出现了一些涉及配给的问题，但我并没有意识到，种种官方的纵容和默许，使得那些本来不能获得粮票的人依旧能够搞到粮票。我不知道，从北方城市到南方来的那些掮客们是用了什么办法，发现国有企业的内部结构随着当地产出物的种类不同而有所改变。

在一个普通的国有五金商店，管理层以及内部组织是怎样的？在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国内蔬菜市场的开放程度如何？1978年的这次全会上开始有经济自由化的细微迹象。所有这些花絮对我而言都是诱人的秘密。但同时，我却很不安。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找人咨询这些问题，可能对这个人造成多大的麻烦。最后我得到的答案，绝不是完全通过直接询问所获得的。我总是盯着城市里常常张贴通告的墙壁，并小心留意张贴其上

的各种通告；我在商店里听人谈话，与国家干部们交谈；绕着自由市场散步，我悄悄观察陈列出来的少得可怜的商品。而同时，我还要防备那些一脸狐疑的营业员。在这次旅行中，我始终不能鼓起勇气去采访潜在的对话者，总是担心我的采访会使他们陷入困境。不管怎样，我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还是带走了一点点资料。更重要的是，离开的时候我带着一种兴奋之情，这种兴奋之情只有当一个人知道如下消息的时候才会产生：那里存在着一些真实的人，他们可以使我的研究充满生机。

除了1979年里一次很短的旅行，几乎又过了五年，我才再一次尝试在中国做田野调查。1983年5月，我第一次来到武汉——这个城市很快就成为我在中国的“老家”。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友好开放，市场上物资丰富，城市布告栏里没有针对某种错误市场营销实践的气势汹汹的说教。到那个时候，唯一的警示性布告只是告诫外地人需要申请城镇营业执照。那一次，以及我随后的三次访问中（1984年5月，1984年秋，1985年5月），我的研究主题是中国的工业政策。无论如何，仅仅依靠四处走走和偷偷地观察是远远不够的了。

相反，我需要与城市官员交谈，不论他们是在经济管理机构，部门办事处，还是在企业里。我希望据此弄清中央的政策是被如何解读的，以及基层官员们又是怎样执行的。理想的情况下，我也需要了解，不同的管理机构如何发展出自己的独特战略，从而在当时的国家计划中为自己这个部门找到合适的定位。我当时研究的是1979年到1982年之间中国的工业政策。我开展此项研究的时候，中国工业的那段发展时期刚刚过去，这一点对我的研究大有助益。中国政府在1979年到1982年之间做出的“经济调整”，目的在于把工业投资的主要部分从重工业部门转移到轻工业部门。这一调整政策已经完成，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谈论它在政治上并不过分敏感（在我开展访谈的时候那些政策已经不那么富有争议性）。也就是说，到1984年，人们在讨论过去失败战术的时候已经没有太多的不情愿，尽管也不是完全地开诚布公。但是，能把我的调查询问和过去的事情（而非现在的事情）相联系，这对我的研究确实大有帮助。

自此以后，我就尝到了与地方上的领导人非正式交流的乐趣。在随后的整个80年代，我所感兴趣的一直都是那个改革年代里不断发展的地方经济政策及政策执行的方方面面。我想探索的东西有：政府管理的破产及国家安排的企业合并重组、武汉市和湖北省之间的交锋（武汉市是湖北省省会）、较大规模的沿长江省际区域规划，等等。同样，只有地方官员和工厂管理

者可以告诉我有关的情况。当然，我也有机会接触作为官方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的学者。这个政策咨询委员会刚刚由当时的武汉市市长吴官正所建立。

我的下一个项目，对我而言，在某些方面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调查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别称）政策和他们所遭遇的困境时，与当地官员交谈是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这些数据是远远不够的。这一次，我必须面对新近城市化了的迁移农民，并争取赢得他们的信任。这些农民离开他们在乡村中的家，来到城市寻找生计。这项研究工作需要建立并发展一些新的社会关系及相应的技巧。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到那时为止，我所做过的最令人兴奋也最投入的一个访谈工作。

最后这个项目是我在过去六年中一直所从事的。在这个项目中，我所关注的是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问题。中央政府自 1996 年以来就积极主张，为了能使中国企业系统现代化，必须把工作能力差的工人和经营不善的企业清理出去。如同我的前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中的信息提供者不得不包含那些在各地具体开展这一工作的企业官员，同时也包括他们工作的目标对象，也就是那些下岗职工。在从事这个项目期间，我甚至有机会与北京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领导人以及许多高端学者碰面。在我过去的四个研究项目中，武汉一直是我研究的基地，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但我也利用各种机会，短期到访过哈尔滨、沈阳、天津、广州、南京、北京、兰州、上海，以查看各地之间的不同。

伴随着这一系列不同背景、不同主题和不同类型的访谈而来的，是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接下来我将讨论的主要问题有：准备工作和获取许可（主要是关于如何获得研究许可以便开展工作），发现研究问题并建立关联，如何获得帮助。接着我会描述，当我感觉到我谈话的对象不可能自愿或轻易地提供材料时，我是如何从他们那里清理我想要的资料，并弄清他们的态度的。我也会在本文讲述，当这些方面的问题变得难以克服的时候，我所采用的一些策略。最后，我将尝试解决敏感性和保密性的问题——包括我如何发现这些学术伦理问题的存在，以及我会如何处理它们。

准备工作和获得许可

有两个特别的机构对我多年来的研究非常重要。其中第一个是武汉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我能够随时随地寻求其工作人员的帮助。我的这一能力

得益于一个特殊的安排。1982 年,我还在匹兹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工作的时候,在一位研究中国的地理学家 Jimmy Hsieh(他也在匹兹堡大学任教)的建议下,匹兹堡大学主动接触武汉市政府,希望能在这两座城市以及匹兹堡大学和武汉大学之间建立"姐妹城"/"姐妹校"关系。武汉市政府派出的代表团中,甚至还有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亲属。这名官员既是代表团的领队,也是当时武汉市外事办公室负责人,一个对任何"国外的"事物都具有浓厚兴趣的人。借助这层关系,我发现在武汉我总能受到热烈的欢迎和热诚的接待,它贯穿了我早期在中国的研究。这层关系从那时起就几乎从未中断过。

1983 年到 1992 年期间,我到访中国八次。每次我都只需告知武汉方面如下事项:我要来中国,我所做研究的类型,我希望会见哪个部门的官员,还有我打算问他们的问题。然后我的申请就立刻被批准了。自 1992 年以来,武汉市外事办公室的官员已经换了几拨人了,在我接下来的八次访问中,我继续从那里获得许多的帮助。1994 年,我为世界银行提供顾问工作,研究城市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一个从来没有向我解释过的原因,武汉市外事办公室,起初同意提供帮助,随后又拒绝提供服务。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世界银行一定会在武汉市有一个常驻代表机构,而事实上该机构能安排所有我所要求的采访。

另外一个帮助我铺平道路的机构是中美之间建立起来的学术交流促进组织,当时称为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在 1984 年和 1992 年该协会都授予我学术研究奖金。随之而来的还有与中国多个城市(我自己没有任何接触)之间极富价值的联络关系和相关部门发出的许可。这些关系和许可帮助我把自己的研究进行下去。我从其他机构或个人获得的引荐,有两次来自美国政府在沈阳的领事官员,一次来自广州领事馆,还有两次来自我做中国研究的两位同事,他们曾在天津开展他们的研究,并维持了与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学者的友谊。但是,过去十年中,我的行程大多是非正式的,没有与官方机构联系起来,而是首先与那些研究方向和我的研究贴近的学者展开交流,或通过福特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的人员来联络我计划访问的城市。总的来说,在开始我的研究旅程之前,我总是先接触那些能和我交谈的人,或是那些能把我介绍给其他一些更深地涉及我研究话题的人。在过去的几年中,这种接触可能仅限于我在武汉的朋友帮我介绍几个信息提供者,或者把我介绍给他们当时在市政府工作的同学。

即使有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为我铺平了道路,可是,1991 年 7 月我还是

在哈尔滨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虽然，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已认真地与哈尔滨的外事办公室和社会科学院协商过，为我在那里的研究工作作出了一定的安排，但时机不太好。哈尔滨当时是一个特别保守的地方，敌视美国人。中国的领导层在1989年之后，认为美国正在力图使中国发生"和平演变"，所以中国需要全力阻止美国的这一努力。因此，只要是这个城市的政治精英们认为机密或秘密的任何类型信息，这些单位的官员们都不愿意透露给我。虽然我被安排在哈尔滨度过了一个月，但是当时至少有一半时间交给了繁冗的谈判。谈判中争论的问题包括：我的问卷设计、我的目的、我可以被允许访问哪些部门。在整个讨价还价期间——实际上，谈判后的时间里也是如此，因为所有的谈判都失败了——我每天都去市图书馆，在那里我发现并详细阅读了我以前从未见过或听说过的大量杂志。

同样，1998年在广州，我的同事事先给了我一位大学教授的名字，教授也承诺在我到达广州后提供帮助。但是他爽约了。我转而驻足广州巨大的图书城。这个"城"自我吹嘘说，它可以占用我好几天时间。我也确实在里面花了几天时间，每天回到我酒店的房间，我都在书桌前读书，而不是给干部们提出问题。由此得出的教训就是，事前要尽可能做好准备，但事到临头，也要能在新的情况下迅速做出调整。一旦到了现场，就要尽可能少地损失现场时间。

另一句格言是，发动每一个能帮得上忙的人，请他们来帮你与潜在的信息提供者见面。我的一位前本科学生在南京大学度过了两年时光，在此期间我正从事"流动人口"的研究。因为她在那里，我决定做那个城市流动人口的田野调查，我知道她可以请她的同学陪我做街头访问和为我翻译农民所讲的方言（她的同学中许多人都熟悉当地方言）。四位年轻大学生就这样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还有一次，与此类似的幸运降临在我身上。1992年2月，我正为流动人口研究的田野调查做准备。那个时候，我认识的一位教授已同意选两个研究生在武汉给我做助手（我是在研究武汉80年代中期市场改革政策的时候认识这位教授的）。几个月后，保守的政客们开始阻挡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方案，这位教授就改变了主意，不再愿意提供帮助，也拒绝见我。但是，在我到达酒店后，两位研究生当中的一位秘密来见我。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开展了研究工作。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他的名字。

和所有的老关系都保持联络，不管他们看起来如何地微不足道，这一直都对我大有助益。1999年，我想访谈近期被解雇工人的时候，我和过去十年

甚至十五年中在武汉以任何方式结交的私人朋友联络。通过这些人，我能访谈一个同事的同事下岗了的妻子、我以前住过饭店里刚被解雇的女服务员、我朋友单位给予援助的贫困社区里的居民（我的朋友是一位城市地方志研究者，我和他是在1990年认识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一个研究生的朋友的邻居社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在我认识的小说家家里做事的女佣。一个UCI的研究生，他的前任老师的女儿担任我的非正式翻译，以帮我应对说武汉方言的信息提供者。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当外国学者们开始从中国政府那里申请他们研究项目的许可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使用一个技巧，就是在描述自己项目和兴趣的时候，使用最良性的措辞——这样就不会丧失与一些人访谈的机会（这样的人往往处于关键位置，能提供你所需要的信息）。因此，当我开始进入中国产业政策研究，我解释说，我当时的家乡，匹兹堡，有许多类似中国工业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所以我想了解中国的正面经验。当我开始着手研究有关农村居民进入城市的情况，我赞扬中国，在我开始这个项目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相比美国城市有这么少的无家可归的人流落街头。在这两个例子中，我的研究目的，对那些要批准我项目的中国官员来说，必须看起来是无害的，甚至是奉承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从来没有在申请我的研究项目时遭遇任何麻烦。

对中国人的访谈：从高级官员到下岗者

我从来没有不做任何准备就到“场”（田野）。我总是事先做了大量的阅读。这个做法当中有很多原因。首先，广泛的阅读使我把手头的问题纳入一个更大的范围来考虑，不管是从历史、比较，或理论角度。它还可以帮助我熟悉这个领域里的专业术语、做法和目的，不论是当前通行的还是那些与我的调查题目有密切关系的。比如说，如果一个研究者知道，曾经举行过某个会议，一些关键决定就是在这个会议上作出的；某个政府机构或地方实体或管理梯队曾经在他们内部有过争议；甚至知道，城市官员们认为某些任务尤其令人侧目，这位研究者就能通过这些线索揭示更多的信息，这就比他仅仅只是在访谈中提出一些含糊的普遍性的问题要强得多。

其次，许多时候，当我通过正规渠道去中国做研究，中国城市的外事办公室会提前指示我要提交给他或她我计划要问的问题清单。为了组织这样

一个清单，我需要知道很多我研究课题的相关细节，特别是它的复杂的政策背景，直接牵涉其中的企事业单位，和任何潜在的陷阱。如果我没能让我的信息提供者相信，我已经知道一些他们掌握的情况，他们可能在与我见面的时候仅仅带来很少的资料。

在这里，我记得，在我搞产业政策研究期间，在一些资料中读到武汉机械局曾经遭遇到的窘境。80 年代初，武汉机械局开展了调整经济以摆脱对重工业过度依赖的工作。这个局管理下的工厂被告知要削减生产，国家对它们的投资也会大大降低。在许多工厂，工人和技术人员甚至不得不去学习如何制造一些与过去数十年生产过的东西完全不同的产品。但是，当我与局长们交谈的时候，没有人敢提出当年他们的下属企业对他们的“反抗”这个话题。我查阅了我的笔记，提及一个由市党委召开的会议，会上对机械局负责人的回避战术提出了严厉批评。我们访谈中的坚冰被迅速打碎了。气氛如此热烈，以至于当他们向我解释，说服下属企业的干部服从上面的指示，是如何艰难的时候，有一两个人几乎落泪了。他们还向我抱怨，当上级部门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技术的时候，他们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在后来开展的另一个调查中，当时我在研究流动人口问题，我花了近两个小时假装耐心，坐在那里听那些在城市里搞计划生育工作的干部们讲一些严格的正式规程。很明显，看起来，这个部门的干部们没打算和我谈我所关心的问题，即在他们的工作中如何处理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就在采访的最后一刻，算是出于同情，我记得我突然说道：“如果没有那些流动人口，你的工作就会容易得多。”我的这句话帮助我打开了沟通的大门，我的访谈对象们在自己每天的工作中所经历的愤怒和沮丧一下子呈现在我的面前。接着，在场的每个人都急切地插嘴，一个接着一个讲述那些恼人的事情或突然闯进他们工作中的意外。我对这个机构履行自己职责时所遭遇的困难有所了解（我已经从阅读中文报纸和期刊获得这些信息），所以我能给他们一个同情的评论，这才有了深入恳谈的机会。

1987 年，我对武汉市改革委员会展开采访调查，希望能找出来这个城市成为华中地区新的重要市场和运输中心后所采取的行动。当时，经济改革刚刚恢复了这个城市历史上所拥有的转口港历史角色。抵达武汉之前，我已经认识到这个城市与湖北省之间紧张的竞争关系。武汉市是湖北省的省会，但是武汉市常常不愿服从湖北省的支配调遣。我也知道武汉市与另外一个内地大都市重庆之间的竞争关系。我询问地方学者和干部们，武汉自 1984 年起拥有计划单列市地位后是如何发展的。这个时候，这些有关武汉

市所面临困难的信息总是浮现在我心头。我先前的知识储备——有关省市竞争性的关系,以及设立长江中游合作区的困难——让我们的访谈有所依据。官员们似乎觉得他们在与一个内部人士谈话,因此可以谈得非常坦率。

最后一个说明田野调查前需大量阅读的例子,来自于我 1998 年在北京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四位官员所进行的采访(这一采访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一位研究生申请人帮我安排的,他在申请的时候主动提出愿意以任何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我)。同往常一样,我不得不先听一些关于这个部如何运作的陈词滥调,以及它如何着手解决国内劳动人民所面临的问题。突然,我评论说,创建一个崭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一定非常艰难吧!其中一位承认:"我们甚至不能指望在 2020 年以前就能顺利解决这个问题。"从这里开始,我们的访谈才终于开始进入了正轨。

在上述以及其他类似的访谈中,人们感到可以更坦率地对我讲述他们的事情,只要我表现得似乎是他们私人事务的利害相关者。信息提供者可以看到,我对事情有足够的了解,可以就关键的问题提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更愿意给出答案,或者至少部分答案。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访谈前的大量阅读,大大提高访谈的效率。这些先期准备的知识,形成了一个跳板,让研究者跳水的时候能跳得更深。

另一方面,当我需要更多细节的时候,我会突然间改变自己的姿态,让自己看起来无知、幼稚和迟钝,对接受访谈者提出一个接一个的问题,直到事情中最小的细节和牵涉到的所有的数字都在我面前清晰地展现。事实上,在我的开放式访谈中,我作出的每一个反应似乎都把我带到更深一层的问题里,让我能探寻躲在幕后的机制和战略。如此做法,常常让我在访谈结束的时候,能带走一些在访谈开始时根本就不知道其存在的一些数据。简单而言,我的做法可以用人们熟知的道家的格言来总结:大智若愚。

找到受访者并和他们建立联系——当无法做到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当我需要找到一些不那么好找,并且经常处于匿名状态的人的时候,比如说农民工和下岗职工,我的策略自然就必须改变。对于这些类型的受访者,我从前和现在的项目都使用了一个被社会学家 Thomas Gold(1989)称为"游击采访"的选择受访者的策略。这种选取受访者的策略,就是有意识地去寻找街上工作着的人们,以偶遇的方式展开貌似闲散的友好交谈。在城市的人行道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哪些是农民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对能住在城市里而感到高兴,对他们的新生活感到骄傲,也愿意向别人解

释他们的生活状态。1992年和1994年的几个月中，我在许多城市的大街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那些被我辨认出农民工身份的人交谈。或是他们的职业，或是他们的口音，又或是他们的衣着，透露出他们来自农村。

后来，自1998年开始，为了我关于失业者的项目，我开始每年访问一些中国的城市。在这些访问中，我能在大街上找到一些情绪低落的中年人，他们看起来是城市居民。我和他们交谈，鼓励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偶尔地，情况会有所不同。特别是1999年，在美国轰炸了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之后，这些体力劳动者中的一些人害怕与外国人交谈，或者是不愿意接触。但总的看起来，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我所显示出来的对他们所处处境的同情和支持。我表现出来的同情心几乎总能化解他们的拘谨寡言。有一次，两个失业工人真心实意地感谢我能关心他们的境遇，感谢我愿意听他们的故事，因为，他们觉得："党和政府以及工会从来都没来问问我们的境况。"

读者此时可能想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是如何做到让这些人与我敞开心扉交谈的？在我现在做的研究项目中，当受访者是通过熟人认识的时候，他的拘谨感很快就会消融。更进一步而言，当我们谈话场所是在某人家里，或是在我居住的宾馆里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相对比较安全的感觉，这可以很快让我们畅所欲言。通常在谈话伊始我会先谈谈我们共同的朋友，或联系人，也说说我事先对受访者的了解。当气氛融洽，可以转入长谈的时候，我就先"吹点小风"，谈谈我是如何认识他们的朋友或家人，或者是如何知道受访者的情况。如果我已经知道受访人处于某个特别的情况中，我会就此把谈话带到这个话题之中。

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实际上更多碰到这种情况），我遇到在街道上工作的一个人或一些人，她们或他们要么在卖小饰品，要么在做维修，要么在开出租车，要么正在蹬三轮车，要么正在市集里沿街叫卖，那么，进入谈话的方式必然有所不同。在我打断一个人的工作并尝试和他对话的时候，我通常会先问对方："我可以和你谈谈吗？"或者："对不起，你现在有时间和我聊几句吗？"然后我会解释我的兴趣所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会把我的名片给对方，让对方知道我是学者。在建立了互信之后，就可以问些简单的问题，比如："您是从农村来的吗？"或者是："您是一位下岗工人吗？""您来自哪里？""您在这个地方呆了多久了？"等等问题。很快，当我表现得谦逊，富有同情心，并且真心关心和支持他们，我们的对话多多少少会变得自然一些。当我在武汉的时候，我通常会让受访者知道，过去几年中我常常来武汉，还有，我多么喜欢这个城市。

我也努力让那些和我谈话的人们理解我研究的性质，也就是希望他们知道：我是一个教授，特别专注于有关城市/市场改革的问题，我的研究项目所探讨的一些问题，与他们自己每天的生活和经历都息息相关。这样一来，他们马上就能明白，我为什么把他们作为谈话对象。另外，表明我的身份和职业之后，我就能驱散他们心中可能的担忧和顾虑：担心我可能会写一篇关于他们悲惨境遇的新闻报道，或者，更糟地，我可能向政府告发他们（实际上，我的某些受访者就是在担心这些问题）。当我预计会遇到讲方言的受访者时（特别当他们是来自农村地区的时候），我会聘请当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随我一同前往。届时，我会用普通话来提问，他将负责把我的问题翻译成当地方言。访谈后，我的助理和我会找个地方，趁着记忆还没消褪，迅速分享我们从访谈中回忆起来的内容，我再把这些对话记录在我的笔记里。

当谈话对象是学者和官员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但同时，也有一个共同点：每一个参加谈话的人，不管他是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或是一个沿着街巷走来的农民工，我都需要让他们知道，我不仅仅知道她/他们的情况，我也同情她/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处境。总之，不管你的受访者是谁，你能否展现出适当的同情心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对于那些在政府机关里担任特别职务，或者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受访者，在迅速建立起我自己的可信性的同时，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弄清楚他们工作的性质。互换名片是通常的做法。除此之外，我总是随身带有最近我发表的文章以便分发给他们，特别是当我的某些文章可能会引起他们兴趣的时候。1980 年代早期，圆珠笔可做理想馈赠之物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但是，分发自己的文章有时候也可能导致某些令人尴尬的副作用。有一次，我给一位老干部送了一份我写的文章，结果让他忙活了半天都没弄清楚，应该如何拿着这份英文文章才不至于使其中的文字看起来是倒立的。

确认彼此专业上的权威之后，我就会开始描述我目前研究的性质，以尽快让他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做了多少知识上的准备，这样他们就能明白应该从哪里说起。当他们讲的时候，我经常打断他们，提出每一个我能想起来的小问题。我这样做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有很多事情他们以为我知道，其实我不知道，如果我不问他们，就永远都搞不清楚。其次，我时刻提醒自己，到这一天的晚些时候，我脸上一定会有一种懊恼的表情。因为，我将在会议之后核对我的笔记，到了那个时候，我不再有任何机会去找回缺失的信息。

在我所有的访谈当中，我从来不使用录音机，仅仅记笔记。当讲话者用

了一个我不知道的词，我会请他/她把这个词写下来。如果我认为可能漏掉了一些重要的内容，我就请求谈话者重复自己的话语。我完全相信，在现场，我必须听到并理解每一个词和每一个思想。如果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我就不理解，事后听录音对我也不会有太大帮助。因此我总是一开始就问我的受访者是否介意我记笔记。目前为止，还没人反对，特别是当街上的受访者在谈话过程中一直保持匿名状态。在采访学者的时候，我会问他们是否允许我直接引用他们的话，是否可以在我的文章中提及他们的名字。

敏感性和安全性：处理学术伦理问题，听出话外之音

在采访中我一直小心翼翼的是，尽量让我的受访者感到舒适。因此，我从不试图在他们那里弄出来一些与党的方针、政策直接对立的信息，我也不会愚笨地问些让他们左右为难的问题。当然，我也追问，但是仅仅追问那些他们愿意回答的问题。当我确认我们所谈确实已经超出受访者能够承受的界限时，我就会放弃更进一步的追问。有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受访者不会回答某个问题，这一发现本身能够让我意识到问题的敏感性。那么，在以后不同的场景下采访一位新的信息提供者的时候，上次采访中的敏感话题就成为进一步追问的起点。也许，这种处理敏感问题的方式让我赢得了别人的信任，以至于我在任何采访地逗留或回访都没遇到过麻烦，过去与我接触过的任何人都没拒绝与我进一步交往。

如果不以劝诱的方式从受访者获得信息，研究者也可以凭借在访谈中察言观色获得暗藏的零碎信息。在关于中国工业政策的研究中，我注意到几个受访者都在谈话中提及某个工厂，这个工厂在进行从生产锅炉到生产电镀自行车的产品转换过程中，曾经有一段时期情况非常糟糕，足足两年产出为零。我只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访谈，留意其中一些细小的信息，而在随后的访谈中让受访者知道我已经对此事有所了解，然后通过更进一步的交谈慢慢充实整个事件的细节部分，这样拼出整个图景，得以弄清楚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灾难。

另外有一次，在 2000 年，我尝试弄清楚武汉到底有多少下岗工人，还试图搞清楚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员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那些官方统计数据。当一个工会干部回答我关于有多少工人下岗的问题时，我特别注意观察，发现他迅速但是断然地肯定了他自己的回答。当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小心措辞，使用标准说法“按照官方统计”，并给了我意味深长一瞥的时候，我敢确定他可能对这些统计数据是否完全准确持怀疑态度。参观“下岗再就业模范”也

给了我许多机会探究那些错综复杂的幕后故事，让我了解那些模范是如何被选取的；为了创造他们的再就业奇迹，他们得到过怎样的一些帮助；而这些帮助又是谁给的。

学术伦理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重要：当谈话对象是某个伤心故事的当事人时，是否要对外国人谈起这些故事，他/她明显会犹豫。比如，那些原本是农民工的无证摊贩，或者那些被腐败专横的工厂经理扫地出门的下岗工人。在这些个案中，我与受访者在中立的、无明确社会政治意味的环境下碰面，比如说茶馆或公园，并且向他们保证我原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兴趣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的一次最畅所欲言的访谈，就在一个看起来高度敏感的地方进行：在晚上，当地党委的一个办公楼空无一人，我们在那里进行了访谈，我的一个朋友白天就在这栋楼里办公。也许，在这样一个看起来受到保护的环境下，受访者心中才放下了所有的担忧顾虑，把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全部倒了出来。他们甚至觉得可以自由地批评。

采访学者通常是最好的方法之一，可以从中发现公众对比较困难的公共项目的反应，以及项目推动过程中的症结所在。但是这里要特别小心，访谈者必须先确认该学者是否愿意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访谈者的采访笔记中。我常常把自己的论文赠送给受访的学者，这往往会产生更进一步对学术成果的交换。

把自己的文章赠送给受访者，常常可以激发谈话双方就各自的研究成果交换看法。在拿到一位中国学者的文章后，如果就其内容展开进一步的交流则可以带来新的提问和获取资料的机会。另外还有一个打破中国研究材料周围无形保护墙的办法，就是逐步地小心谨慎地梳理出谈话者自愿吐露的部分，具体做法不过就是踮起脚尖一点点地接近关键信息，用恰当的问题做勺子去舀水，一勺一勺地舀，一勺一勺地尝试水温。

在信息占有方面，官员则很像学者，与民工和下岗工人完全不同。官员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占有的信息一旦被曝光，往往会为他们自己带来危险。有好几次，当我知道某个类型的数据是内部的，本就不该披露出来的时候，此时受访者的表现则是不愿意直接口头引述这些数据。但是，他们愿意让我从他们的笔记本上抄录这些信息。这样做的原因是否因为我们说话的房间被窃听，我无从得知。这些官员是否在刻意回避泄露信息之责？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要问了吧。

而在以往的经验教训中，我也了解到，一些城市的官员，不管你如何认

真对待，或者不管看起来与你多么地想法一致，他们都不会接受你正式访谈的邀请去讨论政治问题，除非这个城市的外事部门做出安排。显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邀请一些友善并且和我聊得来的贸易工会官员（我早前曾经与他们私下交谈过，还互换了圣诞卡）到我酒店的房间，结果从我们的会面中我没能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结　论

一些人可能会怀疑这种随机聊天的学术价值，其中的受访者基本上都是随意挑选的。还有些人会问，需要多少次这样的采访才足以完成一个研究项目。我的感觉是，在质性研究中研究人员应该尽可能多地利用不同类型的研究资料和数据，包括年鉴和年鉴特别卷中的统计数据，还包括其他研究者刊登在中国学术期刊上的调查研究数据；官方文件；内部刊物；来自中国的中文和英文日报（无论它们是官方的还是半官方的），甚至报告文学；还有西方媒体的报道，这还不包括在中国做的采访和其他一些次要资源。

至于要确定到底需要多少次这样的访谈，我的回答是，越多越好！有许多次，当我和几十个不同类型的中国人闲谈之后，我获得了一种洞见，或者说我获得了一种感觉，知道了事情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这些洞见几乎总是能够进一步丰富我早先通过阅读获得的知识，并且在纸面资料中这些洞见也都得到了确认。更重要的是，从这些随意挑选的受访者身上，我获取了大量信息。而这些信息的细微之处，能帮助我确认和评估那些纸面资料中暗含的委婉托词。

与路上偶遇的中国人直接面对面交谈，他们每天的工作与生活都携带着我们正在寻找，而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信息，这正是做中国研究真正令人兴奋的一面。但是，如果想从这一事业中获得最大回报，我的经验告诉我，有四个最基本的规则必须遵循：(1)在进入这个国家之前，为你的研究项目安排合适的批准文件——还有必要的介绍信——如果你要访谈的是一些官员的话。但是一旦到了地方，你就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2)和所有你遇到的友好人士保持联系，因为你从来不可能预知谁会把合适的受访者介绍给你。(3)在访谈中，要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知道一些有关的情况的人，但同时又是门外汉。首先要让人觉得你是局内人士，但是，随后你就从闲谈中获得了一些微妙的细节。(4)受访者的安全应该是你所有考量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Gold, Thomas B. (1989) 'Guerrilla interviewing among the getihu', in Perry Link, Richard Madse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Unoffic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pp. 175-192.

Solinger, Dorothy J. (1984) *Chinese Business Under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From Lathes to Looms: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979-198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 Reforms, 1980-1990*,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顾问咨询工作：通往田野调查现场的另一道门

◆ Baogang He(何包钢)

近年来，顾问咨询工作作为田野调查现场的一个新的途径在中国研究中出现。顾问实地考察的目的是与地方上的社会活动家互动和合作，培训当地官员，为当地项目提供知识和资源。这种田野工作需要多次拜访村庄、乡镇或城市居民委员会。学者和专家被要求参加关于具体政策和计划的工作会议，这些会议非常不同于学术专题讨论会或其他学术集会。

顾问咨询是一个非常有趣和令人兴奋的通向实地考察的途径。至少从如下三点判断，我们可以说，现场咨询是田野调查的一种形式。首先，咨询工作提供了更为迅捷和有效的收集材料的机会。在顾问咨询的现场，学者有权要求获得在其他时候无法取得的相关材料。过去几年，在我作为顾问咨询人员的官方职权之内，我得以收集到比单纯作为学者更多的资料。其次，在工作会议以及现场咨询工作的整个过程中，学者将获得内部人员才能接触到的有关政策制定过程的内部资料，这些知识可以对体制设计研究和民主促进研究做出贡献。第三，现场咨询工作近乎于为学者提供了一个开展社会科学实验的机会。也就是说，能让学者们将社会科学运用于当地问题，通过现场咨询工作检验和发展社会与政治理论。

本章旨在对现场咨询工作提供一个知情人的观点，并反思我个人在这方面的经历。这一章将考察现场咨询工作如何有利于学者的研究，以及顾问咨询如何为一些学术争论提供新的看法。它也批判性地检查了现场咨询工作的方法和策略，并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建议。本章展示了一个学者的观点，这些观点不论是与中国政府的官方路线或是与国际捐赠者的路线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我在本章将要讨论的现场咨询工作是一个有关民主促进的项目。自

1990 年代中叶起，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欧盟（EU）、福特基金会、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NED）和一些国家包括美国、丹麦、日本、加拿大、芬兰、澳大利亚（Carothers 2000，Pastor 2000），和其他许多国家一道，在中国发展了很多项目，这些项目致力于促进良好治理和地方民主。这些项目已经形成一个飞速发展的新的“产业”，并对促进良好治理和地方上的民主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Shelley 2000）。尽管这些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许多钱还是被浪费了：一些资金的投入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以获得其潜在效力；不合适的策略遇到地方政府的反对；西方项目经理与中国行政官员之间的误解延误了计划的执行。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学习。

近年来，应中国民政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丹麦外交部，和中国很多地方政府的邀请，我已经在中国开展了十多次实地考察，参与中国的有关良好治理和地方民主的很多项目；我扮演过不同的角色，包括设计者、观察员、评论者和顾问。这些参与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思考现场咨询工作，考量不同的方法和策略，以便克服这些项目在中国通常会遇到的困难。

顾问咨询的政治结构

同传统的田野调查一样，介入现场咨询工作的学者和专家需要特别注意不断改变的政治环境和政治规程。中国政治方面的变化非常快。几乎没有项目不需要在执行过程中进行修改，每一个项目在执行中实际都需要一定的灵活性。

1993 年和 1994 年间，在中国国内有人认为，任何一个来自国外机构的致力于地方政治改革的基金都包藏祸心，企图通过和平演变以结束共产党的统治。与此同时，一些外国的基金组织反对在共产主义中国开展促进良好治理和地方民主的项目。正如 Anne Thurston 在 1999 年所指出的：“在中国开展这项工作需要做出更多的妥协，超出了某些民主化的支持者所愿意做出的妥协。有些人可能会说，逐步缓慢的改变是不够的，中国太大太复杂，外来者的努力无法轻易使其做出改变。政治改革是个假货，外国人被欺骗。……

转折出现在 1996 年。当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了一个计划，以支持中国政府提倡平民阶层自我管理和农村地区民主选举的努力。相比而言，UNDP 的项目具有独特的优势。由于联合国的中立立场，这个项目遭遇的批评和反对相比美国项目要少，它的培训基金没有被解释为“和平演变”的阴谋。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是第一个被允许开展这样的项目。因

为联合国被广泛视为世界政府,UNDP 的项目在中国民众之间享有了更高的权威性,从而对中国政治改革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力量。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UNDP 项目为解决培训资金短缺问题打开了一个新的渠道。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民政部的成功合作案例中,一些省级政府官员已经获得了国外资金,从而可以在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里建立民主培训计划。甚至有一些非政府机构从外国直接获得了资金。例如,天则经济研究所于 2000 年 9 月从位于北京的加拿大大使馆获得了名为"村民基层民主培训"的赞助。

中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控制国外资金。所有由国外机构资助的政治改革项目必须经由中国政府批准,并可能被公共安全部门调查。每一个项目都必须获得外事部门或外事办公室的正式批准。外事部门的官员常常收到相关条例和法规的通知与文件。王征遥是负责 UNDP 项目的前任官员,他解释道:"国外捐赠人不应该扮演领导角色或进行独立运作。他们不被允许绕过国家来为地方上的社会活动者提供资金。国家应在外资项目的执行中扮演领导角色并控制外国资金流入的过程。这样,国家就能确保外国资金对地方稳定和民主的促进。"

中国的主办机构和地点

在传统的田野调查中,研究人员需要选择一个地点,挑选一个研究的问题,并找到一个中国主办机构以开展合作。有时,在一定范围内有多种不同的选择;有时,选择却很少。例如,当选择乡镇作为实验场地时,一个学者建议随机采样,并且针对基层选举的影响进行更为严谨的科学研究,但是当地官员拒绝随机采样,并选择他们相信能够确保实验成功的乡镇作为实验地点。

走向乡村,特别是贫穷的西部地区,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已经有很多项目了。然而,奇怪的是,贫穷地区的地方政府渴望从国际捐赠者处获得支持,并希望能与他们合作开展一些项目;但是,这些项目更多的时候是政治运动的产物而不是一个利益架构成熟后自然形成的产品。正如一个乡党委副书记所说:"在贫穷地区更容易进行民主实验,因为人们贫穷、淳朴、愿意聆听。"

大量的基金会和捐赠者支持多种类型的项目。例如,美国的全国民主学会关注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体系的完善,国际共和研究所关注的是村庄层次的政治改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援助改革、法律培训、村庄选举。

几个大型的欧洲基金则侧重在培训上。除了培训之外,捐赠者们现在正在考虑对其他项目的支持,例如,村庄选举中的监督团队、选举之后的相关事务的培训计划、税收系统和村庄自治、机构管理系统(特别要处理党委书记与选举出来的村长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乡镇直选的尝试。

国际上的赞助人感兴趣的问题不一定是地方上优先要考虑的问题。赞助人倾向于寻找一些能够在政治改革中有所突破,并且能够推广到其他地区的项目。相反,地方官员们更多考虑的是地方利益和地方上的稳定,以及有无政治风险。

找到一个中国的合作机构以及一些信奉民主价值和善治理论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外事部和民政部已经在中国各地推动良好治理和地方民主。前者致力于维护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国际形象,后者则希望通过促进中国农村地区的民主参与来维持社会秩序。

选择一个合作机构时,我们必须考虑这个机构的优势和劣势,经常要权衡利弊。与中国政府的合作,有获取资料便利、影响最大化、组织上支持等优势。但是,劣势是可能遭遇损害赞助人努力的官僚诡计、缺乏自主性、对项目的官僚控制、缺乏公开的反对派、对民主原则的妥协、不得不在对民主的官方定义之下工作。一些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相较而言更为独立、友好和热心于合作,它们没有官僚程序,并且愿意做赞助人所要求的事情;其中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可能能够维持自身的独立自主性,并创造真正可供选择的政治改革。然而,当实施培训项目时,非政府组织往往比中国政府效率低下,而且无缘介入政府的决策制定过程。确实,出于避免政治风险的考量,一些政府官员拒绝参加由非政府组织举办的地方治理项目的会议。官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会有浪费资金的风险。政府官员可能会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们必须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违规事件和贪污倾向也在一些非政府组织中存在。

咨询和研究之间的关系

尽管借助现代社会科学的帮助,现场顾问人员已经向他们各自的咨询项目引入很多未经检验而且对项目本身也没有什么帮助的假设,即,一些关于民主转变和政治改变的假设。现场咨询人员可能发现,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和政治变化知之甚少,现场咨询工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质疑他们自己的假设和想法。现场咨询工作的结果可以被用来检测和调整已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并改进现有的制度设计和民主化策略。接下来,我想通

过反思我的顾问咨询和普通学术研究之间的动态关系,来展示与民主计划相关的咨询如何能促进我们对中国民主化和/或中国政治的理解。

重新考虑途径依赖

民主援助最终能否有一定效果,那就要看它是否能借着对民主的深刻了解,来设计一个不仅仅是民主的,而且是适合于当地条件的制度——对民主的洞见来自社会科学和当代学术对民主的看法。关于民主转变的文献已经包含了大量民主化的模式、顺序和策略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极为宝贵。因为,在中国人思考通向民主的中国途径时,它们能够提供帮助。运用制度主义设计出聪明的民主化策略是社会科学在实际应用中最为成功的地方。

许多美国组织担当起幕后的顾问工作,他们在促进中国民主化的项目里采取了一个策略性的姿态。他们选择关注选举程序上的技术问题。这是一个渐进的策略,做出小的技术性建议,这样可以减少对抗,并且不直接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一策略着重于程序,协助起草或改进有关提名与筛选的程序。这些美国组织实际上采取了制度性途径依赖的方法,他们希望通过引荐一些程序上的创制权,最终产生更为广泛的对改变的需求。

这种方法已经为程序上的显著改进做出了贡献。自 1993 年以来,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已经协助地方选举机构在村庄层次推行合法的、竞争性的选举。IRI 赞助为官员提供的选举培训班,强调秘密投票、多候选人选举和透明计票方式的重要性。IRI 1994 年做出的建议中,有 18 个至 1997 年 5 月前已被实施,11 个被部分采用,尽管还有另外 11 个未被采用。(IRI 1997)

卡特中心长期以来一直在探求合适的操作程序,以便在村庄选举中实现完整、自由和公平的目标(Karter center 1998:10)。1997 年,该中心在 Robert Pastor 的领导下,提出了 14 项建议,其中包括在乡村里把选举日标准化和统一化,限制代理选票的数量,以及竞选的制度化(Karter center 1997:12-16)。2000 年,卡特中心讨论了与乡村选举相关的问题,提出了七项建议,比如,现任村委会成员和当地党委书记不具备进入乡村选举委员会的资格,另外,应该为选民在选举日询问候选人情况留下足够的时间(Karter Center 2000:26-30),等等。

上述现场咨询工作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由组织和制度之间互补构造的路径依赖所决定(Katznelson 1997;Pierson 2000)。一个民主制度的存在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回馈,而这些回馈需要民主制度的进一步整合,并且产生进一步需求。为了建立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制度体系,体系内一个已经

存在的程序一定需要另一个程序与之兼容互补。民主制度就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自我强化。民主制度的内在逻辑,其关键是对内在一致性和独立自主性的需求。制度体系上的内在统一性要求制度之间冲突的减少,以及新旧制度之间的兼容。不仅如此,制度之间冲突引起的张力也要求在处理冲突时的内在一致和由民主力量支持的民主制度的扩散。

在我的实地考察中,地方官员告诉我许多关于制度内在统一性的例子。解决实际问题和保证制度内在统一性的需求已经成为选举程序改革的驱动力。例如,村领导的严重腐败问题在过去引来村民的抱怨、请愿和抵触。这些村民意识到,如果仅仅是选出村委会成员,而对这些被选出的官员无法进行监督,对村民来说将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有权罢免一个腐败的村委员会成员,已被写进乡村民主选举的工作程序之中,成为村民民主权利的一部分,被制度化。

现场咨询工作也提供给我一些有趣的案例和事件,这些案例和事件迫使我反思、重写和修改制度内在统一性理论。为了让这个理论实在而不空泛,它必须考虑不同级别的制度设计。同一级别的制度对内在统一性的要求是很大的。具体来说,村委会和党组织之间的冲突需要减少。这就是为什么乡村引进党委书记选举制度来平衡村委和党委这两个系统,以及为什么乡镇领导决定村委会组成的程序被认为与乡村里已被广泛接受了的村民公开提名程序不兼容。

相对来说,不同级别的制度之间可能只需要较少的内在统一性。例如,从农村到城市的民主发展逻辑并不强,因为农村和城市的制度处于不同级别。一般而言,基本政治制度冲突更多地存在于农村一级和国家一级的制度之间。由于没有紧迫的压力去解决这些矛盾,因此这样的矛盾冲突有一定的存在空间。一部分原因在于,地方上的社会活动者拒绝解决这些矛盾而且试图从中获利。对直选产生市领导班子的禁令就是一个例子。中央与地方选举法案的不一致则是另外一个例子。中央体谅并且允许地方上有所差异,而一些地方上的社会活动者则利用这个机会阻止民主制度的发展。

"不断增强的回馈"理论一般被理解为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这一理论在中国乡村选举的案例中需要被修正。乡村选举制度被嵌入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党在全部选举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就创造了一个"延迟效应",并且也限制了"不断增强的回馈"效果。"不断增强的回馈"往往是从某一特定制度改革而来的。乡村的民主制度和国家的威权系统之间互相约束和冲突。为了加强已有制度的兼容性,民主力量试图通过促进党内民主来改革

党的体系。与民主力量相反,反民主力量刻意利用制度中存在的矛盾,以阻止后继的民主化进程,例如,禁止市领导班子的直接选举。因此,中国的民主进化必须通过分析如下两方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理解:一方是自我强化的民主力量,另一方是反民主的习惯性机制。

重新考虑中国民主化的公民社会策略

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它对中国民主化可能的影响是我主要的研究兴趣之一(He 1992,1995,1997,2002,2003)。我所持有的公民社会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作用的观点,在现场咨询工作中得到了修正。我的半公民社会概念也在其中得到了提升。

公民社会的养成是民主促进协助的一个主要策略。民主促进项目有三个类别:选举、国家制度和公民社会。Thomas Carothers 指出,民主促进项目的三个类别之间存在着一个转换。对国家制度的协助招致了批评和一定的幻灭。选举援助现在已经削减。现在更为突出的是对公民社会的协助。

国际资助人已经为发展中国的公民社会做出很大努力。中国政府和国际资助人主要争论的是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地方民主中的政治参与问题。让我通过在 2000 年做现场咨询工作中遇到的两个案例来讨论这个问题。

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项目为一例。该项目最初的计划并没有提及非政府组织在培训项目中的角色。然而,当该项目在 2000 年结束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要求在最后的评估阶段,回顾中国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合作关系。这个要求不仅使中国官员非常费解,而且迫使他们想出办法来解决。作为应对之策,一个中国高级执行官强调中国模式非政府组织应该包括大学研究机构和妇联。因此,他说,民政部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的执行单位已经成功地与华中某大学、黔西妇联和其他社会团体建立了合作关系。大学研究中心作为非政府组织,其人员和资源在培训中被使用,例如华中某大学的农村研究中心。

第二个案例是欧盟和中国合作关于农村治理的培训项目。项目早期草案设定了以下目标:1)非政府组织作为监督人,监督被选官员的表现和责任承担能力;2)在项目开展的每一个地区,至少有一个非政府组织,起到监督村委会工作的作用;3)相关非政府组织,其百分之九十的代表能够给出两个具体的例子,在其中,非政府组织的介入促使决策者表现得更好和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建议被中国官方所拒绝。一个高级官员声称,"中国选举监督机制是由当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当地政府、媒体和公众舆论、非政府组织

和村民自身所组成。中国非政府组织包括妇联、青年团体和资深代表。没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新组织。”实际上，即使是建议书中所指非政府组织，也多半可能是以城市为基础的已经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机构，并且，给每一个举行选举的村庄指派一个非政府组织也会花费太大。

国际赞助人和中国非政府组织同时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在促进中国地方民主化的过程中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是必要的。以政治为导向的中国非政府组织被政府压制，如果它们想存活并发展，国际支持对它们赢得独立和自主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投入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资金使得发展一个真正的中国公民社会变得复杂化。如果这些运营资金来自于美国或欧洲国家政府，这些非政府组织将不被看做是自主的。而且，支持政治反对方的国际资金，其存在增加了中国官员对“和平演变”的顾虑。

争论最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尽管非政府组织的观念和实践已被中国政府和社会所接纳，中国政府依然有效地控制政治领域里的非政府组织，并且阻止它们形成公开的反对派。非政府组织对地方民主的介入是有限的，地方民主的主要活动者依然是当地政府。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非政府组织必须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与中国政府合作。目前，唯一可行的模式是非政府组织与中国政府展开合作，并且前者极大地依赖于后者。有趣的是，由于中国政治的性质，民政部从未与独立自主的非政府组织有任何直接的合作。然而，它与完全自主的组织，如天则，却可以发展松散间接不明言的合作。天则从民政部网站上复制了一些内容，在培训中使用民政部的教科书，甚至邀请民政部官员成为他们的顾问。中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这样的合作具有独特的中国特色：通过维持与政府的松散关系，非政府组织能够减少政治风险（He 2003）。

针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策略和制度设计，上述几个案例阐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波兰的“团结模式”目前不适合中国。波兰模式中，来自公民社会的强劲反对派迫使政府坐到谈判桌前。正如 Bruce J. Dickson 令人信服的论证：“将经济和专业领域的精英纳入共产党可能有稳定政治秩序的作用，至少在短期内这一策略是奏效的。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公民社会的出现和加强将不会产生一个如同东欧一样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会是一些与政府合作的社会力量，他们关注的主要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这可能使那些视公民社会为民主化力量天然联盟的人觉得沮丧。”（Dickson 2003a：24；see also Dickson 2003b：140）

中国有些学者常常假定，非政府组织应该拥有完全的独立自主性。我

则认为中国学者的这种假定只会误导对问题的理解,应该放弃。上面的各个案例巩固了我的观点(He 1997)。这些案例还让我确认,"半公民社会"这一概念在了解中国地方上的情况时是有用的。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宽泛的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概念,宽泛到能包涵市民和地方政府的许多创举。

重新考虑民主化的经济条件

关于经济和民主之间关系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久。1950 年代,Lipset 猜测经济发展(财富或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再加上市场经济)与民主化之间有一定的联系。然而,1960 年代新民主制度论的崩溃挑战了 Lipset 的假设。例如:Rustow(1970)就争辩说,缺乏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等先决条件并不能阻止一个社会开始民主化。

现场咨询工作让我有机会从一个实践者角度重新思考整个议题,并从中提出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显然,不论是贫穷或富裕,民主都可以发生,即便是在贫困的柬埔寨。然而,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是,经济条件如何影响民主化的质量,和如何决定引入民主化的方式。(关于该话题更详细的讨论,请见 He 2001)

两个截然相反的例子可以启迪我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在湖北省的一个村庄,贫困的经济条件使得村民,相比参与预算制定,更加关心如何为家庭赚取更多收入;农业经济结构不能产生多元经济利益,也不能产生新富阶层(这个阶层有参与预算制作的需求)。但是,只有那些要求发展民主和参与预算制定程序的村民才能从项目中得到大量资金。结果,外来资金造成了村民的分裂。很快,村庄中的各派开始争取从这笔资金中分一杯羹。当地的民主化计划未能成功,因为资金来自外部,民主程序是外来者强加给村民的。

相比之下,在富饶的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快速的经济发展使镇政府的收入依赖于对私有经济的税收,不同利益间的社会冲突日益增多。新富阶层和私有经济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被政府所听到,他们还要求参与决策的权利。在这种压力之下,泽国镇当地政府需要召开审议和协商会议,以减少利益冲突,也为市民提供一个渠道来表达他们的关注,并增加当地政府所制定各项政策的合法性。在这种背景下,地方官员曾在 2005 年 4 月花费十万多元开展市民参与预算制定的实验。实验从泽国镇居民中随机挑选了 257 名参与者,对三十多个建设项目进行了讨论和审议,并做出倾向性的选择。然后前 12 个选择被提交到泽国镇人大。在出席镇人大会议的 92 名代表中,

其中84人投票赞成前12个项目,7人投票反对,1人弃权。实验非常成功,它表达了人们的意愿,也收集了市民的意见,还鼓励了公民参与,并为当地政府提供了他们迫切需要的政策合法性(Jakes 2005)。该实验不是由外来者强加给当地人民的(笔者作为发起者和组织者只提供了技术咨询)。它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推行民主的最佳途径之一是让人民按照民主程序,就某些影响当地民生的特定议题,做出民主的集体决定。民主制度的成功必须从内部产生,并以某些利益结构为基础。

在中国开展田野调查要尊重地方政府的管辖权

为促进民主而开展的现场咨询工作,其目的是为地方上的社会活动者提供知识和专家意见,因此现场咨询人员很容易就扮演起教师的角色。其实,扮演辅助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对项目的推动更好。不要想着是"我们在为他们做事",合适的态度应该是"当地人民在我们的帮助下做事"。项目的实施者、协调者和管理者应采取学生的姿态,为了实施项目,要去积极了解当地的环境、条件和文化。他们必须努力去弄清楚,自己的想法和项目是否可以在一个特定地区内行得通。托马斯·卡罗瑟(Thomas Carothers)就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民主的推动者在很多时候并没有对当地社会有一个完善成熟的理解,他们往往沉醉在一个错误的想法中:单单依靠他们对民主的认知就足以用来指导任何地方的民主建设。他们常常以为,自己就是过渡社会中政治变革的原动力,把当地的合作伙伴仅仅当做辅助人员。结果,无数民主促进项目因为受援国缺乏真正的自主权而乱作一团。

开展现场咨询工作的学者和专家被要求尊重地方上的社会活动者,把他们视为平等的伙伴。还要尊重中国主办机构(东道主)的自主权,尊重他们关于如何实施项目的决定权。这种尊重是基于以下三点。首先,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原因是,为了把事情做好,我们必须考虑当地的条件和要求,并与当地社会活动者磋商。此外,在中国的历史和大众文化中,为外国人工作的人常被称为"外国老板的走狗和买办"。尊重地方的自主权,可以帮助这些地方上的社会活动者减少来自当地人民的怀疑,从而使项目能够顺利运行。第二个原因出自于这样一个冷静明达的信念:对其他文化的平等关注和尊重,在国际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第三个原因是,地方自主权本身就是民主的一个原则。促进地方民主就是去尊重地方上的自主权力。走向民主有多种路径,如果我们遵循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1994:59-61)的建议,外国人就应该尊重中国本土对民主的解释和探寻。

丹麦的一个项目提供了一个尊重地方自主权的成功案例。项目的协调员在项目最开始就向中国的主办机构和官员解释,为什么他们资助这个项目。项目成员也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们从来不使用"你必须做这或那"一类的词语。他们反而经常会说:"我们只是提出建议,并提供足够的资金用于培训。我们只是顾问。您有作最终决定的权力,决定是否采纳我们的建议。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帮助您。我们为您的项目工作,而不是您为我们的项目工作。"

这里也有几个反例。一个大的项目提出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需要学习欧洲和亚洲的一些价值观、技能和做法,以便合理地应用于中国地方民主进步。学习归来的受训者要能够列举至少 8 个民主实践和至少 4 个在中国背景下可能用得着的社会价值。"然而,中国的项目参与者拒绝这些量化标准。他们把"社会价值"这个概念放在一边,而喜欢"先进经验"的概念。他们辩解说:"这是因为,我们不应该盲目接受其他国家的价值观,我们也不将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于其他人。"中国的项目参与者还对如下要求感到不满意:"中国的项目人员要遵循并能运用欧盟采购及项目管理的传统做法。在一个简单测试中,将测验受训者对这种传统做法的熟悉程度,参与培训的中国方面联席主管、项目主任和民政部官员得分不能低于 90 分。"

外国人的失误可能会引起中国官员的抵制和不满。一位中国高级官员告诉我,"因为资金来自于欧洲,所以 × 认为他们应该有权决定财务事宜,他们希望能够自主运作。如果他们坚持不与我们合作,其编写的培训手册就会被我们丢进垃圾桶。我们将重新编写一本!"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个外国项目主管对当地官员说:"我们来到这里为你起草选举法;出于使命,我要说明几个重要问题!"一个地方官员在私下回应这位外国主管:"美国人来为我们起草法律吗?别开玩笑了!我根本就懒得与这些美国人会面!"另一位中国主管回应说:"好啊,如果你给我们起草了一个法律,你就必须提供资金,使法律能够被实施。不过,就算你给钱,我也会将你的钱用到其他地方去!"

尊重地方自主权,也可能会有意料之外的结果。对平等高于一切的关注可能会导致一定的压力。太多的尊重可能意味着失去争取主动的机会;还有,尊重自主是尊重当地的官员,不一定是尊重那些要求政治改革的基层民众。以选举中秘密投票为例,一些地方官员认为:"你们外国人不明白中国的现实,并没有秘密投票的必要。"如果我们以尊重地方自主权的名义接受这种现实,我们将会妥协得太多。事实上,地方官员后来改变了他们对现

实的看法，并且发现了在选举中进行秘密投票的好处。

现场咨询工作中的专家学者有时也未能在尊重地方自主权和保卫民主原则之间找到平衡。下面是几个例子。一位学者收到来自日本的促进地方民主的项目资金，他敦促村干部和村民学习民主制定预算的办法。他说，“如果你们不按照民主程序去做，我不会给你们钱”。这样的语言腔调和督促手段就没有尊重地方自主权，引来了村民的批评。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个项目经理从以前的项目中学到了一些教训，企图控制资金以避免浪费。例如，他强调，接受培训的人应该是村民。他还设置了几个高指标，认为这些指标的实现将使中国的政治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例如，他试图引进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来监督在选定地点的村委会选举。但是，他对公民社会的保护和对资金的控制遭到了当地中国官员的反对和批评，他设置的目标也很少能够实现。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场咨询工作的专家学者需要在民主原则和地方自主权之间找到平衡点，他必须发展一定的技能并寻找合适的策略以达到这个目的。

所用策略的基本原则

从事现场咨询工作的专家学者必须仔细考虑自己所用策略的基本原则，以便能让项目的影响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如何在现场咨询工作中成功地促进民主，以下就是关于其策略的讨论，也是我对那些到中国担任顾问者的一些建议。

1. **在学术功能和公共政策功能之间寻找平衡**。在这种类型的现场咨询工作中，专家学者们往往被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视为“太学术”，但被自己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同事视为“过于政治化”。专家学者们必须生活在这种张力之下，并把这种张力作为创造力的源泉。如果他们调整自己的研究，去支持一个特定的政府政策，他们的声誉会受到影响。他们不应该猜测政府想要做什么。他们给地方政府提出建议，但不必遵循政府的方针政策。维持学术上的独立对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2. **巧妙地对地方领导施加压力**。一个成功的战术是：不必将想法和项目施加于地方上的社会活动者，而是向地方官员提出学术性的无恶意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官员们往往可以忍受，从而“引诱”他们促进政治改革。一个典型的问题是：“您的计划已经在别处得到了实施，什么是您的新举措、政策或方法？”这个策略委婉巧妙地推动了地方官员，鼓励他们主动启动当地政治改革。

3. **尊重地方官员,与他们交朋友,并保持耐心。**例如,国际共和研究所没有坚持一定要在地方选举中秘密投票。他们的战术是让中国地方官员自己发现秘密投票的好处。经过几次实验,当地官员意识到,秘密投票可以减少冲突,并创造一个公平选举的形象。

4. **不要在公共场合直接与地方官员发生冲突。**不仅仅要给予地方官员必要和适度的赞美,专家学者们还需要在私下通过非正式的渠道给官员们提出建设性和友好的批评。以非正式的方式来解决棘手的问题,这是可取的。把事情弄僵、不留任何改变和调整的空间是不明智的。

5. **保持低调。**做顾问的专家学者不应声称自己率先开展了某个重要的项目,也不应该太快太频繁地会见媒体。在这方面,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应当得到赞扬。他们已经资助了许多好项目,但他们从来没有沉迷在荣誉之中,也很少透过媒体进行宣传。与此相反的例子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打算进行一次乡镇领导直接选举的实验,他们在选举日期前宣布了这个计划。结果,这个乡镇的党委书记被上级党组织免去职务。急于得到媒体关注最终迫使实验停止。

6. **了解不同的语言。**Thogersen 的章节已经讨论了在田野调查中理解和讲不同语言与方言的重要性。为了有效实现项目目标,外国专家应同时掌握英文和中文,并熟悉西方民主选举制度和中国村民选举自治的做法。这些技能和知识对于有效沟通和避免政治风险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设计一个适合中国政治条件的项目,迅速和有效地实施这个项目,并避免不必要的延误或拒绝,必须充分理解中国政治语言。很少有国际专家能满足全部这些标准和拥有所有这些技能。

在现场咨询工作中,理解和使用不同的政治语言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语言包括: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语言、官方政治宣传和国际话语方式等。比如,在我们的私人谈话中,一个市委书记透露了一个有关民主的非常自由的观点,她却使用党的语言来证明选举程序的公正性。她说,选举程序的公正性将加强党的声誉和合法性。这个地方领导必须使用官方语言说服自己的下属——对我们来讲,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民主化过程中应该强调党的领导,使地方领导感到安全。如果我们特别留意使用官方语言,就可以让当地官员比较容易地理解地方民主化项目,而且还为项目提供令人印象深刻的正当理由。与此同时,说"这是一个国际标准/趋势"也为项目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论据。

结　论

现场咨询工作是学术界与决策层互动的有效方式，也是在这些项目中，学术界为社区和社会贡献了学术知识和专家意见。作为对学术界的回报，现场咨询工作是精炼和创造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现场咨询工作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去获得来自实践的深刻见解，这些见解有利于理论学术辩论。现场咨询工作还提供了访问特定类型数据的机会，即我们无法通过传统的田野调查收集到特定的数据。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获得进入政治决策过程的机会，本来通过正常实地考察渠道我们是难以接触到的。它还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去重新思考纯粹理论的立场。例如，它使我从不同角度思考某些问题，如路径依赖、公民社会战略、民主化的经济条件等。

虽然现场咨询工作的优势是显而易见无可争辩的，不过，可能的弊端和顾问工作的内在偏见还是应该被严格地指出来。顾问工作需要面对政府官员，他们往往将学者带到最好的“示范”现场。这就产生了一个内在的偏见。例如，2005 年，我被带到北京的一个居民区，我对那里的社会秩序和福利计划印象深刻。然而，当天晚上，我独自一人来到上访村，那里是从中国其他地区到北京来投诉或到上级机关上访的人们居住的地方。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两千多人住在这个小村庄，不足十平方米的狭小房间里往往就挤住着二十多人。长久以来，这些上访者都被忽视了，没有官员关心他们的福利。作为一个学者，当我对他们的案子显示了兴趣，对他们个人的苦情表示了关注，我就突然被二十多个渴望与我说话的人团团围住，他们视我为他们的“救星”或“帮手”。他们给了我许多信件和证明文件，这是与官方说法完全不同的材料和注解。这个偶然非正式的“田野调查”，帮助我看到了在官方预先安排的现场咨询工作中所没有看到的情况。它对现场咨询工作是一个极好的补充。事实上，在中国做田野调查，最好同时开展官方和私人的采访及田野调查。如果我们努力结合二者，我们将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变化。

作者致谢

笔者想感谢 Jorgen Elklit，Louisa Coan Greve 和编辑及他们的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和 Eilidh St. John 的帮助。

[参考文献]

Anderson, Christopher J. and Jun Ishii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lection Outcomes in Japa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7, no. 4 (October), pp. 619-630.

Baiocchi G. (2003) 'Emergent Public Sphere: Talking Politics in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8, no. 1, pp. 52-74.

Carothers, Thomas (2000) *Aiding Democracy Abroad: The Learning Curve*,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Carter Center (1997) 'The Carter Center Delegation to Observe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Atlanta: The Carter Center.

——(1998) 'Report of the Fifth Mission on Chinese Village Elections', Atlanta: The Carter Center.

——(2000) 'The Carter Center Report on Chinese Elections: Observations of Chinese Village Elections in Hebei Province, January 4-13, 2000', Atlanta: The Carter Center.

Dickson, Bruce J. (2003a) 'Whom Does the Party Represent? —From "Three Revolutionary Classes" to "Three Represents"', *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 21(1), pp. 1-24.

——(2003b)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lcon, David and Zhou Hong (1994) 'Evaluation Report of CPR/88/061: Development of Training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Reformed Civic Service System', Evaluation conducted for UNDP, 7th to 26th March 1994.

He, Baogang (with David Kelly) (1992) 'Emergent Civil Society and the Intellectuals in China', in R. F. Miller (ed.)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Communist Countries*, Sydney: Allen and Unwin, pp. 24-39.

——(1995) 'The Ideas of Civil Society in both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1, No. 6, 24-64.

——(1997) *The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Basingstoke, London: MacMillan & NY: St. Martin Press.

——(2001)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 in Zhejiang', *EAI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85, 19 December 2001.

—(2002)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in April Carter and Geoffrey Stokes (eds) *Democratic Theory Today: Challenge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203-227.

——(2003) 'The Making of a Nascent Civi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avid Schak and Wayne Hudson (eds) *Civil Society in Asia*, Aldershot: Ashgate, pp. 114-139.

——(2005) 'Citizenship and Cultural Equality', in Sor-boon Tan (ed.) *Challenging Citizenship: Group Membership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a Global Age*, Aldershot: Ashgate, pp. 151-168.

Helliwell, John (1994) 'Empirical Linkages between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4, no. 2 (April), pp. 225-248.

Henderson, Sarah L (2003) *Building Democracy in Contemporary Russia: Western Support for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1997) 'A Summary of the 1994 Recommendations Made by IRI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Status as of May 1997', http://www.iri.org/pub.asp? id = 5669977069

Jakes, Susan (2005) 'Dabbling in Democracy', *Time*, vol. 165, no. 16.

Johnson, Chalmers (1989) 'South Korean Democratization: The Rol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 no. 1 (March), pp. 1-10.

Katznelson, Ira (1997) 'Structure and Configur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Mark I.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81-112.

Leithner, Christina (1993)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Vote: A Contingent Rather Than Categorical Influen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3, no. 3 (July), pp. 339-372.

Pastor, Robert A. (2000)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Marc P. Plattner and Joao Carlos Espada (eds) *The Democratic Invention*,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105-115.

Pierson, Paul (2000)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pp. 251-267.

Rustow, D. A. (1970)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s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 no. 3 (April).

Shelley, Becky (2000) 'Politic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Case of Village Democracy in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2, pp. 225-238.

Shi, Tianjian (1999)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alist Tactics for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3 (April), pp. 384-412.

Thurston, Anne F. (1999) 'The Paradox of China's Unfinished Reforms: an Assessment of Selected NED-supported Programs in China',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Washington, Nov.

Walzer, Michael (1994) *Thick and Thin: 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Yi Feng (1997) 'Democracy,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7, no. 3 (July), pp. 391-418.

7 通过文字材料接近田野调查的现场

Stig Thøgersen(曹诗弟)

收集文字资料被认为是现场调研的一部分。前往中国的研究人员往往花费大量的“田野”时间,在当地的各个书店寻找资料。他们还拜访当地的官员,期望得到一些相关文献。在大多数项目中,我们都需要深入研究那些发表在图书期刊中的、大量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文章;在官方传媒中搜寻信息;或是观察在网络上发生的非常有趣的讨论。但是,在这里,我的讨论仅限于在当地产生的、与特定区域(县或镇)案例研究相关的文字资料。即使做了这样的限定,我们仍然会被巨大数量的文献所淹没。在本章中,我想讨论几种我个人认为非常有用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与两个不同项目(其中一个是历史项目,另一个是处理当代问题的项目)相关联。综合这两个项目,其中的文字资料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类文字针对一个相对而言广泛的读者群,这些读者对地方事务感兴趣。即使是外国学者通常也能轻松地获得这些文献资料。这些出版物的作者通常都是些当地干部,以及那些与地方政府有一定关系的学者。而这类文字包括地方志、年报、文史资料和出自其他官方出版项目的出版物;讨论当地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事物的书籍与期刊;地方上的报纸和杂志;地方组织出版的时事通讯。自 1980 年代以来,中国各地涌现了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文字资料,因为从那时起,各地方政府一直在彼此竞争,希望能争取到更多的游客和投资。在一定范围内,谈论地区身份和地方的独特性逐渐变得合法。

还有一些文字资料,可以被称为“文件”,需要从更狭隘的官僚的意义上来理解,比如政治方针、报告、统计和法规。这些文字也是由政府官员所著,但阅读者主要是党和国家的管理者。大多数这样的文字资料都是上级单位下发或呈交给高一级单位的文件;地方政府内的各个部门每天都处理大量

文件。从根本上而言，它们都是机密文件，所以很难接触到；但是它们是了解党和国家的烦恼、问题、计划和愿景的主要资料。中国官员的工作和生活就浸泡在这永不停歇的文件大潮中；如果研究人员预先读过一些相关的文件，再来采访干部，这样的访谈会非常有趣。

第三类资料则产生于官僚世界之外。它们可以是因为私人使用而产生(如，日记、会计账目、信件)；也可是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资料(回忆录、诗词)，非法资料(抗议者的海报、一些商业宣传物)，或灰色(私下/公开)地带里的资料(家谱、一些宗教宣传文字)。一个研究者能否发现这些资料，通常取决于他与资料作者(或散发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或完全依赖于运气。但是这些资料的数量和社会重要性正在快速增长，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偏远地区的人，开始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类资料可以作为前述两种文字资料中所发现的官方观点的重要替代物。

这些文字资料聚合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洞见，而这些洞见与我们采访和观察得到的信息相互补充，促进新的看法的产生。它们可以使我们超越访谈中的时间压力以及社会和语言的限制，深入资料作者的广阔世界。它们同时提供我们制订访谈计划和调查计划所需要的术语和背景资料，并提示一些让我们可以发现受访者的线索。最后，地方上产生的文字资料提供了许多事实信息，其细节和准确性，是其他资源所无法比拟的。然而，请注意，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上的文件资料所反映的，是我们在之前章节中所称"官方中国"的观点。如果我们想理解普通中国百姓的思想和社会生活，单靠这些资料无法做到。出于这种目的，我们需要把它们与其他资源相结合。因此，我这里将着重讨论采访和文字资料研究之间的互动。

有关当地历史的资料

我要讨论的第一个项目主要是一个历史方面的研究。在这个项目里，我研究了山东省邹平县从清朝(1644—1911)的最后几十年到1990年代之间的教育史(Thegersen 2002)。该研究的很大一部分是对不同年代学生个人经历的采访。但是，在我开始采访之前，我需要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机构的组织构造有大致的了解。出于这种原因，文字资源非常重要。最终这些文字资料也提供给我很好的线索，让我找到应该采访的人员。

我的第一组联系人是一群当地的历史学家。他们在我想要了解的那个

领域(邹平县的教育史)里频繁发表文章。在中国的每一个县和城市里，甚至常常在乡镇这个层面上，都有从前的干部和痴迷于本地历史的人，在收集当地历史的资料。他们经常与那些有特殊经历和有趣故事的人有密切联系。在邹平，与很多其他地方一样，当地历史学家通过两种主要途径发表文章：地方志和文史资料集。

地方志和年鉴

早在宋朝(960—1279)，地方志已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写作方式。地方志写作从此变成中国的传统，中国各地开始以这种形式收集记录地方上的风土人情。1980 年代，县级以上各级地方政府被告知要设置特别的地方志办公室，地方志开始大量出版，结果使得这一类型的历史写作迅速复苏。地方上的学者、各个政府部门退休的干部和被特别指派的官员，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从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全中国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地方志(Thogersen and Clausen 1992)。

在邹平，我能够买到 1992 年出版的《邹平县志》。三百多人花费近十年时间参与这本书的编写，这本一千多页的地方志提供了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邹平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宝贵资料；但是，其中提到教育的内容却很少。当我收到一本 448 页的 1990 年印制的《邹平县教育志》时，这个问题迎刃而解。这本书被归类为内部使用资料，这对于部门志和乡镇志来说非常普遍。但是当地的编辑人员并没有认真执行这个规定，他们反倒很高兴有外来人员对他们的作品产生兴趣。

大多数政府部门都编写了他们自己领域的志，如工业志、运输志、卫生志、人口志等。这些各行业领域的志，不仅仅是诸如日期、地名、人名、统计和文件等事实信息的重要来源，而且非常有助于我们寻找关键的信息提供者，特别是政府工作人员圈子里的受访者。各个行业领域的志通常是由在相关行业内活跃了数十年的高级退休干部编写。在我的研究中，邹平县教育志的编辑人员目录帮助我找到了四位老先生。自 1930 年代早期开始，他们在邹平各自都经历了学生、老师和干部的阶段。在准备邹平教育志的四年多的时间中，他们采访了移居中国各地的原邹平县居民，访问了山东各地、北京和其他各主要城市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他们收集到的部分信息并不符合邹平教育志的风格——这个风格就是，仅仅记录纯粹的事实。但是，他们非常愿意把那些教育志里没能用得上的信息在访谈中告诉我。结识并采访他们对我的额外收获是，从他们每个人的人生历程中，我看到了经由学

校系统向上移动的社会流动性。

县的地方志提供了一些城镇的信息，但是关于村庄的信息却很少。然而，我发现邹平县的许多乡镇编辑出版了自己的乡镇志，有时候，仅仅以复写的手抄本的形式存在，但它们仍然对了解村庄学校史、当地模范教师和传统教育家庭这样的历史知识有很多帮助。在山东，内乱、侵略和战争摧毁了许多档案和私人收藏；在县以下各地方很难发现 1949 年之前的文件，因此乡镇志的编写一部分是基于采访。我访问了一位负责县志教育部分的编辑人员，他告诉我，他和其他三位同事将这个地区分成四部分，每一个人负责其中一个部分。在每一个乡村，他们召集曾经参与过教育的老师或干部开会。当访问完这些人之后，他们要求这些受访者尽可能多地回忆他们在当地教育系统的经历并且写下来。如果他们发现写下的文字中有不清楚或者和采访冲突的地方，他们会和受访者重新就这个问题进行访谈，直到他们确认自己已经获得了一个跨越各个时期并且连贯一致的历史图景。最后，用这种方式收集的信息只有很小一部分被记录在县志中。但是编辑们做了详细的笔记，在我采访他们的时候还回忆起了许多细节。他给我的一个建议是，我应该访问一些 1940 年代早期的反日学校的学生，他们至今仍然在某个村庄不时地聚会。后来，这群学生成为我关于那个时期主要信息的提供者。

地方志出版之后是年鉴的出版。年鉴附带有最新信息和最新的统计数据。一些省份和多数大城市定期发表年鉴，而一些行政级别较低的管理机构也不定期地发表年鉴。1998 年，邹平出版了 1986 年到 1995 年十年间的教育年鉴；该年鉴包含了大量篇幅完整的官方文件，包括政府工作报告和指令等。尽管在很多方面它很有帮助，但是年鉴这样的出版物并不是由类似地方志编辑们那样的热心个人所编写，所以它并没有引导我发现一些重要的新的信息提供者。

毋庸置疑，地方志项目和编写官方中国历史一样，是一个政治事件，所以，阅读和使用这些出版物的人必须具有批判的眼光。在我能把印在地方志和年鉴上的文件与原始文件相互比对的仅有的几次机会中，我发现它们彼此间并没有差异，因此我感觉这些出版物的编者都尽可能地准确。然而当官方数据不可信时，编者们对于原始数据中固有的问题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地方官员所报告的数据夸大了到校上学的学生人数，后面我还要谈这个问题。许多相关的信息也因为政治原因被删除。例如，那些在 1937 年到 1945 年日本占领期间，被认为进步和爱国的学校，与那些“反动”和“傀儡”（也就是支持国民党或亲日）的学校相比被给予更多的关注。另外一个政治

偏见的例子是对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的处理,至今依然政治色彩浓重,以至于完全无视这个重要的时期,要么就是被几句负面的说辞所遮蔽,尽管采访结果表明,在那个年代村庄小学和中学入学人数增长的速度是惊人的。所以,尽管地方志是可以信赖的资源,因为根据我的经验,编者们很少改写官方文件和数据,但是地方志无法避免被编写时的政治环境所左右。地方志主要谈论党和国家话语逻辑所允许的话题,然而那些落于官方话语界限之间或之外的,地方生活的各方面信息却很少。所以,尽管你能在某些话题下,比如基本设施、企业和卫生系统方面,找到极小细节上的信息,却很难找到关于卖淫、腐败或民工的信息。

我想从地方志入手开始寻找一些信息提供者。但是,地方志的人物传记部分只提及对中国共产党有积极态度的人或机构,而忽略了那些对当地教育同等重要的"反动派"们。当我试图寻找在中国连续的政治斗争中失利一方的故事时,我意识到,那些后来被平反的人,例如1950年代的右派,相对容易被找到,而且他们也乐意谈论自己的故事;然而那些仍然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人,例如亲日学校的学生和地主家庭的孩子,非常不愿意告诉我他们的经历。但是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地方志对于发现有趣的采访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文史资料》

邹平历史学家们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发表途径是一个被称为《文史资料》的系列出版物,这是一个由很小的办公室发行的出版物,工作人员只有几个人。如地方志一样,《文史资料》也是1980年代政府推动的产物,类似的出版物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县级以上政府都有。《文史资料》主要由那些在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或亲历了重要事件的人的回忆组成。编辑们请求一些信息提供者写下他们自己的故事,还有一些信息提供者的故事则是被资料编辑们采访后记录下来的。在邹平,截止1996年共出版了六本《文史资料》;全部都是关于1949年以前的那一段历史。负责编写的办公室对1931年到1937年的这段历史显示了极大的兴趣;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和乡村建设运动以邹平县为总部所在地。编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邹平县在国家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史资料》常常会着重于当地历史中的光辉时刻,特别是当一些事件可以被构造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一部分的时候。《文史资料》也对其他时期有广泛的涉猎,很多记叙也和我的研究主题(地方教育史)相关联。因为,当信息提供者们被访问某个话题

时，他们往往也会提供他们在教育系统内的简单记录。

《文史资料》的质量取决于信息提供者的记忆。我发现他们的长处是，他们总能回忆起1949年之前他们在邹平的学校生活和居住条件，能描述出一副生动的图景。然而，一些叙述存在着内在矛盾，他们有时还会与地方志记述的不一致，如时间、姓名和数字。当然，他们的记叙也有历史采访中常见的弱点：清晰回忆四五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考虑到一些信息提供者可能已经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早期收集革命历史的活动中反复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因此，对于他们的叙述应该有所保留地接纳。此外，与访谈不同，我们不可能要求《文史资料》的作者和编辑者们澄清某一点或给出更多的细节。不过，《文史资料》依然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们主要记录了那些拥有特殊经历和特别职位的人士。而大多数我访谈的人都是些过着简单生活的普通村民，这些村民是我使用滚雪球式抽样的方法找到的。

同地方志的编写一样，《文史资料》在选择受访者的时候，明显偏向于"积极的"历史人物，当年的党委书记和游击队员都能成为受访者名单中的显著人物。在提供线索寻找合适的信息提供者方面，《文史资料》比地方志用处小。在1980年代，当编者们开始收集故事时，他们聪明地从那些最老弱的市民开始。当我在十年后出现在那里的时候，这些受访者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在世了。我从《文史资料》中还发现许多非常有价值的针对机构和事件的参考资料，我可以在稍后就这些机构和事件做更深入的访谈。

档 案

在我通过地方志、统计数据和第一轮采访得到了邹平教育发展的大致印象之后，我试图在邹平县档案馆里找到更多的文件资料。这个机构在1958年设立时并不引人注目，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1978年人们开始发现它的重要性。那个时候，邹平县档案馆开始把1938年到1978年间的资料整理和分类。但是，所有日本占领之前的当地资料已经丢失。当我在1990年代中期访问这个档案馆时，我被告知1963年之前的历史文献他们收藏的很少，并且大多数与教育相关的文献都收藏在县教育局。稍后他们又告诉我，我不能去看那些文献，因为文献里包含了一些触及个人隐私的资料，而个人的隐私是应该被尊重的。

这类的档案馆遍布中国，研究人员对此有各种不同的经验。我曾经听说一些地方拥有重要文件，他们也愿意对外国研究人员开放；但从我个人在邹平和其他一些县的经验来看，县档案馆的查阅权不是那么容易获取的。

我的印象是，为了从县档案馆获得资料，你要么非常清楚你在寻找什么文件，要么全凭运气。邹平县档案中唯一对我有所帮助的收藏是《乡村建设》，它是19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刊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通常省和国家级档案馆设施更加完备，也有更好的服务心态。在任何情况下，在去田野之前，先拜访当地档案馆，查找已有的信息，看看档案馆有些什么并且愿意提供些什么，这不失为明智之举。

有关当代社会的资料

在我从事的更为现代的那个项目中，我在云南省宣威市研究地方政府的角色和干部与农民的关系。在上文所述的历史项目中，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寻找现存的少量资料，并取得允许去查阅它们（或进行访谈）。在宣威，我的处境大大不同。因为宣威有大量资料，它们似乎都与我的研究高度相关。难题是如何挑选与研究最相关的资料源，以及在研究中如何使用它们。

新闻媒体和当地期刊

我在2000年左右第一次来到宣威。当时市政府还拥有自己的报纸《宣威报》和播放每日当地新闻的电视节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报纸没能生存下来，于2003年停止发行；但是当地的电视频道依旧存在。在第一印象里，当地新闻媒体非常令人失望。然而，一些国家级和省级报纸和电视台开始尝试使用调查记者和其他方法来满足读者和观众的需求；和多数其他县市一级的媒体一样，宣威当地媒体陷在自己的传统角色——党的喉舌——里面无法动弹。登载的内容就让读者感到无聊了，因此导致了《宣威报》的最终停刊。这样反而使它成为了解某些主题很好的资源，比如官方意思形态、社会和政治运动、领导人更替等。购买过往各期《宣威报》非常方便，每六个月的《宣威报》被编成一册。近年来，研究者们相对比较容易获取地方上的新闻资源，这与早年间相比无疑是很大改善。

《宣威报》中可以发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一个例子是，它曾对政府机关人员招聘考试进行过非常系统的报道。这个招聘考试是一个实验，当地政府尝试通过它建立起一个用人唯才和竞争性的干部招聘制度。为了让这些考试显得透明和平等，过程中的每一步都预先在报纸上通告全市，之后还有跟踪报道。几乎同时，出于同样原因，报纸刊登了被任命为市长和副市长

的干部简历，内容包括年龄、教育程度和近期任职等。干部们担任不同职务的信息通常被组织部严密保管，组织部是中国政府里最不开放的机关之一。因此，报纸上对招聘考试和干部任职的报道，为后来访谈官员提供了一个良好及必要的起点。

报纸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指南，帮助我们找到那些代表当地政府形象的人物。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包括乡镇领导和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村长，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在村委会选举的过程中，《宣威报》进行了很多关于候选人的报道，这就清晰地告诉大家，市领导期望哪种人管理村庄。宣威的主要企业和成功企业家在广告中展示自己，这样的广告常常被装扮成新闻报道的样子；不同领域的模范单位和个人被表扬。尽管这样的模范并不具代表性，但是研究他们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他们展示了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又是如何获取合法性的，以及如何使市民们接受的。

除了新闻媒体之外，一些当地期刊尽管发行量很有限，但却很有意思。其中有两份期刊最后被证明对我非常有帮助。当地有一个镇向其全体干部发放内部月刊。在这份期刊里，干部们可以读到镇机关不同部门的工作计划、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如何处理镇上居民提出问题的建议、激励士气的发言和随心所欲的干部生活遐想。除了对政府工作给予非常具体实在的洞察之外，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可以了解干部们的自我认知，以及领导们想要在干部队伍中培养怎样的专业精神素养。

我的研究兴趣之一是在市场条件下如何进行文化控制（Thogersen 2000），因此，我非常高兴能在当地发现一个文化杂志，它发表当地作者写的小小说、诗歌和戏剧，还有讨论文化问题的文章。我在一次访谈中知道了这个杂志，通过杂志上投稿者的名单，我接触到了一些当地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活跃的作家、画家或是音乐家；与此同时，他们还工作于文化管理部门。这些人最后成为极具价值的了解宣威官方文化生活的信息提供者。

官方文件

尽管当地政府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我各类报纸和期刊，甚至有一些还被划归为内部的文件，但接触常规政府文件还是非常困难的。官方文件，这个词语涵盖非常宽泛，主要是政府上下级之间的上传下达。当地干部向上级请示和报告他们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和议案；党和政府的上级机关向下级机关以红头文件传达命令、指导方针和信息。红色的信头表明它们是官方的。所有文件在一个高度结构化了的系统内流转，系统详细规定了这些文件应

该被如何设计和处理。例如,党的文件的管理章程(中国共产党 2004)就有长达 19 页 40 段的内容在规范 14 种文件的正确名称(其他方面还不在此列),这些文件从重要议题的严肃“决议”到不那么重要的“会议纪要”。

当然,关于这种文件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得到它们。在中国政府的分类系统中,官方文件有三种机密程度(依照降序:绝密、机密和秘密),但是即使没有密级的文件也被认为是内部文件,意味着它们不能被带出中国,接触到这些文件的方式也被严格控制(中国共产党 2004:18)。这个文件管理系统给研究工作带来巨大的障碍,因为很多敏感信息被系统划归为机密。最近一个登载在《中国人权和中国劳动力通讯》上的研究报告显示了官方是如何通过国家机密的法规架构,控制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一些关于童工、生产事故、失业率和劳工风潮的报告和统计数据被持续地压制(HRIC 2004)。

我在宣威和其他地方的经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党和政府官员以一种开放灵活但无法预测的方式对待文件分类系统。持有调查许可和上级机关出具的介绍信,我可以很容易地接触到普通的“内部”文件。一些干部严格遵守规定,坚持大声读出文件而不是给我一份复印件;大多数人都认同这样做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有些情况下,官员愿意给我机密文件,特别是当他们被上级直接要求给予我帮助时,但这样的情况很少。几乎没有干部积极主动地提供这些文件,除非我知道那份报告或法规的名字,并直接向干部索取。当地的报纸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它们会偶尔提到新的重要文件。

另一个问题是:研究项目结束后,在发表文章时,你能多大程度上公开地使用机密文件。我想,你要考量的主要问题是:不要让你的受访者处于尴尬境地。我从未秘密地或通过私人途径得到过任何文件,我所得到的文件都是在访谈中受访官员正式交给我的,为的是更为准确地回答我的一些问题。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在提及和引用内部文件时没有迟疑。然而,一些研究人员在私下里谈到,他们和中国政府发生的一些纠纷,是因为他们发表的文章中,有某些信息来自机密文件。如同在许多其他领域一样,中国政府对文件的访问有严格的限制,但在现实中却非常灵活。这就让中国政府可以随时打击那些从事政府不喜欢题材的研究人员,同时又让其余的人处于不安的状态。因此,让研究人员处于一个无法应对的两难境地。

官方文件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发展计划,以及思考方式具有非常高的指导性。我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去采访一名文化稽查队队员。他跟我谈到了他和他的队友被派去市场罚没非法文化产品的情况。长时间的采访之后,我仍然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在市场上找什么。但是,一个省级政府的指令一下子

就解答了我的疑问，指令中明确写着稽查队应该寻找的文化产品的名称。与此类似，某一乡镇呈交给市政府关于乡村人民思想状况的报告，报告本身比我对其作者的采访更加具体实在，包含的信息量也更大。

然而，文件并不是为了帮助外国研究人员获得信息而编写的，它的编写是为了达到某种我们通常不理解的目的。一个干部可以通过上报当地重要政绩来加深他的上级对他的良好印象，或是夸大某一个社会问题来获取更多的资源。在这两种情况下，作者都会对文件加以修饰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可能被地方上反映"严重贫困"情况的报告所吸引，特别是如果报告带有警讯意味的时候；然而报告者的动机却可能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在的乡镇维持"贫困乡镇"的身份，以享受由此带来的好处。

我们同样应该知道的是，来自上级政府的指令文件不一定会被忠实地执行。这些指令在当地被转成社会行为之前，已经被解释和改变了很多次；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根本没有被执行，只存在于文件的某处。我也发现宣威关于乡村变化的官方文件倾向夸大党和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许多当地活动，更别说在经济领域内的成就，都被解释为党的某项政策或当地党政领导干预的结果，尽管其最初的创意明显来自于私人企业家。通过这种方式，官方文件构建了如此这般的一个世界，党在其中控制一切。因此研究人员需要补充其他信息源，比如与官方圈子之外的人进行访谈，还有对社会行为的观察。

统　计

为了决定我应该去宣威的哪一个乡镇，我需要对各个乡镇经济和社会形势的信息进行比较，所以市统计部门制作的包含有乡镇统计数据的小小年报对我非常有帮助。在 1990 年代，这些册子被划归为"高级机密"，并且每一个册子都有一个编号，方便在资料被泄露的时候追溯来源。自 2000 年起，它们仅仅被归类为"内部"文件，相比以前，温和了许多。然而，自从 1990 年代起，这些资料也不是很难获得，因为地方干部觉得直接将资料交给我们比起在访谈中回答我们的问题更加方便。

来自县和乡镇的统计数据其缺点非常明显，所以，很容易理解，省级和国家级统计部门经常从社会基层直接收集数据来进行他们自己的调查（参见 Gustafsson 和 Li 的那一章）。然而，请记住，在许多情况下，地方上的统计数据被整合成了中央统计数据，所以底层产生的错误可以在高层被轻易地放大。和文件一样，统计数据也可以被整理起来用于许多不同的目的，所含

数据反映了它们的目的。这一点在我的邹平项目里已经非常明显。在邹平，我曾经访问过一个小学入学率达99%的乡镇。这个入学率其实是惊人的高；因为与此同时，国家媒体已发出警示报告：父母让孩子辍学，以照顾弟弟妹妹或在自家的田里工作。结果发现，当地学校校长是根据新学年第一天报到情况报告了这个乐观的数据。在此之前，老师和村干部对学龄儿童的父母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为自家的孩子注册，所以孩子们都在新学年开学那天出现在校园里。学校校长把这个数据报告给教育局，教育局又夸大了来自几个学校的数据，制作了县乡级别的统计数据。从校长到县里的干部每个人都很开心，因为这些基层干部可以向上级证明他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并且成功地执行了义务教育的法律。这个数据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后再计算学生数量，结果就会截然不同。

在宣威，一个村干部告诉我，他向乡里汇报的人均GDP被很大程度地夸大了。他从上级收到了一些标准，他必需据此调整收入数据。比如，如果村里有人拥有一辆卡车，即使车主没有赚取任何运输收入，他也应该报告来自卡车的特殊标准收入。然后村干部们就可以声称，他们已经让整个村子脱贫，也因此增加了他们自己的政治资本。蔡永顺做过关于农村地区统计报告的田野调查，他研究了干部们如何在报告中“夸大他们的成就，缩小他们的失误，甚至伪造他们的统计数据”。他还发现，这些问题“深深扎根于中国行政系统的机构安排之中”(Cai 2000, 784-85)。

那么，为什么要费劲去收集地方上的统计数据呢？首先，统计数据在任何国家都是有问题的，永远都需要小心处理。我不清楚中国统计数据的质量是否比其他国家低很多。其次，虽然有这样的看法，研究人员应该总是根据产生和使用统计数据的社会组织架构对统计数据进行解释，但是，我在中国看到的统计数据还是能够提供比较准确的信息，也能反映重要的社会实际状况，我就不必非要透过“社会组织架构”这个滤镜来使用统计数据。例如，我曾经对比来自不同乡镇的统计数据(比如人口、重要的公司、城镇化程度、干部数量、工业企业、学校和医疗诊所等各方面)，这些数据都有助于对宣威县各地经济差异情况形成一个相对一致的总的了解。我随后拜访了其中一些乡镇，那些在统计报告中显得比较富有的地方，在实际生活中也确实看起来比较富裕。上级频繁的检查可能也限制了地方上对当地成绩统计的夸大。

官方渠道之外产生的文字资料

中国民间人士编写的文字资料正在迅猛增长。这些资料为我们创造了

机会去聆听一些与官方说法不同的声音。在宣威一个新的风尚是当地人出版的他们自己的家谱,通常都是以令人惊奇的精装本发行,家谱中还带有彩色插图。

正如地方志一样,家谱代表了地方性历史书写的一个类型,这种文献体裁本身就有悠远的历史;家谱在后毛泽东时代复兴。但在其他方面,家谱与地方志并不一样。它们记载了当地家族的历史,既同一姓氏同一祖先的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在宣威,大多数汉族家族声称他们的祖先可追溯到明代(1368—1644)。家谱记载父系家族世系。家谱包含了迁徙到宣威之前家族的故事、族规家约等,但是主要部分是含有男性后裔姓名的各分支家族树;最近一代,则开始含有妻子和女儿的姓名。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显赫家族成员的传记。家谱的编写和发行不需要公共支持,而是依赖于家族成员的捐献。

在宣威,政府显然秉持对家谱的整理不予干预的政策。我遇到的家谱编撰者实际上多数都是党和政府的老干部,他们在这项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他们认为家谱是"中华民族光辉历史遗产的一部分",甚至在文献里还发现了一条毛泽东 1957 年的语录,毛泽东赞扬了家谱作为一种历史研究资源的价值。但是新发行的家谱到底有多么"官方",这一点实际上仍有限制。它们没有 ISBN 发行编号,所以尽管它们有现代化的精美制作,却仍然只是半私人化的,经由家族而不是书店发行。

家谱非常有趣,因为它们特别专注于一些重要但官方资源里很少提及的话题,例如个人职业发展、几代人之间体现出来的社会流动性、婚嫁模式等。然而,不仅仅是它与官方出版物有不同的主题。如果把家谱中的传记与地方志中的传记做个比较,就能显示两者在展示个人和职业的方式上有明显的区别。地方志有革命烈士、重要历史人物、道德与政治上的模范,以及官员、专业人士和一定层次以上的学者的传记。然而,这些人都已经去世。家谱不仅仅包含在世的人,还扩大了生命历程被印刷成书的人的数量,并涵盖了其他类型的人,特别是那些经济成功人士。地方志在人物传记中把中国共产党塑造成人们职业发展的推动力量,家谱更大程度上将生命历程表现为个人奋斗的结果;所以富有的企业家和商人在家谱中大量出现,其传记详细记录了他们如何聚集财富。这意味着一个研究农民企业家的人员能够从家谱中发现不同类型的信息提供者,找到不同年龄组和行业的代表,进而访问他们,因为他们依然生活在这个地区。

就非官方文字资源的兴盛而言,家谱不是唯一的例子。在宣威的街道

上，人们发放非法印刷的健康产品广告和未经审批的药品广告，这些广告含有大量关于人们如何看待疾病、健康、性、家庭生活、幼儿保健和衰老的含蓄信息。在当地邓小平岳父的纪念馆前，老人们在卖一些宗教宣传品和小册子，里面都是些魔鬼和仙女的故事。灯柱上贴有招工广告并标明工资，偶尔还贴有政治抗议的海报，比如在我早前的章节里就谈到过一个。因此，不同的研究题目都有可能从中找到有趣的非官方文字资料，并从那里进一步追寻到信息提供者。如果我们把搜索范围扩大到私人文字资源，当然可以有更多发现。日记、私人信件、账目和礼品单都是可以用于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资料之一。但是很明显，这需要研究人员和信息提供者之间有高度的信任，以获得这样的资源。

文献资源和访谈之间的互动

在一个高度文明——有些人会说是痴迷于文字——的国家，如中国，文献资源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至关重要。这一点，本书的几位贡献者都有所提及。与此同时，许多类型的社会活动却从未在文字媒体中出现。官僚机构范围之外的社会活动领域常常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同样，当局有意隐瞒的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所以，如果我们只从文字资源研究中国，即使扩展至非官方文献的领域，显然我们得到的将是一张被扭曲变形的图景。当然，这里就是访谈、对社会活动的直接观察和社会调查应该进入的地方。

在本章，我探讨了地方上编撰的文献的潜力和限制，以及这些文献资源如何与访谈相互作用。我发现最有效的策略是以曲折往复运动的方式，把访谈和对文字资源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从新闻、期刊或图书中发现潜在的信息提供者，然后采访他们，向他们索取更多的文字资料，然后带着我从资料中发现的问题再回来找他们，继续去拜访那些在访谈和文字资料中发现的其他信息提供者。这种方法对文字资源中可见的社会阶层最为有效，通常是官员和知识分子。然而，随着官员和知识分子圈子之外的文字资料的数量不断上升，有理由相信其他类型的人群也会在文字资源中出现。

[参考文献]

Cai, Yongshun (2000) 'Between State and Peasant: Local Cadres and Statistical Reporting in Rural China', *China Quarterly*, vol. 163, pp. 783-805.

HRIC and China Labour Bulletin (2004) 'Labor and State Secrets', *China Rights Forum*, no. 3, pp. 23-33.

Pieke, Frank N. (2003) 'The Genealogical Mentality in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2, no. 1, pp. 101-128.

Prior, Lindsay (2003) *Using Documents in Social Research*, London, Thousand Oaks, Delhi: Sage.

Thogersen, Stig and Soren Clausen (1992) 'New Reflections in the Mirror: Chinese Local Gazetteers (*difangzhi*) in the 1980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7, pp. 161-184.

Thøgersen, Stig (2000) 'Cultural Life and Cultural Control in Rural China: Where is the Party', *The China Journal*, vol. 44, pp. 129-141.

——(2002) *A County of Cultur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Seen From the Village Schools of Zouping, Shando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Ye, Wa and Joseph W. Esherick (1996) *Chinese Archives. An Introductory Guide*,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Zhongguo Gongchandangjiguan gongwen chuli tiaoli [Regulations on dealing with 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004). Beijing: Zhongguo fangzheng chubanshe.

8 在实地调查中寻找“局内人”的视角：以四川预防拐卖研究为例

◆ BU Wei（卜卫）

导　言

2002 年，在去四川做田野工作之前，我已在其他省市，特别是农村地区做了很多关于底层人民如何使用媒介的调查或研究，但我对“局内人的视角”没有特别的关注。我常常根据自己做的调查计划和指导来收集地方数据，然后根据数据写成报告。在这个过程中，缺少对信息提供人及其观点和行为的研究，也缺少对信息提供人如何反应和应对“问卷”的研究。更准确地说，当时我对研究者“局外人”和研究对象“局内人”的差异不是特别敏感，结果导致未能对其做认真的分析，并指出它对研究的影响。2002 年的四川田野调查，特别是对拐卖幸存者的调查给了我反思上述问题的机会。2003 年 10 月 2 日至 3 日，丹麦北欧亚洲研究所举办了“中国田野调查方法论与实践工作坊”（*Workshop on Fieldwork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in China*），来自中国、北欧、西欧和美国的学者约 40 人与会。不难发现，在中国做田野调查，无论是外国学者还是中国学者，或是哪怕就生活在研究对象之中的研究者，只要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建立研究关系，对“局内人”来说，研究者就是“局外人”，就需要谨慎处理“局外人”与“局内人”的有关议题。这篇论文将 2002 年预防妇女儿童拐卖项目的田野调查作为案例，来讨论“寻找局内人的视角”“寻找局内人的问题”以及“寻找局内人的知识与策略”为什么这么重要。在此之前，这篇论文将首先回顾定性研究在中国内地传播学领域的位

置及其变化①。

关于定性研究

1980 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经济的改革开放,在 1950 年代被强令停止的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迅速恢复起来,社会科学开始出现繁荣的局面。那时,为了满足广大研究人员的需求,大批西方有关社会科学研究的书籍被翻译介绍进入中国,其中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书籍,如美国社会学家 Earl Babbie 所编著的 *Practice Social Research* 等。这些书带来了"科学"的和"客观"的研究概念,文化革命期间那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宣传作品逐渐被排斥在社会科学领域之外。

至少在传播学界,首先进入中国学者视野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定量研究。从模仿西方的社会调查开始,中国传播学研究者开始了解和学习科学的研究方法。由于大多数研究者未经过研究方法的系统训练和对方法论的反省,这种学习导致产生了另一种偏向,即只有定量是科学的或主要的方法,对定性方法缺乏系统的认识。1999 年出版的国家级重点教材《传播学教程》中的研究方法只包括社会调查、内容分析和控制实验三种定量方法(郭庆光 1999:277-289),在另一本教材《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中,传播学研究方法也被全部概括为定量方法,除上述三种方法外,还将"个案研究"列在定量方法的标题下(戴元光,等,1988:381-405),可见在 1980 年代占有主流地位的传播学研究者还未能区分定性与定量。亦有教材将"自然观察法"不加区分地与社会调查、内容分析和控制实验并列(张隆栋 1993:384-392)。

这种对定性方法的忽略不是偶然的。在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的社会科学领域,"一些研究者对定性研究的理解过于宽泛,他们通常将所有非定量的研究统统归为定性研究,如思辨,以及个人的片段思考、感想、经验或印象的描述,对政策简单诠释等均被纳入定性的范畴。他们习惯将自己的所思所想称为定性研究的成果。"(卜卫 1997:51)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提出"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精确化"(陈波 1989:122)。这种对定性研究的"中国化"的理解与真正的经验主义的定性研究相距甚远。"大部分

---

① 这是 2003 年写的文章,因此,中国传播学领域在方法论和方法方面的后来的进步未能包括其中。

'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陈向明 2000:23),因此,它难以被看作是科学的方法。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有些研究者(可能多数是不了解定量研究方法的人)来说,这种中国化的"定性研究"是他们习惯使用的方法,因而被他们认定为"科学"的研究方法。

1996 年,北京大学学者陈向明发表了"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陈向明 1996)。引起了人们对定性方法的讨论与关注。但在传播学界,将中国化的"定性方法"还原为经验主义的定性方法,并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这个阶段从 1990 年代中期①到现在也没有完成。其标志之一是有关定性研究的论文数量甚少,尽管实际上中国需要大量的定性研究。

在中国,地区差异、阶层差异构成了较为复杂的局面,大规模的标准化的问卷调查,特别是涵盖农村地区的问卷,如果忽略这一点就会导致偏离现实的结论。比如,传播学调查问卷经常出现的一个题目是:"你喜欢看什么电视节目?"在中国农村,大多数家庭里只有一台电视,选择的频道有限,节目选择可能受到男主人的控制。在我下面讲述的案例中,我访问的一个被拐卖的妇女每天似懂不懂地看"武打片",这不是她的选择而是她丈夫的选择,因为她不掌握遥控器。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问她"喜欢看什么电视节目",她可能回答"武打片"或只笑不答,这样就不可能得出可靠的数据。定量研究的主要工具是标准化的问卷,它的使用至少需要如下前提:被访问者是独立的人并能独立地使用媒介;能很好理解调查的问题(这也意味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文化和语言上没有显著差异)等。在某些地方可能是这种情况,但在大多数中国农村地区就不是,至少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农村同辈中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来消费媒介的,他们对城市知识分子编制的问卷通常感到无法把握。

在定性研究中,我们通常要讨论"局外人"和"局内人"问题,并对这个问题保持相当的敏感,因为这个问题影响到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研究过程也要求研究者不断地接近和理解"局内人"。定量研究表面上不大关注"局外人"和"局内人",但实际上,标准化的问卷将分布在各个阶层的有显著差异的"局内人"的问题变成较为统一的"局外人"的问题,特别是在涉及收视率、发

① 1990 年代中期,传播学界开始发表有关定性研究的研究论文,如卜卫. 传播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 年第 2 期,p. 8-15.

行量的媒介市场调查中，统一的标准掩盖了“局内人”的差异和视角，使他们屈从于“局外人”的视角。

这就需要我们反省来自一些西方国家的标准化问卷、测量指标、量表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而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是否具备同样的基础。如果基础不同，最好的研究起点是定性研究而不是定量研究。我个人就是在反省定量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尝试定性研究的。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定量研究，而是根据不同的研究主题更为谨慎地选择研究方法和工具。

定性研究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关系（陈向明，2000：134）。作为局外人研究者，通常要做一种选择：或是学习做一个“局内人”以打入研究对象所属的文化群体，或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接近“局内人”。无论做何种选择，都各有利弊（艾尔·巴比，2000：363）。从我的研究经历来看，无论是做“局内人”还是做“局外人”，都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要通过学习或模仿“局内人”的视角来深入地理解研究问题。视角（perspectives）是一种建立在一定经验或知识基础上的观察方法。由于“局内人”与“局外人”的经验和知识不同，他们观察同一个问题或事实的视角就不同。研究总是要获得“局内人”的经验或理解，因此，寻找“局内人”的视角至为重要。

这篇论文试图通过研究个案“打拐传播战略研究”（*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gainst the Trafficking of Women in Sichuan Province*, 2002）来探讨在实地调查中寻找“局内人”的视角的经验与教训。

研究背景与方法设计

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和重男轻女等封建思想的影响，以及大规模人口流动后对弱势群体缺乏相应的保护和教育等原因，中国自 1970 年代以来发生了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一开始是边远贫困地区的妇女希望通过异地婚姻改善生活而大量外流，由此产生了拐骗妇女卖为他人为妻，而后发展为日益严重的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中国公安部门自 1980 年代中期开始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简称“打拐”）。1999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公安部门开展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合作项目，促进了中国“打拐”斗争的深入发展。这个研究的目的

是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制定中国,特别是在四川消除拐卖妇女犯罪活动的媒介宣传教育战略提供依据。我与南加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博士生邱林川一起承担了这个研究任务。

实际上,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研究方法设计,诸如是否做访谈或找谁做访谈。到了四川后,我们决定先到各个相关现场去考察。于是我们到了四川省金堂县、人寿县(国家级贫困县)、被拐卖妇女家里、负责打拐的公安部门、当地传播机构、劳务市场以及打工者居住地进行观察和一般性访谈。据当地介绍,劳务市场通常是主要拐卖发生地之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四川省妇联和四川省公安厅已联合在成都劳务市场进行了宣传活动。基于以往的研究经验,我们突然意识到这项研究必须包括未来项目的目标群体——农村年轻女性进城求职者——的经验与看法以及对"打拐"和"防拐"宣传教育的反应。随即,我们开始尝试在求职女性中寻找访谈对象。事后说明,这种尝试是非常必要的,日后一些关键性传播干预策略来自这些访谈。在这项研究中,两位研究者始终是"局外人",如何寻找"局内人"的视角来理解她们的经验、看法和对"打拐"宣传的反应,就成为我们面临的挑战。这篇论文将分为三个部分来分析这一研究个案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研究经验与教训

发现"局内人"与"局外人"对同一事实或事物理解的差异

在现场观察中,我们被村里的干部带到一位被拐卖的彝族妇女家里。这位妇女对我们说:"拐卖的事情,我真不好意思说。在凉山时不晓得任何拐卖妇女的事情,在那里被人带走嫁人是正常的。"她告诉我们,你们不要想带我离开这里。这里比我凉山的家好多了。我可以吃足够的粮食,还不用下地干活,只照顾家里就行了(后来我到了凉山才知道,大多数彝族妇女很辛苦,不仅要做所有的家务劳动,还要下地干活,等于双份工)。以我的经验和知识,我会认为她是被非法卖到这里的,应该被解救,但从她的经验来看,是不是"非法拐卖"并不重要,她的生活由此得到改善,因此拒绝别人的解救。尽管她的生活在我们看来仍然穷困,尽管她的丈夫有病(这也是他家里为什么要买老婆),但她的理解是只有这种选择才对她更有利。或者说,为了生活下去,她没有更好的选择。对"拐卖"这一事实,我们与被拐卖妇女显

然有不同的理解。

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碰到,但这次特别让我警醒。我提醒自己,在这个研究范围内,应该尽量发现我们与目标人群(或研究对象)所有的不同的理解。当看到街上的大标语“坚决打击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的时候,我就想,一位贫困的、难以生存下去的、没有任何技能或一定文化的年轻女性,听到人贩子说“可以卖到生活好的人家,坐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天安门”以后,她会对这样的标语有何感想?这样的标语会影响她的选择吗?经过调查得知,这些年青女性从农村出来找工作,一般身上只带50元左右,每天吃饭和住宿最少要花5元钱,也就是说,10天之内必须要找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标语”似乎影响甚微。我们深信,“打拐”及“防拐”宣传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

由于这个项目是媒介倡导项目,我们集中地研究了“局内人”对电视的理解。多年以来,电视被当作一个有效地宣传手段,大多数城里人从电视里知道了“打拐”。但对这些处于被拐卖危险之中的农村女性,电视及电视宣传意味着什么呢?

那位被拐卖的彝族妇女说,原来在凉山老家的时候,有电灯但没电视,村里人都没有电视,也看不懂报纸,因为读不起书。现在的家里有电视,是闭路电视,每月交10元钱。电视和房子都是外出打工的丈夫弟弟送的。因为丈夫有癫痫病,没有钱(也因为此,家里才花钱买媳妇)。我们在她家里看到,陈旧的电视机旁边有一个稳压器,因电力不足,必须花一百多元钱买一个稳压器来看电视。邻居大嫂插话说,我们这里不是全都有闭路。今年收成好,村里安的人才多起来。在另一场访谈中,来自简阳地区的打工者们说,老家有黑白电视,已经买了10年,当时花100多元买的,能看两个频道,因为接收信号不好,需要装闭路电视。但“太穷了”,又装不起。他们或许没有电视,或许有电视但接收质量不好。

“看电视”本身也与我们事先想象得不一样。这位彝族妇女告诉我们,她白天忙看不了电视,但晚上可以看。家里人都爱看武打片,她现在也能听得懂。这位彝族妇女最喜欢看有关家庭关系的片子,但不记得片子的名字,因为不识字。尽管能看到中央电视台,但她不知道什么是“焦点访谈”。从上述谈话中,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四点:其一,部分人并不是从小就能看上电视。当生活改善以后,才开始接触电视。其二,她白天忙于家务,没有时间自己看电视。其三,到了晚上,她随着家里人看电视,很难自己选择频道或内容。其四,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她偏好的内容非常有限,并且不看主流

节目。

研究者与“局内人”在谈话中都谈到了电视,但研究者印象中的电视是彩色的,可选几十个频道的,接收质量越来越好的,从小就可以看到的,而“局内人”的电视则是黑白的、只有几个频道的、接收质量较不好的,可能还需要安装稳流器。更重要的是,限于受教育年限或文化水平,他们难于接近进而接受“主流文化”。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她们理解有关“打拐”的电视信息。当我们以主流文化的观点和主流媒介渠道来进行“打拐”或“防拐”宣传时,这种差异就应该被考虑到。

提问:局外人的问题还是局内人的问题

由于劳务市场是拐卖妇女的主要发生地,我们考察了成都九眼桥劳务市场和另一家家政劳务市场。

九眼桥劳务市场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劳务市场,每天有数千人在这里求职。一进入劳务市场,就可看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四川省公安部门、四川省妇联与劳动局共同制作的“打拐”标语。在场内,经过下岗区就到达了女工区。与男性求职者不同,女性没有用一张纸将自己的技能和求职愿望展示给用人者,经询问是因为“嫌贵”。她们或站或坐,等待着别人来挑选她们。女工区一侧墙上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设置的“打拐”展板,若干人在观看。

我一进入劳务市场女工区,就有不少人拥过来。她们以为我是用工者。我向她们说明,我是研究者,她们便散开了。我走向离展板比较近的几个年轻女性,与她们攀谈起来,知道她们是从简阳地区来找工作的,都不到20岁。我问她们,“你们喜欢这些展板的内容吗?”“你们认为这些展板对你们有用吗?”她们便不再说话。

很长时间我都觉得比较尴尬。我问了另外一群人,也没有人对有关“展板”的事情感兴趣。有的人说,“有用”;也有的人说:“没啥子用”。我知道她们在应付我。

我想肯定是我的问题不对。事后我明白我的问题完全是“局外人”的问题,“局内人”没有兴趣,也无从回答。

我与另外一个研究者走到街上,仍然看到许多农村女性等在街边。我坐下来与她们聊天。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彼此有了信任。我问她们,你们到这里找工作不怕被拐卖吗?一位19岁女孩说:“不怕,我能认出谁是人贩子。”我立刻觉得找到了可以深入谈话的问题,“你怎么能认出谁是人贩

子呢?”

她们七嘴八舌为我们描述了劳务市场中可能是人贩子的人。“大都是男的,也有女的”“不背包”“没有身份证和任何证明”“有证件也可能是假的”“招服务员,并给高薪”“专找靓女说话”“有面包车在路边上等着,有人先跟你谈,然后几个人将你推上车,然后你就下不来了”“反复在劳务市场出现”“他跟你讲叫你去做工,你要看他的脸,看表情,是不是真的,要是骗子的话,他会把你叫到一边,很小声地跟你说,眼睛不停地四处看。真正请人的会很大方的”“人贩子请人说话要背人的”。

根据她们的描述,我也看出了人贩子。我看到一位高个漂亮女性正在拒绝人贩子的邀请。我明白了打工妹之间的这种人际交流比“严厉打击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的标语要有效得多。对她们来说,工作必须要努力找,但前提是要能认出人贩子。

见时机较成熟,我邀请她们去吃晚饭。她们推让了一下,有 6 个人与我们一起去了。

在饭桌上,我问她们,“除了辨认人贩子,你们还有什么样的措施能防止被拐骗?”结果两位女性谈了她们被拐骗的经历。一位 38 岁的妇女说,“18 年前我自己就被拐过。不过后来逃出来了。我也是在劳务市场碰见个女的,说叫我到外地去打工,我就去了。到了那边,是汕头那边,她说让我先住她同学家,我听不懂她跟外地人的说话,是广东话,我咋听得懂。但我假装睡觉,在蚊帐后看见她跟那人点钱。买我的那个男人又矮又丑。他们说我‘好靓’。我先跟他妈住了两天,第三天晚上来了好多人喝酒,后来人少了,他妈也不见了,我就知道不对,就闹着要走。他们没办法,村里有好心人帮我买了回广州的票,我就逃回来了。”这位妇女说,她在被拐卖之前从未听说“拐卖妇女”的事情,她是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发生怀疑的。另一个 28 岁的高中毕业生说,“我 1998 年也有一次危险。在九眼桥劳务市场,有个人老是说看着我眼熟,叫我跟他去做工,说肯定不会卖我。都走到马路上了,我产生了怀疑,就假装脚痛不跟他走,他威胁我说‘我看见你要收拾你’。我说,我不怕你。第二天又在劳务市场碰见他,他也不敢怎样。”一位打工妹说,“我的小姑子就被人拐跑了,在山西,不过生活还好,她没怎么回来。”另一位打工妹插话说,她们村被拐走了 4 人。她们相互总结说:如果有人跟你说‘看着眼熟’,或请你去外地打工,你就应该警惕了。那位 38 岁的妇女说:“他们就喜欢骗刚出来的小女娃,老实,卖得出价钱。”

她们一边吃,一边介绍了自己的“防拐”经历和经验,比如不会告诉陌生

人自己的姓名和原住地地址；她们说，访谈一开始，她们给我们写的姓名和地址都是假的；她们将身份证和联系电话藏在胸罩里；与邻居结伴找工作；也有的打工妹请自己的母亲或其他亲属陪自己找工作，找到了工作亲属放心才回去，等等。

我觉得大有收获，因为我终于知道了一些有关农村女性如何自护的信息。实际上，我已经完全抛开了那种“展板是否有用”的“局外人”的问题，转而面向女性求职者，努力去发现她们的问题。“如何认出人贩子”，就是她们自己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是她们的生存需要。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她们的“防拐”经历和策略也都浮出水面。

理解“局内人”的知识与策略

上述谈话已经让我意识到农村女性求职者初到城市，经过磨炼，很快有了自己的求职知识和策略。如何辨认人贩子，就是她们获得的非常有用的知识；对自己个人信息保密，也是她们的策略之一。理解她们的知识和策略，对处于主流社会地位的研究者通常是一个挑战。

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我们又来到另一家家政劳务市场。

这家家政劳务市场是成都有名的保姆市场聚集地。我们看到上百个女性求职者坐在场内的院子里，等待挑选。但在场外，劳务市场对面的马路上，我们也看到数十名打工女在马路一侧等待招工，这就是被严令禁止的“非法”场外交易。一般来说，场外交易比场内交易被拐卖的危险要高得多。但为什么求职女性宁愿冒险在场外交易呢？

我们用同样的方式邀请了几位求职者与我们一起吃饭。她们告诉我们，场内交易“太贵”，且没有保障。再谈下去，她们就谈到了身份证的故事。实际上，在场内交易门口，我看到了捆成一沓的身份证，但我没有意识到身份证对于漂流到陌生城市里来的求职女性的重要性。

如果要进行场内交易，除了交钱，还要收缴身份证。找到雇主后，身份证直接被交给雇主，打工妹本人拿不到。这是一部分比较自主的打工妹所不能接受的。一位打工妹叙述了她与身份证的故事。一开始，她也在场内交易，交了自己的身份证，找到了工作，身份证就给了老板，“中间我拿不到”。她说，“按照规定，我跟雇主之间有合同，但工作一个月了，对方不发工资，我没办法，因为他们收了我的身份证。我就去找区劳动局，可以打电话的。劳动局的人告诉老板扣身份证是违法的。但劳动局那边也没有作用，他们问我雇主有没有营业执照，我说没有，他们说这就难办了。最后我只好

打 110,警察来了,他们才把身份证还了,但要我道歉,因为我做了'缺德事'(指的是打 110),我是真的没办法,劳动局也管不了,我只好这样。”

为什么要交身份证以及后来为什么要将身份证交给雇主而不是本人,从访谈中得知管理部门是帮助雇主“防着她们”。一位打工妹说,“有的时候老板请了我,比较信任我,那些管理员就会跟老板说,要提防着她,要收她的身份证,偷了你的东西好去报案。这种扣身份证的做法我们也知道是犯法的,但他们这样,我们也没办法。”进门要交身份证的做法不被这些打工妹所接受。其中一位坚定地说:“我把我的身份证看得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

一位打工妹还说,管理员还“训话”,“他们当你是一无所知的小孩子。有一天一个女管理员对仍没有找到工作的女工说,你们想想为什么那么多人被人请走了,但你们还没人请,是不是因为……后面的话我就不说了(是脏话)。所以我不愿意去那里……我的尊严不容践踏。”她们说管理员“很霸道”。在场外交易被看作是“扰乱秩序”,有时还叫警察来抓人和罚款。

从农村女性求职者的角度来看,一边是劳务市场、雇主、警察要维护“秩序”,但这种维护是以女性求职者“可能偷东西”或“需要严格管理”的假设为前提的,是以牺牲女性求职者的自由和尊严为代价的;另一边是孤立无援的求职者的抗争。场外交易是她们面临着社会歧视以后采取的一种抗争方式。虽然“非法”,但却是“弱者的武器”(郭于华,2002)。在这种无声的抗争中,女性求职者发展了她们的保护身份证的知识(“不能交出去,交出去雇主不给我工资我也没有办法”)和策略(即场外交易)。

研究总结

这个研究给我如下启示:

1. 现场的重要性。到现场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每做一次现场观察和访谈,我都更深刻地体会到它的必要性。在这个研究中,现场工作使我认识到了以往的宣传倡导偏离了农村女性求职者进入城市后建立起来的知识和策略。甚至有关部门的“保护”变成了对她们的伤害。这个研究也使我又一次反省我的“局外人”身份。作为一个“局外人”,如何发现“局内人”的视角仍然是我面临的挑战。从这个研究中,我们的确发现了许多事实,根据对这些事实的分析,我们修改了以往的宣传倡导的策略。但我深信,还有更多的事实被掩盖了,所发现的事实仅仅是冰山一角。

2. 为了获得“局内人”的视角,在研究开始的时候,就应该集中发现“局外人”与“局内人”对同一事实的理解的差异。

3. 在研究过程中,要不断地发现“局内人”自己的问题。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局外人”的问题或假设只有变成“局内人”自己的问题,我们才能获得有效的信息。

4. 从被研究者的经历中发现并理解她们已经建立和发展中的知识和策略。在这个研究以前,我通常是通过文献、统计数据和媒介报道来了解被拐妇女的故事。她们通常被描绘为被动的、无知的和等待援救一个弱势群体。但这个研究使我看到了她们的“防拐”知识和策略,在有限的空间中期望通过抗争掌握自己的命运。我相信,任何一个在边缘生存的弱势群体都有自己的生存知识和策略。研究者最好是暂时放下自己的“局外假设”,去发现和理解她们的知识和策略。

未来的挑战

1. 这个研究虽然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但取得被访问者的信任仍然是一个难题。处在边缘及危险地带的女性求职者难以相信外人。在我后来的报告中,我形容她们为“惊弓之鸟”。由于我是女性,由于我戴着眼镜,在她们看来是一个还可信任的“知识分子”,当她们核对了我的证件和名片后,相信我不是一个人贩子,所以愿意跟我去吃饭(在有的案例中,女人贩接近她们后会给她们掺人药物的食物和水。一旦食用,她们就被人贩子所控制)。但是,她们仍然难以完全地信任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她们多少隐瞒了一些个人信息。仅个人通信信息就在调查中更新了三次。事后,我按照她们留的通信地址给她们寄去照片,6 个人中仍有 3 人的信被退了回来,理由是“查无此人”。

2. 在研究中,女性求职者的知识、策略和价值观都是我能认同的。虽然我要求自己持客观立场,但我内心深处为她们不平,认为她们应该得到理解和有效的帮助。如果我遇到一些被访问者,我完全不相信、不认同他们的价值观,我不知道如何才能继续这个研究,这牵涉到复杂的研究伦理问题。

3. 最后一个挑战是:如何继续发展这个研究。这个研究已经告诉我,农村女性求职者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无知的、懦弱的群体,她们有自己的“防拐”知识和策略。那么,我们如何与她们一起工作以发现更多的事实,一起

工作以改善她们的环境和她们的"防拐"知识和策略,是我们下一步应该思考的问题。我的合作者邱林川已经在广东劳务市场中的农村求职者发展了一个小型调查队伍,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农村求职者的参与正在被发展成一个赋权的过程。

[参考文献]

Babi, Ai'er (Earl Babbie) (2000) *Shehui yanjiu fangfa*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Beijing: Huaxia chubanshe.

Bu Wei (1994) 'Chuanboxue shizheng yanjiu de fangfalun wenti'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empiricalcCommunication studies],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no. 2, pp. 8-15.

——(1997) 'Fangfalundexuanze: dingxinghaishidingliang?' [A choice of methodology: qualitative or quantitative?], *Guoji xinwenjie* no. 5, p. 49-54

Chen Bo et al. eds (1989) *Shehui kexue fangfalun*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Beijing: Renmin daxue chubanshe.

Chen Xiangming (1996) 'Shehui kexuezhong de dingxing yanjiu fangfa' [Qualitative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Zhongguo shehui kexue*, no. 6, pp. 93-102

——(2000), *Zhide yanjiu fangfa yu shehui kexue yanjiu*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eijing: Jiaoyu kexue chubanshe.

Dai Yuanguang et al. (1988) *Chuanboxue yuanli yu yingyong* (Principles of mass communicauon and their application), Lanzhou: Lanzhou daxue chubanshe.

Feng Xiaotian (2004) 'Fangfalun yu fangfa yanjiu shuping' [A comment on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on methods], in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Shehuixue Yanjiusuo(eds) *Zhongguo shehuixue nianjian* 1999-2002 [Yearbook of Chinese sociology 1999-2002].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Guo Qingguang (1999) *Chuanboxue jiaocheng* [Mass communication],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Guo Yuhua (2002) "Ruozhe de wuqi" yu "yincang de wenben"—yanjiu nongmin fankang de diceng shijiao' ['Weapons of the weak' and the 'hidden transcript'. A bottom-up perspective on peasant resistance], *Dushu* no. 7, pp. 11-18.

Scott, James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Zhang Longdong ed. (1993), *Dazhong chuanboxue zonglun*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mass communication],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仁慈和智慧的重要性：现场关系结构的反思

◆ Bjorn Kjellgren（熊彪）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易经：大附录

局内人和局外人

讨论田野调查时，现场的关系常常被简化为互不相属的两种：局内人和局外人。讨论中国的田野调查时，这种简化有时还与中国与外国这样的二分法混为一谈，没有给“复杂巧妙”和“模棱两可”留下任何余地，而我们已经习惯于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讨论方法论的文章中遇到它们。确实，这对双生的二分法只留给生活在现实中的研究人员很少一点儿空间，因为几乎没有研究人员能把自己按照这些简单的二分法加以划分归类，其后附带的常常就是种族和文化的刻板印象，更别说给那些身份变化不定的受访者留下更小的空间。现实中，或主动或被动，任何研究人员都会与调查现场保持一定距离，无论她是在自己所属的社会里或是在外国人的社会里展开田野调查工作。另一方面，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研究者不论是把自己当做一个纯粹的局外人还是把自己当做一个纯粹的局内人都是不可能的。

这种把田野调查现场的关系简化成局外人和局内人、本国人和外国人的趋势，在中国有长期的历史，其他国家也一样如此。而且，本国人/外国人这一区别是不容易被忽视的社会现实，长期存在于公众的认知中，并被中国管理外国研究者和国际研究项目的各类法规所巩固加强，官方关于民族的说辞也起了同样的加强作用。这种二分法同时也是在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

框架中孕育而成，其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民族主义高度兼容，并且已经部分地纠缠在一起(cf . Guo 2004)。我已经在别处讨论了这种简单化想法，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潜在危险；并建议对"民族性"的理解应该从规训和组织上的归宿出发，而不是从原始意义上的血源和文化出发。这样的理解方式能让我们对某些重要关系有一个更令人满意理解，比如，研究人员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与他(她)们所从事研究的关系、研究人员与其他研究人员之间的关系(Kjellgren 2003)。

为了扩大视角，我们需要从狭小的学科空间后退一步。在各自的学科空间内，我们承认个人思想而非社会体制的重要性，常常以为社会体制更多地构造受访者的行为，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一旦从学科空间后退一步，我们就能看到更大的图景，就能够明白，一个学者在体制上的归属是目前为止决定该学者的研究，划定学术成果界限最重要的因素。通过提供理论、方法、术语、研究议程和出版策略上的不同选项，学者的体制归属就能够决定学者的研究。然而，如果将田野调查的细节放大(我们的数据在这里产生)，研究者个体的特性看起来就更为重要了。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在 1927 年到 1934 年间所做的农村调查报告被推举为一个至今依然有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样本(Qin 2003)。作者指出，这些调查的一个主要优势是，毛泽东决定使用当地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研究助手，这样就能够确保没有至关重要的事实被忽略。使用传统术语来解释这件事，当毛泽东使用当地不同社会背景的研究助手的时候，看起来就像是他为了加强调查报告的准确性，在校正由测量仪器导致的衡量错误。毛泽东如此做法的逻辑是基于一种常识性的看法，认为研究就是对事实的发现，研究人员们则是些"偏颇"的测量仪器。毛泽东主要对土地的分配有兴趣，但是当我们研究无形的事物，例如个人知识、感受、记忆和态度等我们在民族志访谈中希望探索的东西时，毛泽东理解研究本身和研究人员的方式依然非常重要。第一个对应 Interview 的中文词汇是"采访"，意思是"去收集"。采访技巧培训、不断细致化的采访手册、新采访方法比如计算机辅助电话采访，都在努力消除采访者可能在信息收集过程中引入的个人偏见。

当然这只是一种看待访谈的方式，就算是我们当中没什么人愿意过度地自我膨胀，许多研究者可能还是愿意把采访看做是一个能动的创造过程。不管怎么看待访谈，尽管原因不同，个体研究者的社会身份依旧十分重要，因此会在大多数民族志研究中导致潜在的问题。在本章，我将利用在深圳

经济特区的个人经历,从而反思个体研究者的社会身份在田野调查情境下所造成的影响。

进出特区

我的田野调查工作是地域研究的一部分,关注的是深圳特别经济区中各类人等的日常观念。深圳特区多年来与中国改革计划密切相关。在地缘政治和文化角度上,深圳经常被视作位于中国和世界之间,或位于毛泽东传统和中国现代化之间。然而,许多社会科学家可能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我选择的话题以及从事的田野调查并没有获得很多理论上的支持,因为它们是巧合、迷路、意外相遇、个人欲望和可能的缘分、命运等的结果。但是,我还是应该尝试保持条理清晰,并且快速到达研究的切入点。我要指出的是,一次对深圳的偶然拜访使我对深圳这个特别经济开发区产生了兴趣。1992 年冬天,在"特区的特区"蛇口待了几周后,我意识到,通过书本和当地生活得到的对中国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深圳的现实。

仅仅是我待在深圳的方式就与我在成都学习中文古文时完全不一样。在成都学习古文时,我住在被称作"熊猫园"的封闭院落里,里面都是外国学生。在蛇口我住在一个半香港半广东人家庭的普通住宅里。一个外国男性和一个女性四川房客(我的女友)合住,出于道德、社会和法律的原因,这样的事情在那时的成都是不可以想象的。而且,深圳人还跟我说了一些她们生活中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从未想过会在中国遇到;听听她们是如何描述邻里关系、工作伙伴和生意之间的关系,你就知道我所言非虚。深圳人常常把自己的这些社会关系描述为:疏远、不讲人情世故、像生意人一样。尽管这样的人际关系经常被人们批评为"缺乏人情",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长期以来却被看做是城市生活的原型。它们严重偏离了当时中国城市主流社会关系的模式。在深圳,这种社会关系模式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另类选择。这种社会关系的部分实现为特区的社会现实提供了注解、支撑和合理性。(Kjellgren 1999)。

回到成都,更为传统的道德和法律标准依旧在那里存在。后来,我的四川女友和我结婚了,我拥有了听起来荒谬的社会角色:中国女婿。这个角色无论怎样都不能让我在世人眼中减少白人的成分,也不能贡献很多文化技巧和知识;但是它理所当然地影响了我的自我认知,也改变了我对很多中国

和非中国事物的情感认知。

1992 年的这些关于社会生活和特区人行为模式的闲谈，提醒了我中国现实是多么的复杂，但它们也激发了我对这个国家特殊角落的兴趣。尽管那时我对它感兴趣的原因似乎仅仅间接地与改革总设计师相关联，但在邓小平 1992 年南巡之后，很快地我就和全国各地民众一样被特区热所吸引。

在 1994 年的夏天，我带着自认为设计良好的田野调查计划回到深圳，根本就没把获得调查许可当成一个问题，甚至也没有考虑申请官方批准或寻找接待单位。这种选择更多出于我学术背景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自己缺乏对官方学术研究规定的尊重，或惧怕繁文缛节或其他手续麻烦，这些麻烦在中国的外国研究人员倒是常常谈到。一方面，1989 年之后，瑞典与中国终止了官方部委一级的联系（直到 2003 年 9 月 11 日，那年的中秋节，一个对双方和解非常吉祥的日子）。另一方面，我所从事的汉学是一个主要以文字分析为基础的学科，所以我并没有太多对正规田野调查程序的认知。我所在研究机构的一位前辈 Bernhard Karlgren 在某本书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一个学术领域大过汉学。这可能只是一种雄辩言辞，但是当你就在那里，在汉学田野调查的现场/领域时，他的话就言之有理了。他的话同时也回应了陈志明（Chen Chee Beng）的意见：中国人类学研究需要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人种学领域里开展（2004：2-9）。确实，虽然护照上所有的印章告诉我中国是一个可以自由进出的国家，我从心底依然觉得中国不是一个随便就可以进入，又随便可以说再见的国家。更加准确地来说，我在 1980 年代中期慢慢进入中国现实，从此再没有回来。深圳对于我来说是世界的一部分，也是自己个人历史的一部分，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田野调查现场”。不过，按照常规说法，1994 年的炎热夏天是我第一次作为田野调查人员进入中国。我在既是四川人又是广东人的钱家度过了这个夏天。

和许多在我前后的中国或非中国学者的研究一样，我的研究是在所谓“机遇式研究”（opportunistic research）的传统之内（Pace Riemer 1977）。我妻子小时候的朋友，来自成都的钱小姐是为我提供食宿的这个家庭的家长，这个家庭除了她之外还有她的香港男友（在广州出生和长大，与香港人结婚，这似乎是很典型的例子）、她的姐姐（当时失业和离婚）、她的古怪的老母亲、两个刚从安徽某个小城雇来的姑娘、一个成熟老练的保姆（她来自距离四川仁寿市不远的山村）。

为我的研究项目筹措经费，所费时间比我预料的要久。但是，1993 年到 1995 年间我在中国做导游四处旅行，这个经历给了我许多意外的机会去继

续收集有关深圳的故事、图片和个人看法。远在深圳之外,我有幸采访了许多曾经去过,后来出于各种原因又离开了深圳的人。在最初计划我的研究时,我并没有考虑到分散在广大地域里的这一庞大人群;但是他们的深刻见解完善了我对深圳的理解。

当研究移民时,多地点田野调查,更确切地说,旅行田野调查的想法非常吸引人,但早期由于我的财务原因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事实上,最初我在深圳的免费寄宿似乎是研究的一个先决条件;在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我不得不维持在一个较低的经济水平上,这样做反倒让我可以很容易地与大多数人建立起融洽的关系,当然除了那些非常富裕的中国人之外。我看起来像个不太富有的人,尽管还是个外国人,这可以让人觉得比较容易打交道。

1995 年我曾在深圳工作,开始寄居于钱小姐家,后又寄居于一个家庭结构类似钱小姐家的她的四川朋友家中。这次逗留原本打算用来收集一些信息,来印证我原先已有的对特区的看法,但是新的情况出现了——要知道,变化是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并且我也开始更加系统地收集印刷资料来补充或佐证我的采访和观察。在类似中国这样高度复杂和自我反省的社会,媒体既携带又创造那些我想从采访录音中获得的大部分信息。进一步而言,纸比人的记忆更加始终如一。

最初的想法是:我只需通过采访收集数据。这个主意部分地来自于一个天真的想法:很多研究人员可以阅读印刷材料,而我自己正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去收集"普通人的想法"。我没意识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普通人"。为了评估从采访中得到的想法和回忆,我必须大概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它们是公众的或是官方的看法和记忆;如果我弄清楚了这些信息,那么,又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样的方式,这些想法和回忆不同于普通公众的看法。

最后,尽管有很多有趣的非重叠区域,在官方文件、当地报纸和书籍、学术文章、通俗文学、流行歌曲和电视剧中,我重新发现了采访中遇到的大多数话题。鉴于中国对传媒自由和公众看法的限制,我的信息提供者在态度和结论方面自然常常偏离这些资源。不过,我发现,在叙述模式上我的信息提供者常常和各类媒体差别不大。

我们不可以说,我听到的一个工厂女工的故事,只是一部由一位前工厂女工编写的关于工厂女工的电视剧的复制品。我们都使用其他人的语言,我的受访人倾向于使用不同语言,从《中国日报》中的标准语言到台湾歌手罗大佑多愁善感的歌词,从地方台电视剧台词和香港方言到引用古典名句,全部都以华尔街金融用语全球化之后的本土变形或制度化"诉苦"的方式混

杂在一起。

我们也不可以说,某种语言比其他语言更为真实可靠。我确实认为听懂它们很重要,因为明白语言上的指涉可以让我的受访人叙述得更加轻松,也引导我去理解这种语言其意义上的复杂性,而故事本身只构成这复杂性的一部分。然而,在我的例子中,那种渴望,那种想要看看能否找到采访议题在文字资料上的说法的渴望,带给我许多超出预期的东西;所以,即使我确实相信分析上应使用补充资源和补充方法,我也愿意先贴上一个大大的谨防数据过多的警告标识。

我计划在香港回归的 1997 年 7 月 1 日再次访问深圳。在回归前举国欢庆的几个月里,我和大多数深圳人一样,都错误地认为这是一个比邓小平 1992 年访问深圳特区更为重要的日子。

我这次还是住在蛇口,距离我五年前首次来深圳时住的地方不远;但这次我是寄宿在另外一个家庭,陈家。这是一个标准的三口之家,一个四川人与深圳人的家庭(男女主人有深圳户口,再加上一个四岁的女儿),女主人父亲的第二次婚姻娶的是我妻子家的一位亲戚。这层关系不算很近,但是也足以给我提供没有太多约束的寄宿的地方。与上次在特区的停留相比,我和这家人共度的时间很少,因为他们的女儿要上幼儿园,他们自己每天要在外上班很长时间。不过,亲戚关系依然让我们每天的互动很轻松,我非常喜欢这一点。

在瑞典我还要在学校里任教,所以只能暑假期间去深圳,往往就是深圳最热和最潮湿的时候。我于 1999 年夏天又去了一次深圳,希望发现香港回归后深圳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亚洲金融风暴对那里有多大影响。那一年我还在四川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收集了书籍报纸期刊上的数据。我最后一次拜访深圳是在 2000 年秋天。在那次的短暂拜访中,我全力避免产生更多资料。那个时候,互联网已经让我可以在任何地方查到深圳每天的消息。

在可能提供重要信息的陌生人之中

传统智慧和标准的社会学教育手册告诉我们,以性别、祖先、阶级、职业等为基础的社会共同性是最有效的人际关系通道,我们可以据此建立融洽关系,把自己变成"内部人",并最终获得我们在民族志田野调查中不断搜寻

的“内部人对自己事物的理解”。如果把这个方法和广泛流行的中国人/外国人二分法放到一起来看,那么大多数外国人在中国开展研究就非常困难,因为外国人很难把自己变成“内部人”。确实,鉴于中国的复杂性,对很多中国学者来说,田野调查也会是个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幸运的是,有很多办法来寻找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共同性。

从中国心理学家的角度,David Ho(1998:6-7)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混杂各类人际关系的清单,也提示了我们都有哪些因素可以在人际关系中扮演社会共同因子的角色。他的清单从血缘关系开始延展到基于出生和社会团体而建立的关系,民族、政治力量、部队、社会阶层、职业从属、居住从属、机构关系、基于成就或监护等的社会归属感、职业联系、伙伴关系,最后以偶然相遇作为结束。简而言之,几乎任何事都可以在社会关系中起到共同因子的作用。这和我在深圳及其他地方的经历一致。除了这些通常的路径之外,我还通过类似如下的事物来和人们建立最初的融洽关系,比如我中文的姓与某人妻子的姐姐的丈夫一样(开玩笑来说:“四百年前是一家”),或我吃猪肉这个事实(严格来讲:所以你最终还是一个汉族人而不是回族人)。

打官方规定的擦边球,利用我妻子的关系,去获得最初的与调查对象的接触和在中国的住所,这一切当然给了我与钱家成员建立融洽关系的一个坚实平台,但是融洽关系并不会让田野调查变得简单。钱家的各个成员成为我 1994 年夏天第一批受访者。可以预料的是,这些采访都存在少许问题。作为女主人的客人和她最好朋友的丈夫,我被女主人所信任,但是我又有一个特别的中间身份,这影响了我的对话和采访。例如,鉴于我妻子与钱小姐亲密的关系,我不能询问户主或她的香港男友过于个人化的问题。因为,要么我已经知道了答案,要么我根本就不该问。同样鉴于我和户主的这种亲密关系,三个雇工也不时想把我用做潜在的信息传递者,来和她们的雇主沟通。如刘和陈说的一样(1998:230),现场的中立性不是一个容易保持的立场。我要说,常常从一开始就很难保持中立立场。

稍后,我用两种方式找到一些社会关系纠结较少的受访者。一种是直接与陌生人发起对话。这很轻松但也费时。它就是一种不断试错,因为陌生人作为潜在信息提供者的状态无法预先判断。但这样的方式常常会有很好的回报,而且几乎总是非常有趣。更常用的寻找合适受访人员的方法(特别是当我知道需要采访哪种人时),是询问我曾经采访过的人,看看她们是否认识符合条件的人来帮助我完成采访。深圳是一个不断经历巨大社会变动的年轻城市,在这里脆弱的社会联接统治一切。所以,尽管不是总能奏

效，这种理论上称为滚雪球的方式证明是可行的。而且，经过第一层关系，然后再经过第二层关系，我和受访人之间就有了一定的距离，这样就能保证一个安全、合理、清晰可辨的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不会再有哪怕是最轻微的人情债介入。

总之，我深入采访了六十多个人，其中一些采访录了音，大部分则使用笔记或心智图记录。“如果你希望人们畅所欲言，你绝对应该避免携带录音机。”这是我在1994年从一个资深的美国学者那里得到的建议。但是，在深圳工作被证明远离了“有关恐惧的文化”，杨梅惠（Mayfair Yang）（1994：15-25）相信这种文化为研究的主要阻碍，甚至是对研究人员身心健康的一大威胁。当深圳人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甚至讨论政治敏感问题时，毫无畏惧，似乎可以适用一句老话“天高皇帝远”。令人尴尬的是，技术失误和常常不携带录音机是我没有多做录音的主要原因。这是我确实感到后悔的地方，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笔记可以与录音或录像相比，尤其是那些用作教育和自我反思的资料。

我长着一张外国人的脸，在采访的时候，受访者总是觉得有必要先评估我的理解水平（其中一些人没有如此感觉，或至少表现得非常淡漠。她们表示，不关心我是否能够理解，或者，遇到一个能讲中文的外国人已经不新鲜了）。首先，我的中文水平是否足够去理解她们？其次，我是否对中国社会和历史有充分的理解，以便能弄懂她们所说的事情？第三，我是否足够了解深圳，并能理解他们所谈论的地方、机构、人员或事件？不确定阶段总是构成采访的一个简短部分，而且，我当时并不认为它对我的工作有所阻碍。采访中双方必须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互信，由于我的肤色使这种不确定性非常明显，反倒可以让双方对不确定性有更加明确的处理。

一旦超越这个阶段，我的采访总是能顺利地进行。不过，在深圳工作期间，采访开始时无害且重要的见面寒暄，以不同方式帮我设定了谈话的议题。随着访谈的开展，不仅我的中文提高了（开始这个项目时，我的中文就比较流利，但是，在掌握一门语言时，流利只起到部分作用），而且我对中国总的知识和对深圳的专门知识都大大增加了。在1992年，我对深圳了解甚少，到1999年，我常常比我的信息提供者还了解深圳。显示自己拥有这样的知识或是缺乏那样的知识，往往会引出不同的故事，伴随而来的是，由我而不再是由他们来扮演地方专家的角色，这个变化当然只有我自己知道。后来我发现近期到达深圳的受访者对特区一些特定事物的了解比先期的人少，我据此确认，那时已成为老生常谈的抱怨之词“特区已经变成内地，内地

已经变成特区"所言非虚。鉴于中国改革的发展轨迹,这种对当地历史的概括总体而言是正确的。引起我思考的是,这些年里我在多大程度上为特区的"非特区化"做出了贡献? 或许,我的脸上曾经产生过一种厌倦的表情,我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少,甚至,我的这些表现无意间还感染了我的信息提供者?

研究者的好奇心驱使她们从心里把受访人当做老师。但是,研究者拥有的当地知识有时会成为工作上的障碍,除非研究者隐瞒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然而在长的采访中很难自然地做到)。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很早我就知道,我所能提供给受访者的真正的感激就是:认真投入地倾听他们的讲述,并且允许受访者按自己想要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认为这种实用并尊敬的态度不会使受访者感到害怕,而且作为外国人无疑对访谈也大有助益。要知道,甚至在受访者到深圳的第一天,她们都比我离自己家乡更近,因此我总是被当做一个"外乡客"而不是"本地人"。

在官方所谓"国际都市"深圳工作,我的蓝色眼睛是受访者在我身上最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即使我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他们的;从这种带了一定"色彩"的了解中,他们形成了对我和我的研究的看法。我相信这对我很有利,能吸引别人积极的注意和期望,因为我可能被看做有能力提供各类美好事物的人。比如,一个会心微笑,或一个生意机会,又或者一段异国婚姻。当然,这种对白人老外的积极但是又非常模式化的见解,只能帮助我走到这么远,但这常常已经足够远。一旦最初的联系被建立起来,受访者就会知道我并非一个单身未婚富有的美国商人,我不认为他们知道这一点会造成多大不同。尽管还是有不多的几个对我严重失望的特例,我想,我与人们心目中"理想"的老外在婚姻、经济和国籍上的不同,对我的工作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有这些不同的存在,我的受访者很难或干脆就没必要把我放入他们预先设想的,外国人应该如何如何的模式化见解里,因此也就不受诸如,应该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这一类陈规的束缚。而且,欧洲人和中国人在讨论如何与美国人发展情感的、文化的和物质的关系时,常常能找到共同点。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大多数受访者来说,我的异国身份是一个安全信号,意味着我会带着她们的个人故事远离深圳。相比之下,我后来发现,采访在瑞典的中国人,询问她们生活和工作上的细节,则更加困难。在瑞典,我的信息提供者的故事发生在很近的地域内。尽管我保证受访者将会被保护在匿名状态中,而且采访只出于学术目的,许多中国人受访者依旧担心,如果他们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太坦白,最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在

瑞典，和在深圳时一样，我都是个友善的人。但是在瑞典，我的个人品质常常被笼罩在真实的和想象的习俗社会的阴影之下。作为田野调查工作者，我们所代表的远远不只是我们自己。

然而，任何事情有利就会有弊。在深圳我没有任何当地组织背景或机构背景，我想，其负面影响之一是，我的信息提供者可能会觉得，和我谈一些具体建议以改善深圳的事情，没什么意义。如果我一直在为当地政府或在政府主持之下工作，我可能会被当做一个潜在的与当权者沟通的管道，非常像钱家雇工试图把我当做与雇主的沟通管道一样，或像许多在瑞典的中国人一样，希望我给瑞典大众传递一个模范少数民族令人放心的形象。这种情况听起来不是非常令人振奋，而且这意味着我进行的不会是一个轻松的采访。但是，好处是，当受访者希望借助你把信息传达到某个地方时，他们常常告诉了你比他们预先设想更多的内容。在深圳，幸运的是，我能间接地看到一些当地研究者写给政府代表的报告；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弥补缺乏当地同事参与讨论的遗憾，当然，我也因此不会被当地同事拖延搪塞。我们很难做到鱼与熊掌兼得。

过去几年里，有些信息提供者我见了好几次。但不幸的是，大多数我曾经交谈过的人在我下次拜访特区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有的人甚至在采访后不久我还没离开深圳时就已经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了。深圳人流动得很快，除了很少的例外，一个人的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似乎几个月后就失效了，最多也就是引导我找到某个人，她或他能粗略地告诉我从前的信息提供者离去的大致方向。

至于受访者的选取，我采用了另一种策略以方便理解。我的信息提供者的核心团体是从中国内陆城镇来的人们，他们在努力成为中产阶级（这里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汇，其中一些人即使用深圳标准来看都非常富有，而其他一些人则拿着很低的工资）。他们属于“文化同生群”，出生于 1958 年大跃进和 1976 年毛泽东辞世之间。

他们属于深圳人数最多的年龄组人群，我猜想，他们比那些在广东长大的人更了解深圳与其他城市的差异，也比那些比他们年轻和年老的深圳人了解这些区别。我还猜测，他们这群人，相比暂时旅居深圳的低收入劳动者而言，对深圳生活更感兴趣并较少表示不满。

这个人群我通过朋友和亲戚可以容易地接触到，不仅仅与我自己在瑞典所属人群类似（我于 1966 年出生于有劳动阶级根源的中产家庭），而且我们同样都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寻找未来。令人吃惊的是，我最后发现受访者

竟然多数来自四川。四川是广东省以外向深圳移民的第一大省(Shi 1999),这一容易理解的事实给我一个额外的优势,因为我可以通过自己在成都的经历与他们产生关联,并且,即使使用方言也可以没有任何语言障碍地工作。他们中除少部分外,大多数都受过中学教育或高等教育,而我看起来像个学生,这让我与他们不会产生距离感。虽然这一切并不能使我与大多数人就此打成一片,但确实减少了我们之间的隔阂。

我依靠熟人推荐(滚雪球)来选取受访者的方法,使我的采访圈基本保持在"四川军团"范围之内,这本身对人有些启发性。尽管这一现象本身并不令人奇怪——"改革为我们(四川人)插上了翅膀"是陈(1999:237)描写他的四川同乡的句子——但是这种以方言为基础的人际网络,与我的核心受访人群的陈述形成非常有趣的对比。他们说:一个人的地域起源在深圳的社会互动中只有很少意义(如果不算全然没有的话)。

我在深圳的田野调查工作相对比较容易开展,这与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大有关系。在一个成功和失败被看做个人责任的地方,在一个遍地是机会的地方,为了在机会来到时不错过它们,或在任何可能的时候创造机会,时刻保持警醒非常重要。这无疑有助于会晤,不过,我多半是在采访时才与某个人会面,这让我发现了深圳社会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另外一个方面。在一个全部都是陌生人的城市,个人可以自由地重新创造自我,或者至少是重新表现自我。这在村庄或单位中都是不太可能的。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常常通过社会共识来建立,将一个你自己不一定能施加很多影响的身份强加给你。而特区的新来者即拥有自由又有责任去创建一个新的开始,或者只展示他们自己想要展示的方面(Kjellgren 见后文)。一个人对自己过往身份的自觉中断,用 Erikson(1982)的术语来说,一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自我统一"(selfsameness),帮助许多移民克服了在适应深圳新的社会文化时遇到的潜在问题。其实当我从古典汉学转移到社会学时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因为我无法将受访者的叙述放入一个村庄或其他有边界限制的社会背景中去理解,所以这就引入了很多不确定性。我只能希望可以得到受访者在当时当地想要告诉我的故事,不过,这也往往就是我们之间可以做的最好最吸引人的交易 (Arras 1997)。

在我的调查采访和大量谈话之间画一个清楚的分界线非常困难,并且也没有必要。在餐桌上与几个朋友就有趣的话题展开讨论,就像是在焦点访谈小组一样。与众多朋友一起讨论以及一对一采访,两者内容上的区别也帮助我证实了采访中提到的一些想法,不过,我总是承诺我的受访人会在

记录中为她们保持匿名身份,而她们自己很少把这当成一个问题来考虑。

那些日常对话也从另一方面补充了我的采访。我的采访通常采用生活史的方法,关注受访者搬迁来深圳的方方面面,而餐桌上的交谈更多关注的是此地当下的事情。闲话作为每一个社会中的基本道德力量,非正式信息的主要媒介,以及当天各类新闻总的评论,帮我更多了解每天话题和日常道德规范,并帮助我清楚领会采访中得到的一些资料。一定程度上,这些日常对话也弥补了我没有依附政府机构,或没有长期特区生活经历所造成的损失。

为了补充那些来自内地的核心受访人群的观点,我采访了一些广东人和香港人,一些贫穷的民工(他们大多数来自四川和湖南),还有一些比核心受访人群年轻或年长的人。

我没有最起码的广东话语言技巧,这并没有影响我"正式"的采访,因为所有讲广东话的受访者都可以讲标准的普通话(而不像我的一些来自四川的受访者)。然而,它仍然是我的一个障碍,因为广东话作为现代语言、资深深圳人的标签、特区使用人数最多的方言,经常是方言混杂公司里的最后选择。确实,许多以普通话开始的对话转入激烈时就变成了广东话。我就只能提醒对话双方我听不懂,希望她们能冷静下来,或是等她们回到普通话。这时我可以开玩笑地问她们,已经就什么问题达成了什么样的结论。人们常常在晚上看讲广东话的香港电视台,特别是香港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其中唯一的积极面是,我可以很容易地辨别新来移民的沮丧(她们还听不懂广东话),当然对我这只是很少的一种安慰。

我已说过,通常我和我的核心受访人群的沟通最为畅快,根据专家的意见来看也应该如此。然而,在这种轻松中也隐藏有危险。理论上来讲,访谈如果以相互理解和渐进的方式开展,模仿"真实友谊"的建立过程,就可以让受访人放心地"自我揭露",并且,据称,访谈会更顺利而且从中能得到跟多资料。但是,在非正式访谈情况下,如同多数友好对话一样,往往会有一个很强的趋势:对话双方都会努力迁就对方,例如,强调一些大家共同认可的价值观、经验或兴趣。因此,受访者的自我揭露越多,我们越少可能得到与我们准备接受或乐意倾听的故事有本质不同的讲述。我们越觉得自己在"内部",我们越可能认为理解是理所当然的,想当然地以为我们已经明白信息提供者的意思,而不必再通过提问来探究。在正式访谈中,我们个性的影响被调查问卷所限制,并被手册中的行为准则所平衡,但是在很多质性研究的访谈中,真实情况恰恰相反。情况越放松,关系越融洽,我们越可能听到

我们想听到的,这常常与我们真正想听到的相反。

常见礼节,访谈礼仪,还有感谢人们专门为这个会面抽出时间(这可是在一个以"时间就是金钱"为口号的地方),它们一起使我们的访谈成为非常文明的事儿。相比之下,朋友之间的交谈可以轻易地变得不着边际,但也暴露人们直白而富有信息的一面。在一次与一位知名作家就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问题争论之后,我在午夜被扔到下着细雨的深圳街道上(我越来越不客气地反驳自然种族等级制度,"白色人种"在顶部,"黄色人种"在中间,"黑色人种"在底部)。当时我非常苦恼,这个事情给我一个机会不仅对种族主义进行反思,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去反思,为什么非常基础话题中的不同意见,在许多社会交流中被忽视、被避免和未被察觉,更别说在采访我们认为很亲近的人的时候。在田野调查工作中,我们常常对我们的信息提供者发展出一种同情的理解,这确实是我们明确的目标之一,但是有多经常,和在什么程度上,这样理解的根源,是因为双方想要避免更为尴尬的话题和思考方式?

我发现,比起采访核心受访人群,在采访来自农村的人们时,我问了更多关于工人组织、所有权和财务方面的细节问题,我也比较多地尝试确认某些词语的意义。与我的核心受访人群交流时,我感觉我能更精确地理解人们所谈情况及其性质。我向受访者表示自己知道所涉及的人和事的时候,我实际上向他们确认,我们对所谈事物有共同的理解,我也确实希望我们有一些共同理解可以作为访谈的基础。但是,当时我们可能并没有。双方坐下来交谈,非常容易就可以观察到,你们的服饰是否在同一价格范围之内以及风格是否相似,你们是否都喜欢同样的音乐或食物,但是鉴于大多数采访的时间有限,共同性多数时候只能存在于想象中,顶多希望如此。而通常人们都错误地认为一个人自然而然就能理解其他人的想法。我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证明或否定我的看法。我记得,当我采访一个来自湖南农村的年轻女性,我询问她,每次她说某事很"辛苦"时,具体是指什么事儿?我也记得,在采访当地和我相同年纪的男性研究人员时,我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可以这样说:社会距离培育出了数据的细节。是的,我这样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即使其中差别不应被过度地强调,社会差距越大,我的采访笔记看起来越像那些采访机会仅此一次的记者的笔记,同时采访越不像在探究某个有关共同利益的话题。另一方面,我确实相信,在访谈中我越是可以更快更深地探究问题,我越是对自己能理解受访者所说一切的能力感到自信。

有趣的是,大多数年纪较大的受访者都是男性。我发现,通常被认为是

学者优点的“文化敏感性”(即,知道如何以文化上适当的方式采取行动),常常使我在对年长者的访谈中束手束脚,使我只能从采访中得到一个私人版本的官方故事。在我岳母家中我受到的尊老爱幼的训练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发现,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很难将对话引入我选的方向。我的职业好奇心通常会在访谈中触发传统的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心态,结果使谈话变得更加没有乐趣,因为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受访者准备把我看成一个对他们所说话题有所了解的人。

尽管我相信自己给年长的受访者留下了良好印象,我依然感到收获很少,只是确认了一些较少个人感情色彩的解释。考虑到这些人成长时期的文化环境,这样的结果还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成长于毛泽东主义时代,一个理想和现实差距达到最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非常醒目的遗产就是:即使不是政治敏感话题,许多人倾向选择不去表达自己的感觉和想法(cf, Li 1994)。

回过头来看,我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我可以在访谈开始的时候设法把受访者的注意力从我的年纪转移到我的教育背景(在我被变成无法有所作为的倾听者以前),通过开始阶段的补偿来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平衡局面。即使老人仅仅组成了深圳特区的一小部分,我依然认为非常可惜我没能从少数几次对年长者的采访中获得更多信息。人类学知识认为,社会边缘的人们从旁观者角度观察社会,常常成为很好的信息提供者。1990 年代的深圳可能是中国最年龄歧视的地区之一,这是在我的写作中很少触及的当地文化的一方面。因此没有来自老年男士的观点,更别说老年妇女的观点。也许,这是另一个我自己变成当地土著的征兆?“敬而远之”,尊敬地不去打扰老人,仅关注年轻漂亮的人?

社会人群分类是一个靠逻辑推导出来的结构,常常被理解成拥有内部的连贯统一和自然赋予的明确性,而实际往往不是如此。造成人种、年纪和性别不同的生物学基础在采访环境下并不能被我们轻松地加以利用。好在它只是方法上的考量,不会造成实际的困难。似乎与男女差别的直觉相反,我发现与女性对话往往比与男性对话更加容易和更有收获。不过差异并不是很明显,这样的差异永远不会很明显;但我经常感到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分享她们的个人故事,女性可以围绕重要时刻和属于特殊场合的感觉来构建她们的叙述,而男性的叙述策略经常让他们做出总结性概述,很多时候这样的总结似乎不是基于个人经验,而是基于社会共有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理解。看起来,随着我允许男性有更多的自我揭露和对话,Oakley(1981)批

评的“阳性”的采访状况已经被反转。当然,针对有些话题,我的女性受访者绝不会主动地提供信息,我发现自己也很难启齿问这些问题,例如婚外恋(同性之间很大的话题)、流产、工厂关于月经前不快症状的规定。我和受访者都温文尔雅地避免诸如此类的有关社会性别的问题,这些问题仍然是未知领域;但是在大多数话题上,受访者的讲述是活跃的并充满风趣细致的观察。

借用 Harris(1989)关于“自我”和“个人”之间区别的分析:“自我”作为经验的核心;“个人”作为代理者,在社会里占有特定位置,并发展一系列动作去获得个人目标。女性的叙述似乎是特定“自我”的反映,而男性的叙述似乎是“个人”的反映。这两种叙述风格让它们很容易就进入不同的分析形式。

现在,这些观察只是由我自己在性别问题上的陈规陋习所引起的吗?我的采访模式是否恰好契合了一种特定模式的跨性别对话?也许我的婚姻给我带来了更“女性化”的谈话模式(“很不幸不是这样”,我可以听见我妻子叹了口气),或者,我从在瑞典的幼年生活经历中受到影响,在瑞典炫耀肌肉的大男子汉心理经常被描述成愚蠢而不是力量的象征。也可能只是普通的异性吸引使她们都愿意在异性面前多表现自己一点?如下情况很明显:能感知到的性别差异常常与社会权力相交叠,当地成功的、富裕的女性受访者经常使用“男性口吻”来讲述她们的故事。不过,或许就是因为,我所听到的“女性声音”更容易接受社会科学家的分析研究?“男性声音”以某种方式占据了我的理论和虚构,我常常发现,自己不得不要求男性受访者在采访中回到他们的个人境遇中去,而当时他们确实是在告诉我这些,只不过是以我希望之外的方式告诉我。

我应该加上一句话,并不是所有女性受访者使用的叙述策略都是“自发的”并且是以个人经历为基础的。例如,来自农村的女性受访者有时会把自己描述成来自“传统”村庄的“传统”女性,正努力回到那些还没有被社会大潮改变的地方。甚至我们对话发生的环境已经清晰表明,这些浪漫故事是一些过去从未成真,将来也少有机会成真的梦想,她们还是会坚持这样描述自己。这些童话不必与现实做对比,而应从故事主题上与男性村民讲述的故事来做对比,在那里,男性同乡为自己的未来制定了一些非常有男性气概的宏伟计划,这些计划常常基于从未获得过最后成功的在深圳股票交易所(大金鱼缸)中赚大钱的梦想。

做你自己,看你能看到的

中国老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一个简洁说法,说的就是不同的人对事物的体会不同,但是从字面上,它提醒我们,我们能看到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谁。我努力寻找例证,以弄清楚设定类别或自我设想的不同归属是如何影响我在深圳的田野调查的(不同的类别如年纪、种族、国籍、性别、组织背景和文化等)。毫无疑问,有许多其他影响田野调查的方式,其中一些我极有可能从未注意到,它们在这些年中随着我和现场的改变而改变。和其他许多研究者一样,我可以无数次扮演无知的局外人的角色,我眼睛的颜色帮我找到借口可以提出某些问题和采取某些行动,这些问题和行动可能早就给一个中国人模样的研究学者制造了麻烦。我来自国外但熟悉中国和中文,这使得许多人在访谈中很放松,如果我来自当地研究机构则不会如此。我来自这样的一个家庭,它带有,或者说,实际上这个家庭所在的整个国家(瑞典),都带有强烈的社会民主传统。这就使我在分析看到的事物时,倾向于以某种特定的道德眼光和某种特定的理论看待事物。开展此项研究时我还没当爸爸,这使为人父母者在我的研究中不那么突出,如果今天再来开展此项研究,情况就会有所不同,我会关注父母抚养子女所遭遇的问题,等等。

经过此番询问后,我们得出一个令人有些苦恼的结论:作为孤独的田野调查工作者,我们最多只能臆想我们自己个性和社会身份在田野调查现场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可能仅仅是在猜测,不过我们也应该猜测,但我们永远不知道猜测的结果。然后,我要再一次强调,我们研究工作的大部分确实在田野调查现场之外完成,在我们安全舒适的研究机构那里完成。在那里,我们组织归属感的影响力在塑造我们研究的结果时往往非常重要,甚至远远重要于在田野调查现场似乎(或者根本就是)意义重大的许多地方特性。

认识到我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更多地来自在大城市居住的经验,而不是来自在偏远山区居住的经历,还有部分是基于自1980年代中期起我本身的"中国化",也出于想对自己熟悉的一种话语做出一定贡献的欲望,同时也想摒弃一种排除中国经验的全面战略,我坚信我们在其他地方所采用的方法策略,包括"在家里"所采用的那些,总体来说在中国一样起作用。跨文化研究的注意事项清单到处都能找到,里面列满应做和不应做的事情,研究者对

它们最好采取保留意见，让它们像过去一样继续休眠于古老和毫无根据的归纳中，沉醉在简单化的文化观中。在中国工作，无论肤色和国籍，我们容易把许多现象看成是中国特色，当然它们是中国特色。但是，人们的感觉常常聚焦在差异性而不是相似性上面，会引导我们去思考人们及周遭环境的独特性，过度强调它们的不同。我希望这一章的内容可以说明，有特色不一定意味着唯一性。

参照人类学研究的总的情况，Salzman 在十年前评论道："我们田野调查报告的可信性主要基于它们的独特性，即，没有其他报告可以给出相反的'发现'，或者说没有其他报告来检测我们田野调查报告的可靠性。"（1994：35）如果我们相信现场研究人员的解释功能，把现场研究人员的看法当做是我们研究对象的共同创造者来认真对待，那么，让尽可能多的不同的学者进入研究看起来就是非常可取的，如果可能让观点不同的研究者共同存在的话。并不是为了获得全部事实（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同样也是如此），而是为了向多方对话贡献更多的声音。这在最后可能成了最好的（有些人会说唯一的），评估和提高人类学的有效性的方法。

作者致谢

作者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感谢 Joseph Bosco 和在终审稿中做出富有价值评论的编辑们。感谢来自瑞典国际研究和高等教育合作基金会的慷慨的奖学金。

［参考文献］

Arras, John D. (1997) 'Nice Story, But So What? Narrative and Justification in Ethics', in Hilde L. Nelson (ed.) *Stories and Their Limits: Narrative Approaches to Bioethics.* New York: Routledge.

Chen Siquan (1999) *Tianxia Sichuanren* [All Sichuanese under heaven] Chengdu: Sichuan renmin chubanshe.

Erikson, Erik H. (1982) *The Life Cycle Completed.* New York: Norton.

Guo, Yingjie. (2004)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Search for National Identity under Reform.* London: RoutledgeCurzon.

Harris, Grace G. (1989) 'Concepts of Individual, Self, and Person in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1(3), pp. 599-612.

Ho, David Y F (1998)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Relational Dominance: An Analysis based on 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No. 1(1), pp. 1-16.

Kjellgren, Björn (1999) 'Trends in Urban Chinese Culture: The Shenzhen Experience' *Stockholm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No. 10, pp. 97-123.

——(2003) 'The Predicament of Indigenisation: Constructions and Method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Otherness in Chinese Ethnography'.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Taiwan Renleixuekan*, Vol. 1, No. 1 pp. 147-178.

——(forthcoming) 'Migrant Cuisines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Selves: Food and Identity in Shenzhen'.

Li Qingshan (1994) "Fangren": Guoren renji jiaowang de wuqu—Hanyu yanyu de renji jiaowang yanjiu' [The defensive personality-Chinese social 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 *Shehuixue Yanjiu* (Sociological Studies) No. 3, pp. 52-56.

Liu, Tik-sang and Cheung, Siu-woo (1998) 'Reference Community: Anthropological Experience of Research, Teaching and Friendship in Tai-O, Hong Kong', in Sidney C. H. Cheung (ed.) *On the South China Track: Perspectives o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and Teachi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akley, Ann (1981) 'Interviewing Women: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in Helen Roberts(ed.)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Qin Hongzeng (2003) 'Mao Zedong zaoqi shehui diaocha de tianye jiazhi' [Field values in Mao Zedong's early social investigations], in Zhou Daming (ed.) *Ershiyi shiji renleixue* [Anthrop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Riemer, Jeffrey (1977) 'Varieties of Opportunistic Research'. *Urban Life* 5, 467-477.

Salzman, Philip Carl (1994) 'The Lone Stranger in the Heart of Darkness', in Robert Borofsky (ed.) *Assess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Shi Xianmin (1999) 'Zhongguo yanhai jingji zhongxin chengshi laodongli liudongyu tizhi xuanze—Shenzhen tequ liudong laoli guanli yanjiu' [Labor mobility and the choices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Chinese coastal economic central cities: Research in Shenzhen special zone]. *Shehuixue yanjiu* No. 3.

Tan, Chee-Beng (2004) *Chinese Overseas: Comparative Cultural Issu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Yang, Mayfair Mei-hui (1994) *Gifts, Favo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